

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

碩士論文

指導老師：鄭恒雄

明清譯書書目之研究

研究生：郭建佑 撰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七月

私立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
論文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郭建佑 先生之碩士學位論文

明清譯書書目之研究

經本委員會審議合格，特此證明。

論文口試委員

指導老師

盧荷生 (召集人)

鄭恒雄

盧荷生

鄭恒雄

蘇 精

蘇 精

系主任

林麗娟

林麗娟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七月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論文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本人在輔仁大學(學院)

圖書資訊學系所_____組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

取得碩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名稱：明清譯書書目之研究

同意 不同意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全文資料，授予系上置於本系網站供自由下載作為學術用途使用，但不得以各種方式重製後散布發行或作其他侵害本人著作財產權之營利行為。

本系碩士畢業論文全文電子檔，採用電子檔案格式以 Creative Commons 授權，置於本系網站供自由下載

指導教授姓名：鄭恒雄

研究生簽名：郭建佐

學號：493106023

日期：民國 96 年 8 月 30 日

摘 要

隨著明末以來中西文化的交流，西學譯書的傳入，中國古典目錄學面臨到文獻環境的改變，以收集譯書為己任的譯書書目是中西、新舊知識交替下的特殊產物。譯書書目大多為中國學者所編撰，在思想上雖延續著中國古典目錄學的精神，但是由於所譯書籍種類繁雜、內容新穎，早已非中國古典目錄學所能涵蓋，在編纂上勢必得採用不同的分類方法與著錄體制。譯書書目實為中國古典目錄學向現代過渡的橋樑。本研究擬從研究明清時期譯書書目的發展，來理解中國古典目錄學在西學影響下所做出的反應與回饋，具體而微的呈現中國古典目錄學轉型之初的複雜歷史圖景。本研究共分五章，除了首末緒論及結論外，各章內容如下：

第貳章：譯書書目形成的歷史脈絡，先回顧西學輸入中國的時間和內容等環節。再按照歷史進程與內容特徵區分為數個階段，探究每個階段中西文化交流的內涵以及明清時期中國古典目錄學的發展概況，瞭解當時的時代氛圍與學術思潮。

第參章：譯書書目的編纂與著錄體例，則是對譯書書目的發展概況及體例加以探討。從譯書書目的類型切入，將譯書書目分為專科型、綜合型、出版目錄。藉由對譯書書目類型的區分，能對譯書書目的內容有初步的認識。而後進一步釐清譯書書目的編纂思想及體例的運用，深入認識譯書書目的編纂意涵。

第肆章：譯書書目的分類系統，從中國本土學術傳統自身的發展，及西學學術體系影響這兩條線索入手。希望在此基礎上，理解譯書書目在中國四部分類法框架下是如何因應圖書分類與學術體系的轉化，藉以呈現近現代中國目錄學的發展與改變。

綜合以上所述，明清時期中西文化交流、譯書活動的歷史脈絡，以及中國知識份子在面對西學的解讀和應對方式這兩個層面，就是本研究討論明清時期譯書書目的狀況與評價之主軸。

謝 辭

當開始提筆寫謝辭時，感受最多的不是論文完成的喜悅，而是結束輔大圖資多年學習歲月的不捨。七年前選擇輔大圖資就讀，從對圖資領域的一無所知、到參與圖書館志工服務、圖書館工讀、選擇繼續唸研究所，一直到現在用論文來為我的學習暫時劃下句點，希望未來的日子，我仍能在圖資領域繼續學習。

論文得以完成，首先要向指導教授鄭恒雄老師致上最誠摯的謝意。當我開始著手進行論文時，由於選擇的題目在目前圖資領域中少有人進行，也涉及了往昔較少接觸的史學領域。在收集資料、撰寫論文的過程中，我面臨到許多的困惑，鄭老師在我論文進行時的引導與啟發，給予我許多的幫助，讓論文順利完成。

感謝兩位論文口試委員盧荷生老師、蘇精老師對論文的悉心查閱，對我的寶貴建議和叮嚀。不單是論文上的指正，兩位老師在學術上的專業以及對學術品質的堅持，也讓我受益良多。

感謝輔大圖資的各位老師，老師們在課堂上的教導，讓我能有穩定的基礎面對課業。大學班導淳淳老師的對我們的關懷，以及助教們從大學到研究所諸多事項的幫忙與提醒，我都銘記於心。

在研究所學習的過程中，同學間對課業的相互討論、一同參與活動、互相鼓勵打氣，讓我擁有豐富充實的研究所生活。祝福已經完成論文的同學們，繼續朝自己的理想邁進，還沒完成的同學們也好好加油囉。身旁許多好友的相互砥礪、國圖工讀的點點滴滴、鳳儀的陪伴與論文審查的幫忙，也都是我求學過程中的美好回憶。

一段短短的謝辭難以道盡我在輔大圖資七年的學習歷程，以及感謝所有曾給予我幫助的師長及朋友，更多的感謝在我的心中。最後感謝家人的關懷與鼓勵，父母親的支持與照顧，是我努力求取知識的最大後盾。希望這份成果與喜悅能分享給所有身邊關心我，以及我關心的人。

目次

第壹章 緒論	1
第一節 問題考察	2
一、變動時代背景下的特定產物：譯書書目	2
二、中國古典目錄學的繼承與重建：譯書書目的角色	3
第二節 研究目的	4
第三節 研究回顧與資料運用	6
一、目錄學及圖書史相關領域	6
二、中西文化交流及譯書活動	12
三、西學思潮及分類系統的轉化	14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論文結構	17
一、研究方法	17
(一) 以縱向的時間發展結合橫向的社會背景	17
(二) 比較映襯法的特質突顯	17
二、論文結構	18
第五節 研究範圍	19
一、研究對象	19
二、時間斷序	24
三、研究內容	25
四、研究限制	26
第貳章 譯書書目形成的歷史脈絡	27
第一節 明清之際：西學的最初傳入	28
一、西學傳入的時代背景	28
二、譯書活動初期的主要內容與特徵	30
三、明清時期：中國古典目錄學的總結	33
第二節 清中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式微	36

一、雍正禁教後的逐漸式微	36
二、《四庫全書總目》對西學的反應	38
第三節 晚清：西學的再度輸入	41
一、晚清西學傳播主體的多樣化	42
(一) 英美基督新教傳教士為開端	42
(二) 政府力量的參與	45
(三) 社會士人的逐步投入	49
二、譯書內容的轉變	50
(一) 學科輸入的多元化	50
(二) 日譯西學的傳入	54
三、書目答問對西學的反應	58
第參章 譯書書目的編纂與著錄體例	62
第一節 譯書書目的類型	62
一、專科型譯書書目	62
(一) 《道學家傳》至《泰西著述考》：宗教譯書書目的產生	62
(二) 《曆書總目表》為開端的自然科學性譯書書目	64
二、《西學總目表》到《譯書經眼錄》：綜合型譯書書目的逐漸成長	70
(一) 《西學書目表》首開先例的綜合譯書書目	70
(二) 日譯西學傳入後所產生的譯書書目	77
(三) 兼採東學與西學的東西學書目	79
三、機構出版目錄	83
(一) 江南製造局譯書書目	84
(二) 《廣學會譯著新書總目》	87
(三) 《益智書會擬著各種書目錄》與《寓華西人自譯各書目錄》	89
第二節 譯書書目的編纂思想	90
一、介紹西學、推廣譯書	91
二、經世致用下的援引西學	93
三、維新變法與新民之道	95
第三節 譯書書目的著錄體例	99
一、繼承：類序與提要的運用	99

(一) 類序	101
(二) 提要	103
二、創新：著錄項目的多元化	106
(一) 完整的著錄項目	106
(二) 強調版本	108
(三) 著錄價值	109
第肆章 譯書書目的分類系統	111
第一節 中國古典目錄學的分類系統	112
一、因書而設類－中國古典書目的基礎	112
二、七分而四部－古今不易之法	114
三、學科分類或學術分類－中國古典書目所依循的腳步	116
第二節 西學帶來的迷惘	119
一、學尚博通的中國治學思想	120
二、儒家思想下的重道輕藝	121
第三節 譯書書目的分類體系	124
一、中國學人對西學的初步分類	125
(一) 新式學堂帶入的西方學科觀念	126
(二) 中國士人對西學的初步認知	128
二、綜合型譯書書目分類體系	130
(一) 《西學書目表》開創的「學、政、雜」體系	131
(二) 分類體系的細化	134
(三) 自行其道的《日本書目志》	138
第伍章 結論	142
第一節 譯書書目在中國目錄學史上的源流	142
一、譯書書目產生的歷史背景	143
二、譯書書目的類型與體制淵源	143

三、譯書書目的分類理念	145
第二節 譯書書目的過渡性質	146
第三節 譯書書目的學術價值	147
一、譯書書目的歷史作用	147
二、譯書書目的史料價值	148
附錄一：譯書書目書影	151
參考書目	162
1.專書	162
2.學位論文	165
3.期刊論文	166

第壹章 緒論

現代社會邁入電子化、數位化的時代，進步的電腦技術與網路環境正在一步一步改變著人類資訊傳播和使用的方式。從以往以紙本為主的圖書文獻逐漸轉向以數位、多媒體技術為主的網路資訊。資訊來源廣泛，傳播速度一日千里。數量龐大，內容繁雜的資訊，無疑的為現代人們的生活與工作帶來了極大的便利。與此同時，圖書館的領域也隨著時代的變遷，因應了資訊的增長與多元，逐步走向了數位圖書館、電子資源的美好前景。但不可諱言的，資訊的快速成長也造成了如資訊超載、資訊爆炸等從前所想像不到的社會現象。這意味著，當我們的閱讀有更多選擇的時候，人們也開始變得無所適從。

在這幾年間，坊間出現了許多推薦書目、新書目錄、出版目錄，或是各方面的專業閱讀書目。這些書籍的風行突顯了在資訊爆炸的現代社會中，經過專家選擇、整理、編寫提要的書目，提供了讀者在選擇上的依據。書目發揮了向讀者推薦圖書、指導閱讀的功用，它使讀者尋找到適合於自己的興趣和需要的圖書，也能讓讀者有方向地閱讀和研究，無疑是溝通圖書與讀者之間的重要工具。而在數位化潮流下出現各式各樣的電子資料庫，以及為了因應大量網路資訊而一直精進檢索能力的搜尋引擎，其實也正是書目功能透過現代科技下的另一種形式。

在一百多年前的晚清社會，由於西學譯書的輸入，擴大了中國固有的學術體系，但大量的譯書卻也困擾著中國士人學子的選擇。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開明書店創設啓事中曾講到：

譯書日多，優劣參半，未經提要，源流不明，不知何者當購，何者不當購，其難一也。小品下乘，已多傳述，鴻篇名著，尚未流傳……駁雜而難語精專，瑣屑而不成片段，志學之士，得門無從，其難二也。¹

¹ 轉引自魯軍，「第二次外來知識大輸入的歷史記錄—論清末譯書目錄」，《資料工作通訊》2期（1982）：頁36。

晚清社會爲了因應當時的困惑，同樣利用了編制書目的方式，希望藉由書目的整理、推薦、導讀等作用，能讓學人士子到一般民眾都能有效的吸收到新知。儘管這些書目所蒐集的圖書早已陳舊，書目本身也已成爲古籍，但在當時，它們也是以資訊傳播的先鋒而努力在晚清社會發揮著作用。

第一節 問題考察

一、變動時代背景下的特定產物：譯書書目

明朝末年，隨著傳教士的入華傳教，西方科學技術、思想文化也相繼傳入中國，隨後西學書籍更是逐步的翻譯出版。西書翻譯爲中文，開始於十六世紀的末葉。耶穌會士肇始於前，新教傳教士繼起於後。而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翻譯一事更成爲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一種特殊措施。

從明末至晚清將近三百多年的譯書史，譯書活動的主要人物從傳教士到政府、民間私人，許許多多的人士都紛紛參與其中。譯書的數量也日益增加，性質內容更是由初期單純的神學教義、天文曆法到自然科學、政經史地等無所不包，形成了一個龐大的譯書資源。譯書作爲西學東漸下的直接產物，是明末以來人們學習西方文化重要的途徑之一。近代中國政治與知識界的領袖人物，不諳外國語言文字，他們的西方知識多獲取於譯書，而在兩種文化交流的過程中，產生直接影響的，多數是翻譯而不是原著，由此可見翻譯在近代中國的重要性。譯書活動進行到晚清，譯書的大量積累與當時士人對譯書迫切需求之間，是需要一種能聯繫譯書和讀者之間的媒介，來促進譯書資源的合理和有效地利用，這種媒介就是譯書書目。

譯書書目不僅是中國從閉關自守一路發展到學習西方文明，尋求救國之道過程的必然產物，同時也反應了明末以來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軌跡。如《江南製造

局譯書事略》、《西學書目表》、《東西學書錄》、《增版東西學書錄》、《譯書經眼錄》等幾部書目在時間上是相互連接的，蒐羅了清咸豐至光緒年間（1858-1904）年間中外人士翻譯引進的一千多種西學譯書。從譯書書目中所蒐集的明清時期譯書，將能發現西學所傳入的豐富面貌，從不同角度體認中國社會是如何面對西方來的嶄新思想，展現了明朝中後期至清末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中，中西兩種不同文化、不同社會意識的碰撞過程。

二、中國古典目錄學的繼承與重建：譯書書目的角色

周積明認為「作為人類文化實踐活動的一種產品，書目無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都具有自身的文化品性。」「作為一種觀念形態的精神文化產品，中國古典目錄先天就蘊含著固有的文化品性。」「目錄學家往往具有優良的文化素質和文化修養，因此，他們比一般社會成員要更充分、更集中地體現所屬民族和時代的思想情緒和文化精神。」也由於目錄學家處於不同的時代和社會，「社會政治、經濟的變異以及由多元因素構合成的時代心態，對目錄學家有著直接的、強烈的影響，因此，古典目錄中的文化品性也相應映現出不同階段的歷史文化風貌。²」

中國近代史是一部新舊制度交替、新舊思想激蕩、中學西學衝擊融合的歷史。這些時代、社會、文化的劇變，勢必反映到目錄學領域，使得近現代中國目錄學明顯地體現出新舊並存、學科轉型、流派紛爭和起伏發展的特點，正如同鄭鶴聲所說的：「自西學東漸，諸事日新，目錄之學，因之轉變。³」

中國歷來有編撰書目的傳統，每種書目都有其內在的文化意義。譯書書目是文化交流下的特定產物，每當不同類型的文化相遇，必然會發生碰撞，雖然最終的結果多傾向於融合，但在相遇初期，各種文化勢必力求發展自己、介紹自己。

² 周積明著，《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北京市：中國青年，2001），頁7、8、10、17。

³ 鄭鶴聲著，《中國史部目錄學》（臺北市：華世，1985），頁143。

當佛教文化傳入後，爲了突顯其學術及思想上的獨特性，並由於佛經本身譯者眾多等實際因素，僧眾便藉由編著大量的書目反映其龐大的經藏，進而推廣利用。而明末開始的西學傳入，清代中後期西方勢力的影響，面對外來強大的政治力量、學術思潮，中國一方面出現了如西化論、中體西用論等理論；另外也出現了如保守派的禮教觀，保存國學、西學中源論，各種思想紛紛出籠。爲了傳播思想，達到教育的目的，書目是相當適合的工具。書目本身具有控制文獻、辨章學術的功能，用它來推薦文獻、傳播思想學術，可說是相當適切的。在文化衝突時期，書目充分被利用，成爲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種特殊現象，晚清譯書書目與國學書目的蓬勃發展，正證明了此點。因此中國目錄學的出發基礎也由往昔整理文獻逐步轉向成推薦文獻、傳播學術思想。「古典目錄學注重文獻整理，近代目錄學開始把目光轉向讀者，現代目錄學則恰當地處理了文獻整理與讀者需求的關係，講求兩者之間的書目情報交流。⁴」由於譯書書目是爲向社會大眾傳播、推廣西學譯書而編纂，編著原因上的改變，譯書書目也就成爲中國目錄學由古典向近代的轉捩點。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在傳統觀念中，目錄學是一門客觀的學科，藉由書目著錄各朝代的圖書資料，可提供學者查閱各書籍的存佚和類別的功用。中國歷代治目錄學者，多就目錄學本身進行探索，藉由涉獵目錄學家、目錄學名著等，由此涉入經史子集的國學領域。然而如僅止於此，目錄學的意義及其功用就十分狹隘。

鄭樵《通志·校讎略》說：「類例既分，學術自明，以其先後本末俱在。」
「觀其書，可知其學之源流。⁵」而章學誠在《校讎通義》中說：

⁴ 王心裁，「試論中國目錄學傳統」，《大學圖書館學報》3期（2000）：頁73。

⁵ 鄭樵，「編次必謹類例論」，《通志》，卷七十一《校讎略》。

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辯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後世部次甲乙，記錄經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闡大義，條別學術異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於墳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⁶

又說：

古人著錄，不徒為甲乙部次計。如徒為甲乙部次計，則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業、閱年二紀、僅乃卒業乎？蓋部次條別，申明大道，敘列九流百世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⁷

鄭樵、章學誠認為目錄之學，非止「部次甲乙」，更重要的是闡明學術發展源流，也就是以目錄學作為學術史之用。延續著劉向父子考辨學術源流的傳統，中國歷代書目透過編纂者個人的學術觀念選擇、編輯，那麼一定程度上，書目就變成了呈現學術風貌的史料。更進一步的說，目錄學如果是主觀的詮釋圖書文獻，那所有的分類也就具有了更深一層的意義，它們不再只是書籍的分類而已，更是學術的分類。也就是說目錄學本身的研究，實可與政治史、學術史、文化史結合起來，成為一個包羅萬象的學科領域。這應為當前目錄學研究所應思考的環節。

而近代譯書活動作為傳統中國與西方溝通的橋樑，不僅僅在國際、政治及社會上產生影響，諸如現代圖書館觀念的發芽、近代出版事業的形成以及學術思潮的轉變，都對中國圖書事業帶來相當大的衝擊。面對這樣的時代變遷，中國圖書事業是如何因應，並且發展出自己的特色，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本研究即是受此兩點啟發，力圖擴大研究範圍，以譯書書目為研究對象，希望透過譯書書目的探討能將圖書事業史的相關領域加以結合。並立基於上述所提到目錄學研究的新觀點，試圖擺脫傳統目錄學的論述，而以大歷史的視野，將譯

⁶ 章學誠，《校讎通義》序。

⁷ 章學誠，「互著第三」，《校讎通義》，卷一。

書書目的發展與時代聯繫起來，從不同觀點，探討當時譯書書目所發揮的價值及功用。整體性的觀察時空背景、文獻發展與譯書書目間的互動，見出譯書書目的文化意涵。同時，藉由對譯書書目的探討，希望對於當時的社會、文化與學術等方面，能提供更多的了解與認識。

因此，本研究擬探討：

1. 譯書書目產生的歷史背景。
2. 譯書書目的基本情況和類別。
3. 譯書書目體制的淵源。
4. 譯書書目的分類理念。
5. 譯書書目在中國目錄學史上的影響及其價值。
6. 譯書書目所發揮的社會作用。

冀望從上述幾個方向，能夠對譯書書目的整體狀況有所瞭解，進而發掘譯書書目在中國古典目錄學轉型期的意義。

第三節 研究回顧與資料運用

一、目錄學及圖書史相關領域

在目錄學領域裡對於我國近代目錄學家及目錄學思想的研究缺乏系統的成果，發表的專著及論文屈指可數。討論的方向多在於對中國古典目錄學的回顧，而以時代發展為討論的主軸。因此對譯書書目的探討，僅作為明清時期目錄學的其中一環，以寥寥數筆帶過，或是僅提兩三部書目，缺少深入的探索。

這些研究成果中，影響較大的莫過於姚名達著作的《中國目錄學史》⁸。《中國目錄學史》雖名為史，但除了介紹各種不同類型的書目、歷代書目的考證

⁸ 姚名達著，《中國目錄學史》（上海市：上海古籍，2005）。

外，另外也有專述目錄學理論的部分。書中對譯書書目的研究涉獵較多，也對譯書書目的收集及分類體系多有著墨，內容較相關著作齊全豐富。但因書中區分各類型書目的依據為收錄的文獻內容，所以譯書書目被分散在「宗教書目」、「翻譯書目」、「專科書目」下來討論，缺少對譯書書目整體的研究與評價。也因為其為目錄學專著，故缺乏對當時文化交流、社會因素、譯書活動等譯書書目發展背景的建構，較難以對譯書書目有全面性的瞭解。而其他通論性的目錄學重要著作⁹內容多集中在古代少數傑出的目錄學家和幾部有價值書目的研究，雖然在書目的分類源流及學術價值上有深入的見解，但研究的範圍與視野都少見譯書書目。

而近年來對目錄學的研究雖然研究量逐步增加，研究視野加廣，但仍以一般性的概論為主。內容大致上可區分為3類：首先為中國目錄學史方面的專著，著重在從政治、社會變遷切入，討論書目與時代背景間的關連¹⁰；或是介紹歷代書目，討論目錄學的原理、流別、分類法、專科、特種等問題的論著¹¹；還有以教學為主，系統化的討論目錄學的理论及思想的專著¹²。但這些目錄學著作中仍少有對譯書書目的深入刻劃。例如在目錄學史的專著中，僅概略的介紹譯書書目，說明其為西學影響下的產物，看法也多因襲舊有觀念。或是在討論繼四部法之後興起的書日時，以少量篇幅介紹《書目答問》、《西學書目表》、《古越藏書樓

⁹ 許世瑛著，《中國目錄學史》，《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2輯（臺北市，中華文化事業出版委員會，1954）；蔣元卿著，《中國圖書分類之沿革》（臺北市：中華，1966）；王重民著，《中國目錄學史論叢》（北京市，中華，1984）；昌彼得、潘美月著，《中國目錄學》（臺北市：文史哲，1986）；汪辟疆著，《目錄學研究》（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¹⁰ 鄭鶴聲著，《中國史部目錄學》（臺北市：華世，1985）；呂紹虞著，《中國目錄學史稿》（臺北市：丹青，1986）；喬好勤著，《中國目錄學史》（武漢市：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李瑞良著，《中國目錄學史》（臺北市：文津，1993）；余慶蓉著，《中國目錄學思想史》（長沙市：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¹¹ 李曰剛著，《中國目錄學》（臺北市：明文，1983）；余嘉錫著，《目錄學發微》（成都市：巴蜀書社，1991）；胡楚生著，《中國目錄學》（臺北市：文史哲，1995）；劉兆祐著，《中國目錄學》（臺北市：五南，2000）。

¹² 白國應著，《圖書分類法》（北京市：書目文獻，1981）；傅榮賢著，《中國古代圖書分類學研究》（臺北市：學生，1999）；俞君立、陳樹年主編，《文獻分類學》（武漢市：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彭斐章、喬好勤、陳傳夫編著，《目錄學》（武漢市：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

書目》等幾部較為著名的改良四部法的書目，之後便從孫毓修引進杜威分類法後的變革說起。這樣的安排，缺少時代的連續性，更加無法解釋為什麼中國在接受到杜威分類法後即傾向杜威分類法的潮流。而在討論目錄學理論的專著中，因為譯書書目本為中國古典目錄學過渡時期的產物，缺少理論建構及長時間的茁壯發展，自然少有關注。早期劉簡《中文古籍整理分類研究》¹³、近年大陸出版的《中國文獻分類法百年發展與展望》¹⁴兩書，其中蒐集了相當完整的書目及近代分類法，前者不僅對古典目錄學時代的書目蒐羅齊全，在第三章「近代圖書分類法」的部分，對中國古典書目轉型到杜威分類法其間的各種新式分類法整理齊全，但內容完全沒有提到譯書書目的部分，皆以圖書館分類法為主。而後者雖然對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圖書分類法做出詳盡的蒐集與考據，但一樣將目光集中在西方分類法的引進後的轉變，殊為可惜。須知古典書目作為中國古典目錄學理論發揚實踐的結晶，本為文獻整理下的成果，與新式圖書館分類法乃是依照學科架構下先行塑造的體系，本質上有著極大的差別。譯書書目作為這段轉型期間的書目體現，對譯書書目的整體認識及理論爬梳，將能更加清楚銜接古典至近代至現代的中國目錄學發展歷程。

除專書外，學界針對近代目錄學的研究以專文為主，涵蓋層面也較廣。許剛的碩士論文《中國私家目錄與時代學術文化》¹⁵，以私家目錄的影響為主軸，具體說明兩次外來文化影響下，佛教文化與西學東漸對私家目錄的影響。陳耀盛在《文化的異質交流與目錄學的嬗變》¹⁶一文，認為異質文化的引入造成學術上不融合的特徵，而目錄發展深受學術思潮的影響，造成了異質文化下目錄學幾次劇烈的變遷，正與許剛的論點相互呼應。梁進學的碩士論文《試論清末民初舉要目

¹³ 劉簡著，《中文古籍整理分類研究》（臺北市：文史哲，1981）。

¹⁴ 俞君立主編，《中國文獻分類法百年發展與展望》（武漢市：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

¹⁵ 許剛，「中國私家目錄與時代學術文化」（貴州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5月）。

¹⁶ 陳耀盛，「文化的異質交流與目錄學的嬗變」，《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期（2000）頁32-35。

錄的發展》¹⁷，則是針對清代學要目錄的發展做出相當完整的說明，其中戊戌到庚子時期的新學書目篇章以譯書書目為對象，突顯晚清譯書書目發展的一種現象，即是書目作為維新派宣揚西學的主要工具，而為了達到此一目的，書日以學要目錄為主，同時更加注重類序的運用。另外，針對維新派人士的目錄學思想，閔定慶曾發表過《維新派目錄學的文化內蘊》¹⁸一文，而維新派中以康有為、梁啟超二人最為著名，也積極投入在目錄學領域，針對他們兩人的目錄學思想，學界也有相當多的討論¹⁹。

一直以來討論譯書書目的專文並不多，皆以期刊專文的方式發表²⁰，篇幅不多，因此內容均為通論的敘述，研究不夠深入，觀點也大多相互因襲。針對單一譯書書目的研究，以梁啟超的《西學書目表》影響最大，也較為風行，所以有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切入討論²¹。黃慶澄所著的《中西普通書目表》，也有學者撰專文討論²²。沈國威對康有為《日本書目志》的專文²³最為深入，並提出許多新穎的論點。如《日本書目志》體制上受到當時日本出版社、書肆的目錄所影響，以及在書目中運用了許多大量的日語新詞，都是前人所未涉及的方向。另外針對晚清在譯書過程活動中相當重要的江南製造局，王揚宗在《江南製造局翻譯書目

¹⁷ 梁進學，「試論清末民初學要目錄的發展」（華東師範學院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5月）。

¹⁸ 閔定慶，「維新派目錄學的文化內蘊」，《學術研究》3期（1994）：頁83-87。

¹⁹ 陳耀盛，「論康有為目錄學思想」，《近代史研究》3期（1995）：頁179-194；孟昭晉，「康有為的書目實踐」，孟昭晉著，《書目與書評》（石家莊市：河北教育，2004）。梁松濤，「梁啟超文獻學思想研究」（河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6月）。

²⁰ 魯軍，「第二次外來知識大輸入的歷史記錄—論清末譯書目錄」，《資料工作通訊》2期（1982）：頁34-40；張志偉，「近代東西學書目初探」，《四川圖書館學報》2期（1989）：頁33-39；袁彤，「西學書目簡介」，《圖書館工作與研究》6期（1998）：頁55-56；林立強，「明至清末譯書書目的狀況與評價」，《東南學術》3期（1999）：頁106-109。

²¹ 劉靜，「略論梁啟超的西學書目表」，《山東圖書館學季刊》1期（1994）：頁63-67；傅榮賢，「西學書目表論」，《山東圖書館季刊》4期（1996）：頁56-60；劉明鑑，「從西學書目表看梁啟超早期目錄學思想」，《圖書館學研究》1期（1997）：86-91；艾克利，「論梁啟超的新學書目」，《西安外國語學院學報》第7卷1期（1999）：頁66-69。

²² 潘猛補，「黃慶澄與中西普通書目表」，《圖書館研究與工作》3期（1993）：頁40-42。

²³ 沈國威，「康有為及其日本書目志」，《Journal of studies on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West》五號（2003），頁51-68。

新考》²⁴一文中對江南製造局曾出版過的 5 種譯書書目進行相當完整的考證，並對之前相關研究提出了前人的缺失。但其他諸如《曆書總目表》、《農務要書簡明目錄》、《譯書經眼錄》等數十種譯書書目，都少有專門且深入的討論。

除了目錄學領域外，在相關的圖書史領域中也有可資借鑒的著作。如李雪梅著有《中國近代藏書文化》²⁵，對近代中國的藏書家、藏書目錄多有著墨。陳力、謝灼華與蕭東發皆著有中國圖書史相關的著作²⁶，其中均有相當的篇幅在描述中國近代的部分，對當時在西學影響下包含目錄學、圖書館及圖書事業都有深入的敘述。而來新夏及其學生一同著作的《中國近代圖書事業史》²⁷，更是將焦點集中在近代明清時期，討論到譯書活動的進行，從中分析傳教士、洋務運動、維新派等知識群體對當時圖書事業的影響。程煥文所著《晚清圖書館學術思想史》²⁸，內容著重在維新派人士建立圖書館的歷程上，所以對當時康、梁二人的目錄學思想有深入的剖析。這些論著雖然並非譯書書目的專門論著，但可提供當時政治、社會、知識份子與圖書館思想的資料，加強研究的全面性。

本研究在回顧了譯書書目的相關論述後，後續在譯書書目的收集與整理過程中，先運用了上述所提與譯書書目有關的專文，作初步的爬梳，進而使用許多書目方面的工具書以資確認，反覆驗證。如王紹曾主編的《清史稿藝文志拾遺》²⁹，在史部目錄類中就有「譯述之屬」的部分。來新夏主編的《清代目錄提要》³⁰，蒐集豐富的清代書目，而且有簡明的敘述，方便對照。梁子涵所編的《中國歷代書目總錄》³¹中將歷代書目區分為 5 大類，在「學科書目」中的「天主教基督教書目」，以及「特種書目」中的「翻譯書目」，都屬於譯書書目的著述。而

²⁴ 王揚宗，「江南製造局翻譯書目新考」，《中國科技史料》第 16 卷 2 期（1995）：頁 3-18。

²⁵ 李雪梅著，《中國近代藏書文化》（北京市：現代，1998）。

²⁶ 陳力著，《中國圖書史》（臺北市：文津，1996）；蕭東發著，《中國圖書出版和印刷史論》（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謝灼華，《中國圖書與圖書館史》（武漢市：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

²⁷ 來新夏等著，《中國近代圖書事業史》（上海市：上海人民，2000）。

²⁸ 程煥文著，《晚清圖書館思想史》（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²⁹ 王紹曾主編，《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北京市：中華，2000）。

³⁰ 來新夏主編，《清代目錄提要》（山東：齊魯書社，1997）。

³¹ 梁子涵編，《中國歷代書目總錄》（臺北市：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3）。

姚名達所著《中國目錄學年表》則羅列了各書目的刊刻時間，考據嚴謹，提供年代與作者的查考。然因時代久遠、考證不易，不免有所疏漏，但仍為本研究擬定了較諸類似研究更為完整的明至清末譯書書目的清單。

近年來許多書目的重新出版³²，有助於目錄學領域的研究，但譯書書目仍然是較缺乏關注的一環。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近代譯書目》³³，其中收錄有《泰西著述考》、《增版東西學書錄》、《譯書經眼錄》、《江南製造局譯印圖書目錄》、《廣學會譯著新書總目》、《馮承鈞翻譯著述目錄》等 6 部譯書書目，是目前僅有針對譯書書目的出版品，為本研究提供相當大的助益。然而因為歷來對譯書書目的忽略，除了部分譯書書目尚有原書可供利用外，其他的則必須運用文集或叢書來搜尋。部分的譯書書目則因時代久遠及少見流傳，如無法取得原書，則透過前人的研究資料，從中獲取資料分析。如此則難免有疏漏及不夠完整之憾，但實為不得已。

由於近年來史學家對出版史、編輯史的注意，認為這部分的史料有益於擴大近代史研究的面向，補足傳統史料的不足，於是坊間出版了許多史料集。李希泌、張淑華編的《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³⁴、汪家熔輯注的《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³⁵、張靜盧輯註的《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³⁶都是這類領域中相當重要的出版物，收錄了許多有關於譯書活動及譯書書目相關的史料文件，為本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原始資料來源。

³² 嚴靈峯編，《書目類編》（臺北市：成文，1978）；嚴佐之著，《近三百年古籍目錄舉要》（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徐蜀、宋安利編，《中國近代古籍出版發行史料叢刊》（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周振鶴編，《晚清營業書目》（上海市：上海書店，2005）。

³³ 王韜、顧燮光等編，《近代譯書目》（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³⁴ 李希泌、張淑華編，《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後）（北京市：中華，1982）。

³⁵ 宋原放主編；汪家熔輯注，《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武漢市：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³⁶ 張靜盧輯註，《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上海市：上海書店，2003）。

二、中西文化交流及譯書活動

譯書書目的出現，導因於譯書數量的大幅提昇，而譯書即為西學東漸過程中的產物。因此如果沒有西學的傳播與中西文化間的交流、衝突、融合，也就不可能產生譯書書目。如果脫離了西學東漸的發展背景，我們便無法掌握譯書書目發展的歷史脈絡。

學界專論明清時期文化交流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清代。清代對西學的傳播就已經有相當多的討論，傅蘭雅的《江南製造局譯書事略》³⁷，孫維新的《泰西格致之學與近代刻翻譯諸書詳略得失何者為最要論》³⁸，梁啟超的《讀西學書法》³⁹，三者從不同角度出發，以譯書做為論述的出發點，對晚清西學傳播作了階段性的歸納與總結，成為此一課題的研究開端。民國以後對明至清末的西學傳播論著也逐漸增多，周昌壽編的《譯刊科學書籍考略》⁴⁰書中考據了明末到 1936 年間中國翻譯西方科學書籍的書目，但書目部分缺漏不少，也缺乏研究、議論的部分。張蔭麟著的《明清之際西學輸入中國考略》⁴¹則是針對明末至清乾隆時期西學引進的概略性研究，由於缺少晚清譯書的部分，也使研究的整體性失色不少。上述研究皆缺少對甲午戰後通過日本轉口輸入西學的研究。

近代中國與日本同樣經歷鎖國、接納西學的過程，而在甲午戰後，中國體會到與日本間的差距，進而尋求從日本加速學習西學的過程，而這也反應在譯書書目上，如《東籍月旦》、《日本書目志》的出現。往昔這一方面是學界較少觸及的一環，譚汝謙《日本譯中國書綜合目錄》的序言⁴²，針對中日之間譯書事業的

³⁷ 載於清光緒 6 年（1880）《格致匯編》卷 5 至卷 8。傅蘭雅撰；孔慶和，王冬立，張宇澄等編，《格致匯編》（南京市：南京古舊書店，1992）。

³⁸ 王韜編，《格致書院課藝》第 7 冊，頁 10。

³⁹ 載於清光緒 23 年（1897）《西學書目表》。梁啟超編，《西學書目表》。

⁴⁰ 周壽昌編，「譯刊科學書籍考略」，胡適、蔡元培、王雲五編，《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民國叢書》第二編 98（上海市：上海書局，1989）。

⁴¹ 張蔭麟著，「明清之際西學輸入中國考略」，李毓澍編，《張蔭麟先生文集》（臺北市：九思，1977）。

⁴² 原文為日本譯中國書綜合目錄序言，譚汝謙主編；小川博編，《日本譯中國書綜合目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1）。

歷程提出了相當完整的考據，深入研究了中國通過日本轉口西學的問題，補足了這方面的不足。

近來中國學者在明清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上不僅涉及的內容、地區以及研究角度都較以前廣泛，而且在研究方向、開拓的主題和論證方法等方面也不斷呈現新的趨勢和新內容，有助於進一步深化明清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在綜合性論著上的代表性著作之一是熊月之的《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⁴³，內容著重在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之後西學在中國傳播的情況，以涉及譯書的人物、機構為經，時代為緯，交織出西學傳播的各種面向。另外如馬祖毅所著的《中國翻譯史》⁴⁴，也是較受人關注的，其中對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前的翻譯活動、重要西書、以及翻譯者都有介紹，討論的範圍也相當廣泛，如文學、藝術等都包含在內。但仍有些問題存在，如因注重角度的不同，所以偏重於翻譯過程的介紹，較少討論到西學與社會間的聯繫，以及部分內容不夠深入，而延續傳統的看法。

在圖書文獻的專門領域中，彭斐章主編的《中外圖書交流史》⁴⁵、潘玉田及陳永剛合著的《中西文獻交流史》⁴⁶為中西文獻交流方面總體性研究的成果。另外如計文德出版其碩士論文《從四庫全書探究明清間輸入之西學》⁴⁷，以《四庫全書》為出發點，以《四庫全書》收錄耶穌會士所編譯西書為主體描述，從側面反映西學的傳播與本土回應。

在專文的部分，最為重要的莫過於錢存訓所發表的《近代譯書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⁴⁸。文中共分 6 章，運用計量目錄學的方法，依據徐維則《東西學書錄》、顧燮光的《譯書經眼錄》等譯書書目來分析西學的傳播內容，不過有些問題存在，如錢存訓所依據的版本是初版的東西學書錄，與後來經顧燮光增訂的

⁴³ 熊月之著，《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市：人民，1994）。

⁴⁴ 馬祖毅著，《中國翻譯史》（武漢市：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⁴⁵ 彭斐章主編，《中外圖書交流史》（長沙市：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⁴⁶ 潘玉田、陳永剛著，《中西文獻交流史》（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⁴⁷ 計文德著，《從四庫全書探究明清間輸入之西學》（臺北市：漢美，1991）。

⁴⁸ Tsuen-hsuei Tsien, "Western Impact on China through Translation," *Far Eastern Quarterly*, 8: 3(May 1954), 305-327.

《增訂東西學書錄》，在所收書上有三百餘種的落差，影響了分析的科學性。但其所運用的研究方法、時代斷序及觀念都深深影響了後續相關研究，成為後續研究中西文化交流、譯書活動的基礎。

三、西學思潮及分類系統的轉化

自從中國古典目錄學第一部系統著作《七略》產生之後，《七略》以降的各種官修、私修和史志書目都無一例外地採用分類的形式實現對圖書文獻的整序。因此透過對書目分類系統的探究，將能發掘出書目內含的編纂意念。

傅榮賢在其《中國圖書分類學》中說：

圖書分類在整序文獻的同時，也整序了文獻背後的文化。因此，分類學系統與其被整序的文化背景，在總體精神上應該是相符合的。用以區分圖書分類學的基本態度和策略，其實也必定是相關文化的基本態度和策略。⁴⁹

說明了圖書文獻乃是學術思想的載體，因此書目在進行圖書分類時最基本的依歸，自然與當時學術發展與社會文化相呼應。周彥文進一步闡述了中國古典目錄學的分類特質：

西方的「圖書分類法」是以「分類法」為著眼點，學術分類是他們製定分類法的憑據；可是中國的目錄學家著眼點卻在學術分類，他們在架構學術系統時，理所當然的也架構了一套隸置圖書的系統。前者是用分類法來統屬圖書，可是後者卻是在劃分圖書的學門時，形成了分類的型式。所以，中國的目錄學中能形成許多不同的分類方法，就是因為各人的學術系統理念不同的原故。⁵⁰

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古典目錄學的分類根源於「學術分類」，是故歷代目錄學家

⁴⁹ 傅榮賢著，《中國古代圖書分類學研究》（臺北市：學生，1999），頁1。

⁵⁰ 周彥文著，《中國目錄學理論》（臺北市：學生，1995），頁3。

種種不同的分類主張，都是因個人學術觀點的歧異而有所異同。因此中國古典目錄學的核心，一直都被認為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對於這種狀況，王京山解釋為：

為實現「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的，為充分揭示出學術文化發展的歷史過程及其來龍去脈，傳統目錄學要著重典籍內容，採用分類目錄的形式，以便從文獻的學術內容出發實現對文獻的標引和檢索。在分類的基礎上，再以「提要、解題」等內容著錄項目揭示典籍的學術內容和文化內涵。⁵¹

因此中國歷代書目大體上能反映出時代學術分類與學科的發展狀況。換言之透過對當時文化、學術的探索，將能更加體認出書目的分類精神與隱含其中的當代文化縮影。

西學的引進，對中國方面的學術思潮是一種移植、轉化的過程，影響了許多中國固有的學科知識與內容。梁啟超最早在這方面有其立論，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⁵²中，首次提出西學東漸對明末清初啟蒙學者思潮的影響，在書後也列出了耶穌會士譯著書籍，並且首度對西學文獻進行了總結和歸類。而眾多學者更是以其本身專業學術背景出發，來探討西學對中國各傳統學科的影響。這些西方新式學科的傳入無疑擴大了中國固有的知識體系。

西學傳入的豐富內容，勢必對中國傳統的學術體系有很大的衝擊。其間的關係遠非「引進」、「輸入」、「移植」這麼簡單。明清之際人們在理解西學的過程中，有一個不斷借用傳統架構又突破傳統架構的過程，也就是從本土豐富的學術分類系統中去尋找接引西學的架構，中國古典目錄學正是其所援用的主體之一。正如同左玉河所說：

中國典籍四部分類法轉向西方近代圖書分類法，是中國知識系統在晚清

⁵¹ 王京山，「中國傳統目錄學辨考與致用的辯證思考」，《圖書與情報》2期（2002）：頁25。

⁵² 梁啟超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市：東方，1996）。

時期重建之體現。這種典籍分類之演化，不僅僅是改變典籍分類法之簡單問題，而是從以四部為框架的中國傳統知識系統，向以學科為主的西方知識系統轉變之重大問題。表面上是將「四部」分類體系下之典籍歸併到「十進法」圖書分類體系中，實質上則是將四部之學知識系統逐漸消解掉，融入到近代新知識系統中。⁵³

在討論中國現代學術轉型問題的論著中，如桑兵提出《晚清民國的知識與制度體系轉型》⁵⁴、羅志田發表的《西學沖擊下近代中國學術分科的演變》⁵⁵、2005年黃興濤、胡文生《論戊戌維新時期中國學術現代轉型的整體萌發—兼談清末民初學術轉型的內涵和動力問題》⁵⁶、李剛發表的《知識分類的變遷與近代學人治學形態的轉型》⁵⁷等文初步勾勒出了精要的研究方向。隨著研究的深入，胡文生發表的博士論文《學術·體制·人—晚清學術轉型的多維透視》⁵⁸分別以《書目答問》、學院改制、現代知識分子等層面綜論此一問題。孫青發表的博士論文《晚清之西政東漸與本土回應》⁵⁹，其中在第二章「晚清中文語境內西方政治之學內容的基本載體—書目與譯本」、第五章「中學與西政—西政東漸的本土回應」兩部分都以譯書書目作為研究的主體，以學術體系的轉化，來探討中國政治學在西學影響下的改變。以及左玉河發表的《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⁶⁰都是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

⁵³ 左玉河著，《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上海市：上海書店，2004），頁330。

⁵⁴ 桑兵，「晚清民國的知識與制度體系轉型」，《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4卷6期（2004）：頁90-98。

⁵⁵ 羅志田，「西學衝擊下近代中國學術分科的演變」，《社會科學研究》1期（2003）：頁107-114。

⁵⁶ 黃興濤、胡文生，「論戊戌維新時期中國學術現代轉型的整體萌發—兼談清末民初學術轉型的內涵和動力問題」，《清史研究》4期（2005）：頁36-50。

⁵⁷ 李剛，「知識分類的變遷與近代學人治學形態的轉型」，《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5期（2005）：頁72-77。

⁵⁸ 胡文生，「學術·體制·人—晚清學術轉型的多維透視」（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年6月）。

⁵⁹ 孫青，「晚清之西政東漸與本土回應」（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年4月）。

⁶⁰ 左玉河著，《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上海市：上海書店，2004）。

以上概略介紹了目前對譯書書目及相關課題的研究情況，從不同的方向回顧了前人對目錄學及圖書史相關領域、中西文化交流及譯書活動、西學與分類系統的討論，上述論著各有題旨和重點。由於譯書書目為目錄學研究中較少人關注的領域，因此在研究資料上必須以其他學科領域來輔助，方能拼湊出譯書書目及近代目錄學的全面圖像。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論文結構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致力的方向，乃是希望將譯書書目的形成、成長與歷史變遷、社會發展聯繫起來，整體性的觀察時空背景、文獻交流與譯書書目間的相互影響。進而從中發現譯書書目內在的文化意涵與精神價值，理解中國知識界在中西文化交流下所做出的反應與回饋。為了達到這樣的研究目的，必須採用多層面的觀點以及交叉的結構論述等，以樹立嚴謹的理論架構。因此本研究將著重於 2 個方向：

（一）以縱向的時間發展結合橫向的社會背景

探討譯書書目的發展，著重的便是時間縱向的發展，以及橫向社會背景的相關聯繫，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即是這個縱橫交叉的論述結構。首先譯書是譯書書目的核心，考察譯書的情況與內容，展現譯書書目的淵源與脈絡。其次，是譯書書目的發展，各時期譯書書目各有內容與形式上的差異，沿著時間進展做出觀察與說明，將同時期的社會、政經、學術思潮等橫向背景也加入考量。

（二）比較映襯法的特質突顯

就譯書書目發展來說，一則對各時期譯書、譯書書目形式、內容的演變情況

做相互的比較，以表現各階段的發展特色；二則將各種譯書書目進行體制異同的勘驗，藉以歸納譯書書目的體制特質；三則對照前後期譯書書目的分類思想、類名設立，瞭解編纂者對西學接受、解釋的程度。觀察譯書書目演進過程中編撰方式、類型的轉變，可進一步討論譯書書目與傳統書目間滲透與轉化的狀況。

二、論文結構

本研究擬從研究明清時期譯書書目來理解中國古典目錄學在西學影響下所做出的反應與回饋。在內容方面，除了緒論及結論外，分為 3 章 9 節及若干小目來討論，以下僅就各章的結構分述如下：

第貳章：譯書書目形成的歷史脈絡。首先回顧西學輸入中國的時間和內容等環節。分析中西方的社會、文化背景，以及當時的中西雙方是如何交流。進一步再按照歷史進程與內容特徵區分為數個階段，探究每個階段中西文化交流的內涵以及明清時期中國古典目錄學的發展概況，瞭解當時的時代氛圍與學術思潮。

第參章：譯書書目的編纂與著錄體例。則是對譯書書目的發展概況及體例加以探討。從譯書書目的類型切入，將譯書書目分為專科型、綜合型、出版目錄。藉由對譯書書目類型的區分，將能對譯書書目的內容有初步的認識。而後進一步釐清譯書書目的編纂思想及體例的運用，深入認識譯書書目的編纂意涵。

第肆章：譯書書目的分類系統。是對譯書書目的分類理念作進一步的探討，從中國本土學術傳統自身的發展，及西學學術體系影響這兩條線索入手。希望在此基礎上，理解譯書書目在中國四部分類法框架下是如何因應圖書分類與學術體系的轉化，藉以呈現近現代中國目錄學的發展與改變。

綜合以上所述，明清時期中西文化交流、譯書活動的歷史脈絡，以及中國本土知識份子面對西學的解讀和應對方式這兩個層面，就是本研究討論明清時期譯書書目的狀況與評價之主軸。

第五節 研究範圍

一、研究對象

廣義說來，所有的溝通行為都是翻譯行為，閱讀、書寫、言談等語言行為，都屬於翻譯的領域。具體而言則應指把一種語言或語言變體的內容變為另一種語言或語言變體的過程與結果，或者說把用一種語言材料構成的文本用另一種語言準確而完整的再現出來。⁶¹由此可以發現翻譯為兩種不同語言或文字間的轉化。「翻譯」一詞原指將佛典翻成漢語的活動。⁶²後則逐漸推廣於梵語之外的語文，最明顯的即為明代以降西洋書籍的翻譯。因此我們在談到中文翻譯時，可大概區分為外文中譯與中文外譯，本研究所指的翻譯，係由外文譯為中文而不更改其內容者為限。譯書則為不同語言間文字轉換的物質載體，而本研究中所指的譯書均指外文中譯圖書。

根據《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的說明，書目記載各書書名、著者、版本、出版年、出版地、出版者、間附價格、著者生平、圖書內容、授受源流、收藏處所等，內容詳簡不一，多按分類排列。⁶³大陸方面則定義書目為著錄一批相關文獻，按照一定次序編排而成的揭示與報導文獻信息的工具。⁶⁴

書目種類繁多，略分為：（1）圖書總目，含書目總錄、叢書書目、聯合書目、展覽書目；（2）藝文志，含正史藝文志、郡邑藝文志、著述考；（3）特種書目，含著本、解題、選書、營業、版本、禁書、辨偽、翻譯、引用、知見、闕書、兒童、非書資料等書目及書日期刊；（4）藏書目錄；（5）各學科書目。⁶⁵譯書書目屬於特種書目，本研究中專指將譯書收錄編輯而成的書目。至於當時盛

⁶¹ 林煌天主編，《中國翻譯詞典》（武漢市：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頁167。

⁶²（宋）釋法雲稱：「夫翻譯者，謂翻梵天之語轉成漢地之言，音雖似別，義則大同。」釋法雲撰，《翻譯名義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31（臺北市：商務印書館，1967），頁2。

⁶³ 胡述兆總編，《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臺北市、漢美，1995），頁1203。

⁶⁴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北京市：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頁262。

⁶⁵ 同註63，頁1204。

行的藏書樓書目雖然也有收藏譯書，也有部分書目因應譯書的出現做類目的調整，如清光緒三十年（1904）徐樹蘭編《古越藏書樓書目》、光緒三十三年（1907）楊復、胡煥編《浙江藏書樓書目》即屬於此類。但由於書日本身並非針對譯書而編撰，因此本研究不列入討論範圍。而當時社會中諸如書店的營業書目、書業公會檔案以及報刊上的售書廣告也多有譯書的書目資料，⁶⁶然而這些書目並未獨立強調譯書以及缺乏完整的類名、款目、編排方式，因此也不列入討論範圍之內。

本研究中討論譯書著作時，並不限定於中譯西文書籍、書目。因在甲午戰爭之後，日本成爲中國西方思想的引進主要輸入之處，中國大量引進日本著作，並加以翻譯，於是將中譯日文書籍、書目也納入研究內容，如康有爲所編的《日本書目志》以及梁啓超編《東籍月旦》等即屬此類型之譯書書目。

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幾年時間內，中國還出現了一些將以往翻譯出版的報刊文章和書籍輯錄出版的西學叢書。譬如光緒二十一年（1895）孫廷翰輯錄的《西學叢書》、光緒二十二年（1896）富強齋主人輯錄的《西學富強叢書》、光緒二十三年（1897）梁啓超輯錄的《西政叢書》，光緒二十九年（1903）梁啓超輯錄的《新學大叢書》等十餘種。這十餘種叢書因非書目性質，並不列入研究範圍，但其在分類理念上與譯書書目相互影響，在本研究中會參酌討論。

以下將本研究所蒐集到的譯書書目整理如表一，共 47 種：

【表一】明末清季譯書書目整理（依書目筆畫排序）

書目名稱	編纂者	版本或年代	備註
《天文算法考》	梁兆鏗	清光緒年間稿本	
《上海製造局譯印圖書目錄》	上海製造局 翻譯館	民國年間鉛印本	即江南製造局

⁶⁶ 參見周振鶴編，《晚清營業書目》（上海市：上海書店，2005）；徐蜀，宋安利編，《中國近代古籍出版發行史料叢刊》（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日本書目志》	康有為	清光緒 23 年（1897） 上海大同譯書局石印本	
《日本理學書目》	杜亞泉	載於清光緒 27 年（1901） 亞泉雜誌 7 期	
《日本理學數學書目》	杜亞泉	載於清光緒 27 年（1901） 亞泉雜誌 8 期	
《日本算學書目》	杜亞泉	載於清光緒 27 年（1901） 亞泉雜誌 9 期	
《中西普通書目表》	黃慶澄	清光緒 24 年（1898）算學館 刻本	亦作《普通學書目錄》
《西士書目》	韓霖	年代不詳	載於竹庵庵書目 姚名達考即《道學家 傳》。
《西書提要》	梁啟超	此書目未成	
《西學書目表》	梁啟超	清光緒 23 年（1897）時務報 本	
《增訂西學書目表》	盧靖	清光緒 23 年（1897）慎始基 齋叢書本	
《通商以前西人譯著各 書》	梁啟超	清光緒 23 年（1897）時務報 本	附於《西學書目表》後
《近譯未印各書》	梁啟超	清光緒 23 年（1897）時務報 本	附於《西學書目表》後
《中國人所著書》	梁啟超	清光緒 23 年（1897）時務報 本	附於《西學書目表》後

《西書考》	胡兆鸞	清光緒 23 年（1897）長沙刻本	亦作《西學通考》
《江南製造局翻譯西書事略》	傅蘭雅	載於清光緒 6 年（1880）格致匯編本卷 5 至卷 8	
《益智書會擬著各種書目錄》	傅蘭雅	載於清光緒 6 年（1880）格致匯編本卷 5 至卷 8	附於《江南製造局翻譯西書事略》後
《寓華西人自譯各書目錄》	傅蘭雅	載於清光緒 6 年（1880）格致匯編本卷 5 至卷 8	附於《江南製造局翻譯西書事略》後
《江南製造局繙譯各種西書目》	未著編人	清光緒 30 年（1904）南海馬氏翻刻本	
《江南製造局記》（圖書目）	魏允恭	清光緒 31 年（1905）刻本	
《江南製造局譯書提要》	陳洙	清宣統元年（1909）刻本	
《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	費賴之	清光緒年間刊本	
《東西學書錄提要總敘》	沈桐生	清光緒 23 年（1897）讀有書齋刊本	
《東西學書錄》	徐維則	清光緒 25 年（1899）江南製造局刊本	
《增版東西學書錄》	徐維則輯； 顧燮光補輯	清光緒 28 年（1902）年石印本	
《東西人舊譯著書》	徐維則	清光緒 25 年（1899）江南製造局刊本	附於《東西學書錄》後
《中國人輯著書》	徐維則	清光緒 25 年（1899）江南製	附於《東西學書錄》後

		造局刊本	
《東籍月旦》	梁啓超	載於清光緒 28 年（1902）新民叢報	
《耶穌會士著述目》	未著編人	年代不詳	載於清吟閣書目
《耶穌會士西洋姓氏著述目》	未著編人	年代不詳 鈔本	
《若水齋古今算學書錄》	劉鐸	清光緒 24 年（1898）刊本	
《科學書目提要初編》	王景沂	清光緒 29 年（1903）年北洋官報局鉛印本	
《道學家傳》	韓霖、張賡	年代不詳 清刊本	附於《聖教信證》後
《泰西著述考》	王韜	清光緒 16 年（1890）鉛印本	姚名達考即《道學家傳》
《通學書籍考》	述廬	清光緒 25 年（1899）排印本	亦作《通學書目考》
《農務要書簡明目錄》	傅蘭雅口譯；王樹善筆述	清光緒 27 年（1901）上海製造局刻本	
《新學書目提要》	沈兆燁	清光緒 29 年（1903）上海通雅書局鉛印本	
《新學書目提要》	通雅齋同人	清光緒 29 年（1903）上海通雅書局鉛印本	
《福建求治局採錄西學書目》	未著編人	年代不詳 鈔本	
《算學考初編》	馮澄	清光緒 24 年（1898）刊本	

《算學書目題要》	丁福保	清光緒 25 年（1899）埃實學堂刻本。	
《廣學會譯著新書總目》	廣學會	清末鉛印本	
《曆書總目表》	徐光啓	載於明崇禎四年（1631）崇禎曆書	
《譯書經眼錄》	顧燮光	清光緒 30 年（1904）撰；民國 23 年（1934）杭州金佳石好樓石印本	
《本國人輯著書》	顧燮光	清光緒 30 年（1904）撰；民國 23 年（1934）杭州金佳石好樓石印本	附於《譯書經眼錄》後
《譯書提要》	未著編人	清光緒 33 年（1907）北京政治官報局排印本	
《譯書表》	王仁俊	年代不詳 梁啓超慕真軒藏王氏手稿本	

二、時間斷序

中西文獻交流從古自今持續不斷的進行，但明清之前多為宗教的文獻交流，如佛教、景教、回教文化的傳入。直到明清時期，在文藝復興、科學革命影響下的近代西洋學術思想才逐漸傳入中國。這段從十六世紀開始的西學文獻輸入，無論在數量、涉及範圍、影響上都非之前所能比擬。針對這段對近代中國產生重大影響的時間歷程，各家說法不一，如郭廷以認為約略可分為三期：明清之際；清代道咸同光；民國初年。⁶⁷張蔭麟則認為可分為兩期：第一期始於明萬曆中葉

⁶⁷ 郭廷以，「近代科學與民主思想的輸入—晚清譯書與西學（上）」，《大陸雜誌》第 4 卷 1 期（1952）：頁 1。

(1573-1619)，至清乾隆中(1736-1795)而絕；第二期始於清咸豐年間至同治(1851-1874)的洋務運動以至今日。⁶⁸而潘玉田在《中西文獻交流史》則區分為：明末清初(1582-1722)；清中期，主要是指乾隆繼位到道光二十年(1736-1840)；第三階段是清末(1840-1919)。⁶⁹雖然各家從不同角度切入造成時間分期上的歧見，但大抵依照明末清初、清中期、晚清的軌跡。而明至清末中西學的傳入與翻譯，在一開始雖也以教義為主，但同時也引進了許多有關自然科學、人文藝術的書籍。而後當政府與民間逐步投入譯書之後，大量的引進西學，譯書的種類更是豐富許多，這也是譯書書目多產生於晚清之故。所以如要對譯書書目有完整的瞭解，則必須延續這一段軌跡，完整的呈現中國傳統與現代接軌的整體世代背景。

如前所述，本研究所探討「譯書書目」的時間斷限大抵為：從明代傳教士引進西學的時代開始，目前學者對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大多從明代萬曆時期計起。本研究將以明崇禎四年(1631)作為開始，此為本研究所收集到最早的譯書書目即《曆書總目表》刊載於《崇禎曆書》的時間。結束於清宣統三年(1911)，為清朝結束的日期。因此有部分譯書書目雖然收錄明清時期的譯書，但成書於民國時期，如徐宗澤編著《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周壽昌編著《譯刊科學書籍考略》等，則不列入研究範圍。

三、研究內容

本研究是以研究譯書書目的體制形式、分類思想、類目、功能、影響為主，關於譯書書目中所收集的譯書，並不在研究範圍之內。另外本研究也不涉及個別譯書及譯書書目的版本考據。

⁶⁸ 同註 41，頁 559。

⁶⁹ 同註 46，頁 84。

四、研究限制

本研究所參考的文獻，由於語言能力問題，限定於中、英文，未能廣及其他語文文獻，尚有未盡周延之處。

本研究爲了對譯書書目做出完整探討，利用各種史料收集完整的譯書書目，但由於當時的譯書書目有部分爲稿本或鈔本，並未傳世，也因爲有部分書目因地域限制，在臺灣未能接觸到，則以前人的研究結果透過二次文獻爲立論基礎。

第貳章 譯書書目形成的歷史脈絡

十六世紀開始，在華耶穌會士通過文獻傳播活動，把西方科學技術、學術思想傳入中國，由此拉開了西學東漸的序幕，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

自明末耶穌會傳教士艾儒略（Jules Aleni）編纂西方大學教科書綱要《西學凡》以來，西學差不多成爲中國對西方科學技術及學術文化的簡稱，由於中西語言的歧異，作爲西學載體的西學書籍在中國必須經由多種翻譯的途徑成爲譯書，方能爲廣大的群眾所認識。西學譯書在這段期間裡，隨著傳播主體的屢次轉變，逐漸擴大其接觸對象，流傳甚廣。也因爲傳入學科的發展，所涉及的學術範圍越來越廣泛，數量越趨龐大。爲使社會大眾能有效的獲得譯書資訊與利用，社會上出現了針對譯書而編纂的譯書書目。針對這段譯書書目的形成過程，本章將對明末清季這三百多年間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變化作概括論述，探究每個階段中西文化交流的內涵以及明清時期中國古典目錄學的發展概況，瞭解當時的時代氛圍與學術思潮，以提供對譯書書目形成的背景認知。

針對這段對近代中國產生重大影響的時間歷程，各家說法不一，如郭廷以認爲約略可分爲三期：明清之際；清代道咸同光；民國初年。¹張蔭麟則認爲可分爲兩期：第一期始於明萬曆中葉（1573-1619），至乾隆中（1736-1795）而絕；第二期始於清咸豐年間至同治（1851-1874）的洋務運動以至今日。²而潘玉田在《中西文獻交流史》則區分爲：明末清初（1582-1722）；清中期，主要是指乾隆繼位到道光二十年（1736-1840）；第三階段是清末（1840-1919）。³雖然各家從不同角度切入造成時間分期上的歧見，但大抵不脫明末清初、清中期、晚清的軌跡。本章也將以此爲立論的依據，循序討論各時期西學輸入的狀況與作爲中國

¹ 郭廷以，「近代科學與民主思想的輸入—晚清譯書與西學（上）」，《大陸雜誌》第4卷1期（1952），頁1。

² 張蔭麟著，「明清之際西學輸入中國考略」，李毓澍編，《張蔭麟先生文集》（臺北市：九思，1977），頁559。

³ 潘玉田、陳永剛著，《中西文獻交流史》（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頁84。

本土學術載體的古典目錄學如何逐步改變，繼而演繹出複雜多變的譯書書目。

第一節 明清之際：西學的最初傳入

明末清初，中國對外交流史上出現了繼魏晉佛學盛行，和隋唐大量容納外來文化之後，又一次大規模文化交流活動，即所謂的「西學東漸」。這次文化交流所涉及的知識內容都遠遠地超過了前兩次，而它的主要傳播者是來自於歐洲的耶穌會傳教士。作為中西文化的溝通者和文化使者的耶穌會士，在傳教的同時也傳播了較中國更為進步的知識和科學技術。

一、西學傳入的時代背景

南宋以降，程朱理學一直在中國思想文化領域居於主導地位，但明代中後期經濟的發展逐漸引起思想的變化，學術思想上呈現出繁榮景象。王守仁建立心學體系，強調人的意識和主觀精神的作用，別立宗旨，與朱子背馳，使當時的思想界耳目一新。後來以李贄為主要代表的泰州學派發揮「人皆可為聖人」的思想，提出「百姓日用即人倫物理」，蔑視封建禮教，突破禮教羈絆，提倡平等，具有較濃的平民色彩。⁴學術思想上的轉變為明末西學的傳播作了思想上的準備，使傳播受到的阻力有所減弱。因此：

在客觀上創造了一種開放的學術空氣，使學者能有較少的心理負擔來接受新奇異質的西學，為近代意義上的西學在中國得以立足行了一個奠基禮。⁵

中世紀後期與中國相距甚遠的歐洲在工商業上有了很大發展，生產力有了顯

⁴ 沈定平著，《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調適與會通》（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頁 552。

⁵ 鄒桂香，「十六至十八世紀西學文獻在中國的傳播」（鄭州大學管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5 月），頁 3。

著提高，出現了一些以手工業和商業為中心的城市。新興生產技術的推廣和應用，出現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新興的資產階級，而且力量日漸壯大，他們對於封建主義和束縛他們的神權思想日益不滿。因此發生了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主要是針對教會的腐敗而產生，宗教改革目的是為了復興古代神學，要求改革教會的陋習。它既是一場思想運動，也是場社會改革，以德國的馬丁路德和瑞士的加爾文為主要代表和領導人，後來傳到其他歐洲國家，涉及社會的層面相當廣泛。與此同時，紙張和印刷術的發明，更加速了歐洲文化思想傳播的進程。

從絲路時代直到中世紀，中國與歐洲的來往主要通過陸路進行，到了十五世紀之後，由於土耳其帝國的興起和擴張，壟斷了東西貿易，伴隨著元帝國的瓦解等種種原因使中國和歐洲之間的直接交通陷於停頓，東西方的交往也因而隔絕。隨著西歐各國經濟的崛起，羅盤、觀象儀、分度儀等先進技術的使用，不僅豐富了歐洲人的航海學、地理學和天文學知識，而且提高了歐洲人的軍事和航海技能。同時，由於東西之間的不平衡貿易，使得金銀大量外流。黃金成為王公貴族、商人、教士、資產階級等狂熱追求的東西，刺激了西歐的冒險家拓展大西洋航線去非洲和東方尋找黃金的欲望，迫使他們探索通往東方的新航路。同時，西歐天主教在宗教改革之後，也想在東方開闢自己新的勢力範圍。由於麥哲倫、哥倫布環球旅行和美洲大陸的發現，西歐各國開始了大規模的航海探險和殖民擴張，其觸角也伸向了中國，而與之伴隨而來大批耶穌會傳教士東來傳教，更帶來了西方的科技文化。

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是兩種異質文化之間的交流。由於文化的多樣性和差異性，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構成特色，因此，跨文化交流的動因是異質文化之間的文化差異，這種文化差異導致了跨文化交流的產生和發展。也就是說：

文化傳播的根源在於文化差異。文化傳播發生的前提也正是兩種異質文化的接觸，文化交流的過程就是文化傳播的過程，在跨文化交流的兩種

異質文化中優勢文化佔有主導地位，起著主導作用。⁶

十六至十八世紀開始，中西方社會已經存在明顯的差距，尤其是在思想文化方面。明中葉以後，隨著生產力水準的提高和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出現了經世致用的科學思潮，農業、手工業、天文學、數學、地理學、醫藥學、軍事學、樂律學、園林學等中國傳統科技領域都有進一步的發展。但是，晚明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出現了一種矛盾的局面，形成了實用性技術科學的發達與理論科學、科學思維薄弱的極大反差。⁷這一時期，西方的自然科學理論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已經產生了近代科學所必需的概念體系、理論體系與思想方法，近代科學體系逐步確立，逐漸打破了傳統知識的範疇，正在向近代知識轉型並形成全新的知識架構。中國傳統科學中的兩大主要學科數學與天文學處於衰落的狀態，顯示出晚明的科技成就已無法與西方的系統研究成果相比。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東西方文化不僅存在著巨大的本質差異，而且，西歐各國經歷了文藝復興的洗禮之後，在思想、文化上尤其是自然科學方面上已經優於中國，中國也有了引進西方科學技術和文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這種異質文化間的差異，產生了相互之間的吸引和借鑒，使得彼此的交流成爲可能。

二、譯書活動初期的主要內容與特徵

明嘉靖年間，耶穌會傳教士聖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開始來中國傳教，使得曾中斷的中西交通再次地興盛起來，掀開了大批西方耶穌會士紛紛東來的序幕。耶穌會是主要天主教修會之一，是天主教內部爲了與新教勢力相抗衡，意在扶助羅馬教皇而興起的一個傳教組織。明萬曆年間，義大利人利瑪竇（Matteo Ricci）始將天主教傳入內地，其後來傳教的耶穌會士有艾儒略、金尼閣

⁶ 嵇立群，「論文化傳播與中外文化交流」，《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 期（1998）：頁 33。

⁷ 同註 4，頁 577、598。

(Nicolas Trigault) 等人。耶穌會士們在進入了中國後，所見到的是一個與歐洲截然不同的世界。基於明清之際中國的國威和在華傳教所面臨的重重阻力，利瑪竇等耶穌會傳教士在傳教過程中意識到，要成功地宣教，必須入鄉隨俗，理解、尊重與適應中國文化，尤其是調和與中國傳統儒家思想間的關係，對天主教作出適應儒學、適應中國禮俗、適應中國文化的必要的變通與調適。因此利瑪竇採用儒冠儒服，認真研究中國文化，極力糅合儒家學說，借助中國經典中的觀念宣教，同時採行「學術傳教」的策略，都是調和、適應傳教的措施。

自明萬曆十二年（1584）羅明堅（Michel Ruggieri）出版第一本中文譯書《聖教實錄》以來，傳教士就把編譯書籍作為傳播天主教的主要手段之一，與中國開明之士一起，編譯了大量的宗教書籍和有關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書籍。利瑪竇曾說過：「易於宣傳福音的方法，就是用書籍宣傳聖教，書籍可以在中國各處暢行無阻。⁸」便是希望透過書籍來達到宣傳教義的本意。一開始時耶穌會士的譯述以宗教為最多，但影響不大，於是他們轉入著手翻譯西方科學著作，希望以新科學及天文曆法的技術，來接近中國的士大夫階層。期望透過士大夫階層而認識更多的朝廷官員，然後再藉由這些官員們對下發揮影響力，提高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地位，最後達到傳播宗教的目的，使其教義較容易地為中國民眾接受。如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徐光啓向利瑪竇提議：「應該印行一些有關歐洲科學的書籍，引導人們做進一步的研究，內容則是要新奇而有證明。⁹」便可得知中國的士大夫逐漸對西學產生更大的興趣，因此翻譯了重要的《幾何原本》一書。

李之藻隨後更於明萬曆十一年（1613）向神宗皇帝上書《請譯西洋曆法書疏》，文中提及當時的西學書籍，有曆術之書、水法之書、算法之書、測望之書、日軌之書、萬國圖誌之書、醫理之書、樂器之書、格物窮理之書等，李之藻

⁸ 羅光編，《利瑪竇傳》（臺北縣：輔仁大學出版社，1982），頁207-208。

⁹ 利瑪竇著，《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市：中華，1983），頁 617。

認為：「以上諸書多非吾中國書傳所有，想在彼國，亦有聖作明述，別自成家，總皆有資實學，有裨世用。」因此各種書籍都應當「漸次廣譯，其於鼓吹休明，現文成化，不無俾補。」因而就有與國計民生關係密切的《泰西水法》、《地震說》、醫藥生物科學的《藥露說》、《泰西人身概論》、物理學方面的《遠西奇器圖說》等譯書。李之藻上書《請譯西洋曆法書疏》，文後更建議聘用耶穌會士翻譯西書並在禮部下設譯書機構。計畫將耶穌會士帶來的西學書籍「擇其要者，漸次廣譯。¹⁰」這些事例都可以看出耶穌會士的譯書正逐漸發揮功用。

從這時期譯介圖書的種類，我們大致可以看出傳入的西學包括的基本內容。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統計耶穌會士在華譯著西書約 360 餘種。¹¹余施霖的碩士論文統計 1584-1758 年間耶穌會士的中譯西書共計 378 部，其中宗教類 175 部，占總數的 46%；人文科學類 47 種，包括倫理政治、語言字典、文學、心理、教育、地理等，占總數的 12%；自然科學類 166 種，包括天文數學、生物、醫學、水利物理、地質、軍事等，占總數的 41%。¹²

錢存訓根據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和裴化行《歐洲著作漢譯書目》兩書統計，1580-1799 年間耶穌會士的中譯西書共計 437 部，其中宗教類 251 部，占總數的 57%；人文科學類 55 種，包括哲學、倫理、語言文字、教育、地理等，占總數的 13%；自然科學類 131 種，包括數學、天文、生物、醫學、物理、地質、軍事等，占總數的 30%。¹³由上述可知，耶穌會士當時所著譯的書籍，主要是以宣揚天主教教義、教規、儀式及耶穌會活動為主，所占比例最大，超過一半以上，這也和來華傳教士所抱持的宗旨、目的相當吻合。再者，明末清初的西學之風，基本上並未超出中國傳統科學的學科範疇，還是集中在天文、數

¹⁰ 李之藻，「請譯西洋曆法等書疏」，徐宗澤著，《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上海市：上海書店，2006），頁 195-196。

¹¹ 參考梁啟超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市：東方，1996）。

¹² 余施霖，「李之藻《天學初函》之研究」（臺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8 月），頁 95-96。

¹³ Tsuen-hsuei Tsien, "Western Impact on China through Translation," *Far Eastern Quarterly*, 8: 3(May 1954), 307.

學、地理學上，特別是天文數學方面的著作。其原因是自古以來，中國即重視曆算之學，不僅因曆法與農業生產息息相關，而且更重要的是皇權受命於天，頒布曆法被視為是皇權的統治象徵，所以觀天象、知人事就成為皇家天文機構的職責和專利。明代雖嚴禁民間私測天象，但不禁研習曆法，清代時取消禁令，康熙更是鼓勵民間研習，因而曆算之學大盛。加上明清兩代改曆的需要，中國士大夫急需從西洋之學中吸納較為先進的天文數學知識，本研究所收最早的譯書書目《曆書總目表》正為當時所翻譯西方曆法的書目。

三、明清時期：中國古典目錄學的總結

劉向《七略》曰：「《尚書》有青絲編目錄」這是「目錄」一詞的最早出現。自漢劉向父子編制《別錄》、《七略》以降，歷代公私藏書多有書目，其中不乏名作。來新夏認為，劉向父子等人「把單純的編目工作提高到了學術研究的高度，使編制群書目錄的過程成為建立學科的過程，為後學創建了規制。因此，我國古典目錄學是伴隨著這幾部著名的群書目錄的撰著而興起的。¹⁴」《七略》以及隨後幾部著名的書目為中國古典目錄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石。中國古典目錄學的發展基本上是平穩的，從《七略》以降所體現的目錄學思想到鄭樵的類例學說，章學誠的考辨學術源流，歷時 1800 年左右而沒有什麼重大的改變，仍然是追求明瞭學術。

明、清兩朝，是中國目錄學發展的繁盛時期，各種各類官、私書目紛紛問世。明代是社會經濟和文學創作發展都相當發達的時代，圖書業也因印刷技術的提高而相當成熟。在這種社會環境下，私人藏書家的數量成長相當快速。明代有名望的藏書家幾乎都撰有家藏書目，如高儒的《百川書志》、陸深的《江東藏書目》、陳第的《世善堂藏書目錄》、茅元儀的《白華樓書目》、祁承燁的《澹生堂書目》等不下數十種，其中亦不乏一些傳世之作。除了私人藏書書目十分發達

¹⁴ 來新夏著，《古典目錄學淺說》（北京市：中華 2003），頁 8。

外，官家藏書書目數目也相當可觀，如《文淵閣書目》、《內閣藏書目錄》、《國史經籍志》等。當時幾部著名的書目也特別收錄傳教士和中國學者譯介的西學書籍。如《脈望館書目》設「大西人書類」、《白華樓書目》設「外學類」（其中有佛教書）以及《絳雲樓書目》設「天主教類」，反應了當時西學傳入的狀況。

經過明代的醞釀，中國古典目錄學在清代進入了鼎盛時期。據《清史稿·藝文志》目錄類就登錄有 100 餘種，據《清代目錄提要》的不完全統計更達到三百八十餘種。¹⁵清代目錄學著作不僅數量眾多，而且從圖書收錄、編制體例、目錄形式和內容價值各方面看，都顯示了一種總結前代、開啓後來的成就與特色。目錄學的功用價值及其學術研究，也得到了充分的認識和長足的發展。《四庫全書總目》成爲我國古代目錄學史上一部集大成的巨著。周中孚《理堂讀書記》、章學誠《史籍考》，姚振宗《後漢·藝文志》、《隋書經籍志考證》，以及張之洞《書目答問》等，也都是不同類型的書目名著。

伴隨書目的發展，明清時代之目錄學也逐漸成爲顯學，人們對典籍及學術分類已有自覺認識，許多學者將它視爲治學之門徑。如「目錄學」名稱，便始見於清人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目錄之學，學中第一要緊，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¹⁶」明人祁承燁曰「部有類，類有目，若絲之引緒，若網之就綱，井然有條，雜而不紊。¹⁷」清人王鳴盛曰「凡讀書最切要者，目錄之學。目錄明，方可讀書；不明，終是亂讀。¹⁸」不僅目錄學的思想比較發達，而且出現了以專門研究典籍分類問題之目錄學著作。明人胡應麟之《經籍會通》，被認爲是中國第一部目錄學史專著。胡氏以歷代書目爲綱，分源流、類例、遺軼、見聞四篇。其《類例》篇曰：

¹⁵ 參考來新夏主編，《清代目錄提要》（山東：齊魯書社，1997）。

¹⁶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一。

¹⁷ 祁承燁，「庚申藏書略例」，李希泌、張椒華編，《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後）》（北京市：中華，1982）頁 28。

¹⁸ 同註 16，卷七。

經、史、子、集，區分為四，九流百氏，咸類附焉，一定之體也，第時代盛衰，制作繁簡，分門建例，往往各殊，唐宋以還，始定於一。今稍掇拾諸家，撮其六略，以著於篇。¹⁹

然而如王重民提到：

但到了第十五世紀的末年，尤其是在十六、七兩個世紀中間，各種目錄又趨於興盛和繁榮的時期，目錄的數量遠遠超過前代，而目錄的品質始終趕不上去，則是與沒有一部在體系上、在品質和數量上可做典型的官修目錄有很大關係的。……元、明、清（1772 年以前）三代政府沒有建成集中的政府圖書館，沒有編出堪作典型的官修目錄，致使這一時期內的各種圖書目錄在分類上相當紊亂，在質量上有所降低。²⁰

造成這種情形，很大的原因來自於漢、唐以來，四部法為分類之正統，但是四部法有其限制，尤其在印刷術發明以後，書籍數量大增，各種學術同時又因之蓬勃發展，四分的規模早已不敷所求。明代的編目者因此求新求變，在明代產生許多與四部法相異的書目，胡應麟即說：「第時代盛衰，製作繁簡，分門建樹，往往各殊。²¹」明代這種詳分類例之風延及清初，如《也是園藏書目錄》簿錄甲乙頗便稽檢；《讀書敏求記》分為 44 小類；《述古堂藏書目錄》則分為 78 部；《孝慈堂書目》分為 85 目；《孫氏祠堂書目》分為 12 大類 47 小類。儘管此時期注重分類，但是由於無力撰寫提要，所以不僅分類相當紊亂，藉書目考察學術演變的功能也大減。所以現代學者對明至清初的書目及目錄學發展認為是有相當的問題存在，一直要到《四庫全書總目》編纂才得已改善。

¹⁹（清）胡應麟，《經籍會通》，類例篇。

²⁰王重民著，「論四庫全書總目」。李萬建、賴茂生編，《目錄學論文選》（北京市：書目文獻，1985），頁 351-352。

²¹同註 19，卷二。

第二節 清中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式微

一、雍正禁教後的逐漸式微

清雍正皇帝登基以後，查出傳教士穆敬遠（Joannes Mourou）與康熙末年爭奪王位陰謀有關，又加之其他排教事件的發生，清雍正二年（1724）禮部發佈禁教令，除留居北京、為宮廷服務的傳教士外，其餘人等則前往澳門出境。據史料記載：

雍正二年，浙江制府滿公，上言其惡，朝廷納之。禮部議覆：奉旨西洋人除留京辦事人員外，其散處直隸各省者，著該督撫轉飭各地方官，除起送至京效用人員外，餘俱遣至澳門安插，其所造天主堂，令皆改為公廨。凡誤入其教者，嚴為禁諭，令其改行。如有仍前聚眾誦經者，從重治罪。地方官若不實心禁飭，或容忍不報如之。²²

經過一番波折後，方才允許傳教士可在廣州永久居住。到乾隆時期下令禁海閉關，禁止華人出洋和僑居國外，乾隆二十二年（1757）更將多口貿易改為一口貿易，指定廣州為唯一通商口岸，規定朝廷官員不准外教接觸。雍正與乾隆的種種措施，嚴格控制耶穌會士進入內地，因此後繼來華的耶穌會士極少，客觀上斷絕了明末清初以來中西文獻交流活動賴以存在的開放條件。如郭廷以即說：

禁教令雖係為天主教而發，實際上同於對西方文化絕交。西教與西學可說是兩位一體，亦可說是西學寄生於西教，西教被禁，西學隨之失去了他的寄生體。²³

同時在華耶穌會士也早因康熙時期即面臨到「禮儀之爭」而受到歐洲教會的壓力，在傳教、學術傳播上勢必諸多設限而停滯不前。

雍正、乾隆時期雖對傳教士諸多設限，仍然任用一些傳教士為宮廷服務。在

²² 夏燮，「猾夏之漸」，《中西紀事》卷二。

²³ 郭廷以，「近代西洋文化的輸入及其認識」，《大陸雜誌》第2卷7期（1951）：頁22。

實行禁教後，西學的傳播主體與途徑受到相當大的影響，因此曾為明末清初時中西文化交流主流的西方科學技術的傳播和應用，已經大為減弱。西學書籍的翻譯更是逐步消滅。傳教士單獨的著譯活動極少，只是在諭旨下修改增訂了一些前朝的天文曆法著作。²⁴

乾隆二十五年（1760），法國耶穌會士蔣友仁（Michael Benoist）向朝廷敬獻《坤輿全圖》，最早把代表歐洲天文學最新成果的哥白尼學說介紹到中國，清政府卻視為異端邪說不予接受。²⁵清政府的這種態度，必然也影響到對已傳入中國的西方科技文獻的接受。如學者提出：

儘管利用耶穌會士編制了《乾隆內府圖》，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但是圖成之後，藏於深宮，秘而不宣，結果當時對我國地圖學毫無影響。有些翻譯過來的西學書籍，如《人體解剖學》，從來沒有公開過。²⁶

而作為明末傳播西學的士人，也因為「西學中源說」的提出，而影響了其對西學的接受。寶成關說：

「西學中源」說的提出，限制了人們對西學的深入學習，在其影響下，人們不再以「會通」、「超勝」為目的來研習西學，而是逐漸以「復古」為目的，力圖把西學納入中國儒學體系。²⁷

他們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在中國的古典文獻中追本溯源，尋找西學之本。而乾隆、嘉慶時代，乾嘉考據學派的出現與成熟，更加使西學傳播與利用的途徑日漸狹窄。

乾隆三十八年（1773）羅馬教皇宣布解散耶穌會。乾隆四十年（1775）解散令傳到中國，在華耶穌會士停止活動。乾隆四十八年（1783）殘留在中國供職的錢德明（Joan Joseph Maria Amiot）等十幾位耶穌會士又改屬法國味增爵修道會。

²⁴ 乾隆七年（1742）修訂曆象考成後編；乾隆十七年（1752）修訂儀象考成。

²⁵ 同註2，頁570。

²⁶ 同註3，頁41。

²⁷ 寶成關，「清初西學輸入的成就與侷限」，《史學月刊》3期（1995）：頁46。

此時通過耶穌會士傳播西方科技文獻的途徑已完全中斷，給已經趨於衰落的文化交流更沉重的打擊，持續近兩個世紀的中西文化交流也隨之中斷。清中期的中西文獻交流活動，由於清政府的閉關鎖國政策，自禁教開始，進而海禁，終使得中西文獻交流活動，由高潮轉入低潮而衰落。

二、《四庫全書總目》對西學的反應

昌彼得說：

在我國目錄學演進的歷史上，清代是一個變動最遽的時代，初由衰而盛，再由盛極而漸趨式微。有清二百八十餘年間，有過輝煌的成就，也遭受到外來無情的衝擊。清代目錄學發展的歷史，我們可以把它區分為三個時期來看。第一個時期從清初至乾隆卅八年開設四庫全書館的一百三十年間，是因襲前代的衰弊而孕育新的時期。自乾隆卅八迄同治末此一百年間，是目錄學的輝煌時期，自光緒元年書目答問出版迄清末，是遭受外來的沖激而分類趨於紊亂時期。²⁸

昌彼得認為在明末清初時，中國古典目錄學並沒有什麼突出的發展。一直要到清乾隆三十八年開四庫館，中國古典目錄學才步入了一個新的歷程。《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以今日眼光來看，誠然有許多主觀的評鑑取捨及意識型態作祟，但對歷代典籍的整理與保存，不能不說有重大的貢獻。同時《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總結中國古典目錄學的過往方法和經驗，並藉由著錄豐富的圖書資料，創建了4部、44類、66屬的三級類例體系，建立了一套完備的、以經、史、子、集為骨架的「四部」系統。著名目錄學家王重民說到：

《四庫全書總目》總結了並折衷了劉向以來，特別是宋代公私藏書目編寫提要的方法方式，也吸取了清代《讀書敏求記》和朱彝尊及常熟派校

²⁸ 昌彼得著，「清代的目錄學」，《版本目錄學論叢（二）》（臺北市：學海，1977），頁111。

書家所寫題跋記的方法和形式，從而形成了一種新的反映圖書的版本、文字和內容，特別結合當時政治需要，宣傳封建思想的提要形式。《四庫全書總目》是封建社會後期的一部最典型的封建目錄。²⁹

《四庫全書總目》的影響最顯明的地方表現在書目的分類和編排上面。《四庫全書總目》刊佈以前，各種書目沿襲明代詳分類例之風，尤其是私人藏書書目的分類和編排是極其紊亂的。但自從《四庫全書總目》開始向讀書人和藏書家流通以後，一個最顯著的影響，就是在目錄分類的類目上和每類之中所著錄書籍的編排上，很快的就都按照《四庫全書總目》的分類體系去做了。³⁰如清嘉慶五年（1800）孫星衍編的《孫氏祠堂書目》內外編，分了 12 個大類，47 個小類，大類中又多依《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設立子目，尙未能看出《四庫全書總目》的影響。但之後隨著《四庫全書總目》的流傳，嘉慶十三年（1808）編成的《天一閣書目》，張金吾編的《愛日精廬藏書志》都是基本上按照《四庫全書總目》的體系分類了。再後來的《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八千卷樓書目》，在分類上或編排上，也都是與《四庫全書總目》相當一致。一直到光緒元年（1875）張之洞撰《書目答問》，仍然僅僅是部分的修改了《四庫全書總目》的分類體系。在這套四部分類系統中，「經」是最重要的。對於經、史、子、集之關係，乾隆帝有一段精彩闡述：

以水喻之，則經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流也、支也、派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經而出。故吾於貯四庫之書，首重者經，而以水喻文，原溯其源。³¹

由此便可看出貫穿四部分類系統與《四庫全書總目》的主線，便是濃厚的「尊經崇道」以及儒家「重道輕藝」的學術思想。

²⁹ 同註 20，頁 352。

³⁰ 同註 20，頁 352。

³¹ 弘曆著，「文源閣記」，李希泌、張椒華編，《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後）》（北京市：中華，1982）頁 17。

由於西方天主教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差異和矛盾，宗教內部的派系之爭，以及傳教士涉入了康熙末年的奪位之爭，導致了雍正皇帝對天主教的取締。到了乾隆時期，對西教更爲嚴厲，禁海閉關等措施的實行，使得綿延將近二百年的西學東漸就此中斷。可是，乾隆皇帝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時，並沒有完全將西學拋棄，西學在《四庫全書總目》中還是得到了一定的反應。《四庫全書總目》作爲中國古典目錄學發展到總結階段時的代表性著作，經由對四庫全書中所著錄西學譯書的探討，不僅可以初步瞭解當時西學傳入的層面，也可清楚中國古典目錄學是如何因應西學譯書的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共收錄西方傳教士的著述 35 種，其中列入「著錄書」的有 20 種，列入「存目書」的有 15 種。它們分別被歸入：經部·樂類 3 本、小學類韻書屬 1 本；史部·地理類外紀屬 4 本；子部·農家類 1 本；子部·天文算法類推步屬 11 本、算書屬 3 本；子部·譜錄類器物屬 1 本；子部·雜家類屬 10 本、雜編 1 本。³²自利瑪竇來華（1582）至中國耶穌會解散（1775），近兩百年間，傳教士在中國譯著的西學書籍凡 437 種，其中純宗教書籍 251 種，人文科學書籍 55 種，自然科學書籍 131 種。³³可見《四庫全書總目》中對於這些書籍的收錄十分有限，其中一些相當重要的書籍都付之闕如。這首先證明了《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者們，對於明末清初近二百年西學東漸所輸入的西學成果，並沒有在根本上承認其價值。而耶穌會教士所翻譯的西書以宗教爲主，但總目中卻未收宗教書籍，自然是耶穌會士所傳宗教與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大相逕庭，強調「尊經崇道」的《四庫全書總目》當然不可能收錄這類西書。但他們帶來的實用之學術，還是得到中國學人認同的。《總目》中說「案歐邏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實逾前古；其議論夸詐迂怪，亦爲異端之尤。國朝節取其技能，

³² 計文德著，《從四庫全書探究明清間輸入之西學》（臺北市：漢美，1991），頁 252-254；336-337。

³³ 同註 13。

而禁傳其學術，具存深意。³⁴」從《總目》中的西書提要來看，其編纂者至少部分地接受了西方的科學思想。基於這一觀點，《總目》對於西學譯書的褒貶就表現得涇渭分明，對待實用科學方面的著述，雖然語帶保留，但微詞不多；而對於傳播宗教思想的著作，則是否定不提。不過西洋傳教士在天文學、地理學、幾何學等方面的著述被輕易地套入了子部天文算法類，其下也僅分為「推步」、「算書」兩子目，無視其自明末以來所傳入的豐富西方曆法著作，內容也往往被硬性地與中國古代著作相類比。這種對應用科學類書籍的疏漏與缺乏嚴謹的分類正符合前述所提儒家「重道輕藝」的學術思想。而這些情形也證明了當西學書籍數量不多以及內容尚未全面時，中國古典目錄學仍然可以輕易的將譯書套入四部法的範疇，而無須做出什麼改變。

第三節 晚清：西學的再度輸入

由於清中期推行閉關政策，西學輸入一度中斷。一直到嘉慶道光時期，因英美基督新教派遣傳教士來華，西學輸入活動又重新恢復起來，雖然在一開始受到中國政策影響並未能順利入華傳教，傳播西學書籍也受到諸多限制。但在鴉片戰爭後，中國開放五口通商，英美新教傳教士與西方勢力一起進入中國，西學在近代中國的輸入活動由此拉開序幕。

晚清西學輸入中國，大體可以說有三種途徑：辦學堂請人講學；出洋考察或留學；譯書。然而，無論是請人講學或留學考察，其成果終歸落實於文字，來華任教者的講義多翻譯成書，如傅蘭雅、丁韞良等人授課用書多有譯本。而主辦洋務的官員及留學生，也多有譯著。許多以介紹西學、譯印西書爲主的新式出版機構如墨海書館、美華書館、廣學會、益智書局、同文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等的誕生，更是加速了譯書的推廣。按當時時人所說，即爲：「人耕我獲，天下之便

³⁴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五，子部雜家類存目。

利無逾於此者。³⁵」

是當社會大眾參與到譯書活動來時，由於缺乏對西學的素養，一來譯者所譯之書未免良莠不齊，令讀者不知所從；一方面則是出版者為牟利，往往會將書籍改名易題，甚至割裂成書，令讀者難以分辨；而讀者又往往因驟涉西學，不識門徑。也就是為了改善這種情形，眾多的譯書書目紛紛出現。晚清時期，譯書的大量積累反應了當時中國情勢對西學的迫切需求，因此絕大部分的譯書書目都產生於晚清時期。

一、晚清西學傳播主體的多樣化

由於晚清社會對西學廣泛的需求，使得參與譯書的力量也不再僅限於昔日的傳教士，政府、民間團體、私人的投入都使得西學譯書輸入的範圍及層面大為增加。

（一）英美基督新教傳教士為開端

在明末之時，由於西學傳入的途徑受限於當時交通、環境等因素，中西雙方尙未能展開大規模的交流活動，西學傳播集中在中國官方，並沒有大規模的交流，遠道而來的耶穌會士是當時中國得以與西方接觸的唯一傳播主體。明末清初來華的傳教士中，《泰西著述考》中記：「余嘗得其目錄觀之，獲傳於世者，約略二百十一種，亦可云富矣。當時著名之士，凡九十有二人。³⁶」費賴之於《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中所記載的有 467 人。³⁷

由於清中期推行閉關政策，西學輸入一度中斷。嘉慶道光時期，由於十八世紀末年新教國家展開大規模的全球傳教事業，英美基督新教派遣傳教士來華，西

³⁵ 轉引自魯軍，「第二次外來知識大輸入的歷史記錄—論清末譯書目錄」，《資料工作通訊》2 期（1982）：頁 35。

³⁶ 王韜編，《泰西著述考》自序。

³⁷ 參考費賴之編，《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

學輸入活動又重新恢復起來。

以中國作為基督新教傳教對象，以英國倫敦傳教會首先發起。倫敦傳教會由英國國教會、長老會和公理會於 1795 年合併而成，日後也成為英國新教傳教士在華活動的重要組織。清嘉慶十二年（1807），倫敦傳教會所派遣的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抵達澳門，然後進入廣州。馬禮遜到中國後，開始進行傳教與出版的事宜。自宗教革命以來，積極活躍的出版活動一直是基督新教的一項特徵，不但期盼信徒藉由閱讀聖經與神直接溝通，也希望利用印刷術爭取非信徒的認同與皈依。印刷出版和學校教育、醫療救濟一樣，都成為協助傳教的主要手段。³⁸清嘉慶十六年（1811），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在廣州出版第一本中文西書《使徒行傳》，嘉慶二十年（1815）馬禮遜創辦第一份中文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由麻六甲海峽發至中國境內。十九世紀初馬禮遜等來自英美的新教傳教士，續補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進行，重新恢復因禁教而停滯的西學輸入活動。

然而因為清政府的禁教措施，新教傳教士的活動仍必須在中國轄區之外進行。傳教士們在馬六甲、新加坡、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等地，開學校，辦印刷所，出版書籍報刊，在當地華僑中傳播西學。一直要到鴉片戰爭之後，才得以進入中國內地傳教。馬禮遜等新教傳教士主要和商人及平民往來，譯書大多是為傳教用的通俗性小冊子和學校課本，間或有科學譯著出現。新教傳教士在南洋等地所出版的西書、報刊，所辦的新式學校，無論從數量上還是規模上，都不能與日後傅蘭雅（John Fryer）、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等人相比，但他們的譯著仍引進了西方新知識，也正是日後大規模譯書的開端。

鴉片戰爭後，香港割讓、五口開埠通商，傳教士們很快將活動基地從南洋遷到這些地方。但也因鴉片戰爭後，中國掀起了一股強力反對英美的情緒，勢必影響到傳教士的傳教工作。因此傳教士改變先前傳播福音的單調形式，採取迂迴的傳教手法，在某一程度上即同於明末「學術傳教」的方式。利用籌辦教育、發行

³⁸ 蘇精著，《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臺北市：學生，2000），頁 10。

報刊、開設醫院來拉近與中國社會的接觸。而不管辦學、出刊還是開醫院都需要汲取西方的科學知識，教會必然得在中國本地設立譯書機構。而傳教士也逐漸將譯書的重心逐步轉移到以科學知識為內容出版品，如艾約瑟（Joseph Edkins）的說法：「我們的首要目標在於傳授宗教的真理，但我們也不輕忽在中國出版啟蒙觀念和科學主題。³⁹」出版了數量可觀的科學著作，如合信（Benjamin Hobson）的《全體新論》等五種醫學著作和《天文略論》、蒙克利（Edward T·R·Moncriff）的《演算法全書》、哈巴安德（Andrew Happer）的《天文問答》、偉烈亞力（Wylie Alexander）與王韜合譯的《重學淺說》、艾約瑟與李善蘭合譯的《植物學》等都是西方近代科技的著作。

晚清最早在華開辦的傳教士翻譯機構即墨海書館。道光二十三年（1843）由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成立於上海，在當時頗具影響力。但在咸豐十年（1860）以後，因為種種原因，美華書館在上海取代了墨海書館成為西學傳播的中心。⁴⁰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到十九世紀末葉，中國出現 9 大翻譯機構，即：墨海書館、美華書館、博濟醫局、京師同文館、江南製造局、格致匯編社、益智書會、廣學會、天津水師學堂。除京師同文館、江南製造局和天津水師學堂外，其餘均為教會機構，而京師同文館和江南製造局的翻譯工作實際上也由英美傳教士主持。⁴¹錢存訓根據《東西學書錄》統計，十九世紀後半期（1850-1899）中國翻譯出版的西書 567 部，其中 51%譯自英國，15%譯自美國，23%譯自法德俄日 4 國。⁴²這個資料間接反應出洋務運動時期，西學書籍翻譯出版過程中來自英美新教傳教士的影響。

³⁹ 同上註，頁 235。

⁴⁰ 同註 38，頁 237。

⁴¹ 王立新，《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天津市：天津人民，1997），頁 364。

⁴² 同註 13, 315.

（二）政府力量的參與

鴉片戰爭以前，由於清廷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中斷了西方文化傳入，對西方的情勢早已茫然不知。林則徐赴粵禁煙期間，面對當時動盪不安的情勢，他首次提出「以夷制夷⁴³」的主張，冀望通過翻譯西書、編譯資料、介紹外國史地和一些政治制度，來達到知己知彼的目的。林則徐並不懂外語，他對翻譯的貢獻主要是組織選題，聘請譯員和審訂加工。如林則徐在清道光十九年（1839）南下禁煙時，在致怡良書信中，告知已組織人員翻譯《澳門新聞紙》，「藉以採訪夷情⁴⁴」。魏源也稱其「署中養有善譯之人⁴⁵」，這意味著林則徐組織了一個翻譯團體，有計畫地收集和編譯外國書報。但這並非中國政府正式參與到譯書活動，而僅僅是林則徐利用了個人資源從事的私人活動。

鴉片戰爭過後，掌權者認為西方取勝全仗船堅炮利，主張學習西方技術，開展洋務運動。在屢次對外戰爭失利，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簽訂之後，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中國實有落後於西方之處。一些愛國志士仁人和政府官僚開始提出要學習西方的堅船利炮技術及工商科技，即「循用西洋之法以求日進於富強⁴⁶」，由此而展開了洋務運動。洋務運動的核心政治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張之洞即說道：

新舊兼學，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舊學為體，新學為用。⁴⁷

中體西用具有與西學保中學的雙重性質，如不以中學為體嫁接西學，西學就無法在中國落實。從某種角度來看，洋務運動的「中體西用論」其實便是早前魏源「師夷長技」思想的延續。洋務思潮是一種學習西方、謀求富國強兵之道的社會

⁴³ 林則徐，《林則徐集：奏稿》（北京市：中華書局，1962），頁 796。

⁴⁴ 林則徐，「致怡良書柬」第二件，道光十九年二月，楊國禎編，《林則徐書簡》（福州市：福建人民，1981）頁 44。

⁴⁵ 魏源，《海國圖志》，卷八十一。

⁴⁶ 郭嵩燾著；楊堅校補，《郭嵩燾奏稿》（長沙市：岳麓書社，1983），頁 345。

⁴⁷ 張之洞，「勸學篇·外篇·設學第三」，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市：文海，1966），482 輯，頁 14538-14539。

思潮，這必然導致翻譯的興起和繁榮。在洋務派主導下，籌辦了一批軍火工業和民用工業，如江南製造總局、輪船招商局等，還相繼創辦了一批學堂以培養懂得西方語言與技術的新式人才。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於同治元年（1862）奏請創設京師同文館，次年又在上海開廣方言館，再次年廣州同文館成立。而同治七年（1868）在譯書活動中蔚為重要的江南製造局翻譯館正式開館。京師同文館與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在政治中心的北京和西學傳播中心的上海兩地先後誕生。同文館雖其基本宗旨並非以西書譯印為主，譯著數量並不多，但首開政府機構譯書風氣，譯著的品質亦相當不錯，⁴⁸這也代表著清政府正式參與了西學書籍的編譯。而另一方面江南製造局翻譯館所譯西書數量在各種譯書機構中名列榜首，所帶來的影響也最大。這都顯示了官辦譯書機構在洋務運動時期中的主導作用。

洋務派成爲西學文獻引進、傳播的主導力量，它們將歐洲近代科學的一些重要成果通過西學文獻引進國內，促成了中國近代自然科學體系的確立和近代中國工業的發展。洋務派由於其辦洋務、辦外交的需要，不再專注世界地理之類書，而是大量翻譯自然科學、應用科學、及少部分國際公法方面的著作。如同文館的譯書多數爲外交和史地政法類，有少數是西方自然科學基礎書籍。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的翻譯內容則以自然科學爲主，社會科學次之，這自然是因兩機構創立目的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同文館是爲了培養外交及翻譯人員；製造局是軍工企業，翻譯館的譯書需有助於製造局的營運。但都使西學文獻在中國的傳播交流起了轉變的作用。

這些由洋務派主辦的譯書機構與之前所提到的教會譯書機構一起成爲甲午戰爭之前晚清譯書活動的主要力量。但必須要注意的是如京師同文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上海廣方言館等這類中國政府機構中主要的譯書人員依然是以傳教士爲主。由於中國尚缺乏本土的翻譯人員，洋務派便充分利用傳教士的各種資源，翻譯他們急需的「時務書」。從《西學書目表》對甲午戰前所譯西書統計之中，中

⁴⁸ 蘇精著，《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臺北市：蘇精，1985），頁 158-159。

西學者合譯西書 123 部，外國人譯著 139 部，國人獨立譯著 38 部。⁴⁹我們便可以看出此點。

另一方面，晚清官書局角色轉變也代表著官方機構參與譯書活動的另一股力量。晚清，在太平天國之亂後，各地書院遭到嚴重破壞，特別在江南地區的書院教育基本陷於癱瘓。清政府考量「自來化民成俗，必資學校之振興⁵⁰」，於是把修復、整頓、新建書院作為一項重要政策，下令督撫實行。據學者統計，清廷在同治十三年間共新建書院 366 所，修復和重建前代書院 14 所。⁵¹鑒於連年戰亂對圖書收藏和出版的巨大破壞，除了大加修復和新建書院以外，自同治初年，地方督撫在清廷支持下相繼在各地設置官書局，出版經史典籍，供士子誦讀。官書局由是大發展，至光緒朝遍佈全國，包括邊遠諸省少數民族聚居地區也紛紛設立，其中比較有名的官書局就有金陵書局、正誼書局、江蘇書局、浙江書局、崇文書局等。晚清官書局在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中日戰爭之後出現較大的變化，光緒二十一年（1895）康有為、梁啟超在京師成立了強學會，以出版《中外紀聞》，翻譯西方報刊及「西國格致有用之書」，探討「萬國強弱之原」為目的。⁵²強學會不久被查禁。強學會被查禁後，御史胡孚宸上奏建議將強學會改為官書局，「選刻中西各種圖籍任人縱觀，隨時購買，並將總署所購洋書選擇印行，以廣聞見。⁵³」光緒帝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議、旋由總理衙門提出一個官書局辦理的基本方案，「擬援照以旗官學之例建立官書局，欽派大臣一二員管理，聘訂通曉中西學問之洋人為教習，常川住局，專司選譯書籍，各國新報及指受各種西學，並酌派司事，譯官收掌書籍，印售各國新報，統由管理大臣總其成。⁵⁴」上奏得到光緒帝批准，並派吏部尚書孫家鼎為管理官書局大臣。

⁴⁹ 梁啟超編，《西學書目表》自序。

⁵⁰ 《清穆宗實錄》卷八十八，同治二年十二月，頁 860。

⁵¹ 白新良著，《中國古代書院發展史》（天津市：天津大學出版社，1995），頁 236。

⁵² 《中外紀聞》中語，轉引自湯志鈞著，《戊戌變法史》（北京市：人民，1984），頁 137。

⁵³ 總理衙門奏《覆奏設立官書局折》，《皇朝經世文篇》，卷五，學校上。

⁵⁴ 同上註。

京師官書局的設置，為晚清官書局興辦史上轉折之開始。其後設局譯書之建議不斷。如李端棻上奏建議開譯書局，「廣集西書之言政治者，論時局者，言學校農工商礦者，及新法新學近年所增者，分類譯出，不厭詳博，隨時刻布。⁵⁵」陳熾建議「專譯有用之書……發各省官局，刊佈頒行。⁵⁶」光緒二十四年（1898）楊深秀、李盛鐸奏請設局譯書，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議，復奏請以梁啟超在上海所設大同譯書局改為譯書官局，由梁啟超經理譯書局事務，新設京師編譯局亦歸併其主持，議奏得到光緒帝批准。⁵⁷光緒二十八年（1901），一年內先後有學部諮議張謇建議各省設局譯書⁵⁸；貴州學政趙惟熙奏請設譯書總局於京師，各省設分局⁵⁹；管學大臣張百熙奏請附設譯書局於大學堂。⁶⁰廣設官書局譯印西學書籍之呼聲更為高漲。

雖然清政府中洋務派以官方力量積極的推動譯書活動，但一來翻譯西書主要是為了洋務運動的進行，再來對當時國家情勢有緊迫感的人士仍主要侷限於洋務派內部，使得譯書活動無法深入民間。比如，江南製造局翻譯館所譯西方技術書籍在甲午戰前的30年中僅售出1.3萬冊，年均只售出400本。⁶¹而針對西學書籍的官書局則更為被動，無論是京師還是地方官書局是在變法維新運動的推動下，經過許多人的上奏建議方設置，而其設置地區也並不廣泛。所以在洋務運動時期，譯書書目寥寥無幾，如傅蘭雅所編《江南製造局譯書事略》、《廣學會譯著新書總目》，多是為了推銷機構所譯書籍而出版，而並非是譯書數量遽增下而產生。

⁵⁵ 李端棻，「奏請推廣學校設立譯局報館折」，張靜盧輯註，《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上海市：上海書店，2003），頁7。

⁵⁶ 鄭鶴聲，「八十年官辦編譯事業之檢討」，包遵彭、李定一、吳相湘編纂，《中國近代史論叢》第一輯第七冊（臺北市，正中，1986），頁38。

⁵⁷ 「改譯書局為譯書官局折」，張靜盧輯註，《中國近代出版史料》補編（上海市：上海書店，2003），頁51。

⁵⁸ 「覆議新政有關繙譯諸奏疏」，張靜盧輯註，《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上海市：上海書店，2003），頁32。

⁵⁹ 《德宗實錄》，卷493，27年12月。

⁶⁰ 《皇朝政典類纂》，卷227，學校15。

⁶¹ 梁啟超著，《飲冰室合集·文集一》（上海市：中華，1936），頁22。

（三）社會士人的逐步投入

在鴉片戰爭以前，除林則徐外，另有少數士人編譯了一些介紹西方的書籍，如江文泰的《紅毛英吉利考略》，楊炳的《海錄》，蕭令裕的《英吉利記》，徐繼畬的《瀛環志略》，魏源的《海國圖志》等。這些主要介紹西方國情和史地文獻的譯印，反映了晚清學人最初了解與研究西學的狀況。雖然由於林則徐等人不懂外語、不是依靠譯員就是傳教士，這使得譯書活動過於片面和沒有系統，譯文也不甚確切。同時嚴格來說有部分編譯的書應屬於資料匯編，而並非譯書。雖然在譯書的內容與品質上有相當的問題存在，但這些個別參與譯書的知識份子，仍起了初步的示範作用。但當有遠見的學者投入到譯書活動時，卻受到中國傳統社會的反彈，如徐繼畬的《瀛環志略》「甫經付梓，即騰謗議。⁶²」當時雖然受到鴉片戰爭戰敗的影響，但對時勢有深刻認識的中國知識分子仍侷限於少數的士人以及推動洋務運動的政府官員。

這種狀況一直要到甲午戰爭失敗後，才有所改變。甲午戰後的譯書業是以中國新式知識分子為主導，活躍於譯壇的機構除了前面已提及的教會組織跟政府機構外，主流是戰後興起的民間譯書團體，甲午戰後興起的翻譯東西文報紙及書籍的報館約三十餘家。上海有《時務報》、《農學報》、《譯書公會報》、《格致新聞》等；北京有《中外紀聞》；天津有《直報》、《國聞報》和《國聞匯報》；長沙有《湘報》、《湘學新報》，其他許多地方也都有此類報刊。⁶³此間，專為譯書而成立的社團與國家機構也如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上海成立強學分會「以譯書為第一義⁶⁴」；光緒二十二年（1896），盛宣懷奏准設立南洋公學，另設譯書院一所；同年，董康、趙元益又

⁶² 轉引自郭劍鳴，「從傳統知識轉型到傳統政治轉型：晚清譯書業發展的邏輯與功能——一種知識政治學的解讀」，《人文雜誌》2期（2005）：頁47。

⁶³ 張志偉，「近代東西學書目初探」，《四川圖書館學報》2期（1989）：頁34。

⁶⁴ 張之洞，「上海強學分會序」，張靜盧輯註，《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上海市：上海書店，2003），頁38。

在上海開譯書公會，「以采譯泰西切用書籍為宗旨。⁶⁵」此外如商務印書館、譯書匯編社、廣智書局、教育世界出版社、啓新書局、勵學譯編社、合眾書局、翻譯學塾等的成立，都意味著甲午戰爭後民間譯書之風大為興盛。也因此在這一時期中，譯書的行銷量呈明顯上升的趨勢。以廣學會所譯書籍銷售情況為例，光緒二十年（1894）為一千餘元，光緒二十三年（1897）為一萬五千五百元，到了光緒二十八年（1902）猛增至四萬三千五百餘元。⁶⁶由此可以更證明西學譯書在甲午戰後的風行情況。而因為譯書的風行，以及民間士人學子普遍的參與譯書，這不僅使得推薦譯書的譯書書目在甲午戰後出現的相當頻繁，而譯書書目的編纂者也多為關心西學或是投入西學譯書的個人著者。

二、譯書內容的轉變

如前所述，譯書活動在晚清歷經了西學傳播主體的多次變動，而傳播主體的不同，所關注的重心也隨之不同。

（一）學科輸入的多元化

十九世紀 40-60 年代是晚清譯書活動的初期，最早的一批西學書籍，是由西方傳教士與中國較早一批接觸西方學術的學者如李善蘭、徐壽、王韜等合作翻譯的，因此英華書院、墨海書館成為翻譯西書較為著名的機構。墨海書館翻譯出版 171 種西學書籍，其中有和基督教內容的占出版書籍的大部分，有 138 種，占 81%；屬於近代數學、格致、天文、地理、歷史等學科的西書僅 33 種。⁶⁷

傅蘭雅於清光緒四年（1878）編成的《江南製造局譯書事略》為例，可以看出十九世紀 70 年代以江南製造局為主的中國官方譯介的西學書籍主要集中於兵

⁶⁵ 轉引自馬祖毅著，《中國翻譯簡史》（北京市：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4），頁 370。

⁶⁶ 顧衛民著，《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市，上海人民：1996），頁 237。

⁶⁷ 熊月之著，《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市：人民，1994），頁 188。

法工藝、自然科學、應用技術等方面。其中算學測量 24 部，水陸兵法 24 部，工藝 21 部，天文行船 12 部，汽機 10 部，博物學 10 部，地理 8 部，化學 6 部，地學 5 部。⁶⁸數量遠超過其他非自然科學的書籍。宣統元年（1909）陳洙等編《江南製造局譯書提要》，計收譯書 150 種，翻刻書 10 種。大多數仍屬於應用科學、工藝製造方面的譯著，政法、史志、商務、學務等社會科學方面的譯著僅有 33 種。⁶⁹

近代西方列強是憑藉船堅炮利打開中國大門的，故初期國人普遍認為西方物質文明發達，因此要抵禦外侮，必須「師夷長技」，而這個「技」即指兵法工藝等應用科學知識和技術，故譯書多集中於此。此時譯書的選題都是應洋務派之需而定，即便是教會獨立譯書也很注意選題與官方相近。當時譯述豐富的傅蘭雅便曾談到與清政府在譯書選題上的歧見：謂清廷「今特譯緊要之書，如李中堂數次諭特譯某書」，而自己「本欲作大類編書」有系統地「按西國門類分列」，完整地翻譯西學知識，結果未如所願，只得「與華士擇合其緊用者，不論其書與它書配否⁷⁰」而進行翻譯。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甲午戰爭時期。以致梁啟超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編就的《西學書目表》仍以兵政等類書籍為最多。梁啟超對此評論道：

中國官局舊譯之書，兵學幾居其半。中國素未與西人相接，相接者兵而已。於是震動於其屢敗之烈，休然以西人之兵法為可畏，謂彼所以駕我者，兵也。吾但能師其長技，他不足敵也。故其所譯，專以兵為主。⁷¹

與之相應的，自然科學、應用技術類書籍的引進，也是在製造機器的過程中知道船堅炮利仍必須以自然科學為基礎，認識到「今近一切西法，無不從格致中出。

⁶⁸ 傅蘭雅編，《江南製造局譯書事略》。

⁶⁹ 陳洙編，《江南製造局譯書提要》。

⁷⁰ 同註 66，頁 261。

⁷¹ 梁啟超，「變法通議·論譯書」，宋原放主編；汪家熔輯注，《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二卷（武漢市：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頁 12。

製造機器，皆由格致為之根抵，非格致無以發明其理。⁷²」所以聲、光、化、電之類書籍絡繹輸入，目的還是為強兵之用。這時期輸入引進的科技文獻，為中國近代新的科學體系的建立和新學科的產生奠定了基礎，為廢除科舉、創辦新式學校提供了新的教學內容，同時也為中國近代第一批軍工民用企業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知識基礎。

甲午戰後，作為洋務運動成果的北洋水師戰敗，不單代表著洋務運動的失敗，更意味著在洋務派「中體西用論」框架下，數十年經由西學譯書擴充傳統知識的失敗。孫建國說道：

在甲午中日戰爭以前利用西書中譯傳播西學，沒有使清政府走上「中興」之路。對前期西學傳播的有關問題進行反思和檢討，以利於更好地使西學傳播為我所用，成為甲午戰後知識界關注的一個新問題。⁷³

也正如日人稻葉君山所評：「自曾國藩時代所創之譯書事業，雖有化學、物理、法律各類，然不足以喚起當時之人心。⁷⁴」

當時中國先進的知識份子都發現了與西方的差距並不能只從改善器械工具入手：「西人之所強者兵，而所以強者不在兵。⁷⁵」因此變法的呼聲越來越高。如康有為認為「觀大地諸國，皆以變法而強，守舊而亡。⁷⁶」梁啟超也說：

夫政法者，立國之本。日本變法，則先變其本，中國變法，則務其末，是以事雖同而效乃大異也。故今日之計，莫急於改憲法。必盡取其國律、民律、商律、刑律等書而譯之。⁷⁷

無論是「師夷長技」還是「中體西用論」，這些思想的核心還是在「中體」的維護，因此對西學的取用也是以此為出發點。而變法維新的思想則直接對「中體」

⁷² 王韜，《格致書院丙午年課藝》序。

⁷³ 孫建國，「清末民初日文中譯與轉販西學問題研究」，《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1卷6期（2001）：頁59。

⁷⁴ 稻葉君山著，《清代全史》（臺北市，中華書局，1985），頁30。

⁷⁵ 同註71。

⁷⁶ 康有為，「上清帝第六書」，轉引自張易，「中國清末的政治思潮與西學翻譯」，《貴州民族研究》第25卷3期（2005）：頁112。

⁷⁷ 同註71，頁13。

提出了質疑，認識到只學習西方的軍工科技，不效法西方的政法制度，是無法從根本改變。在變法維新思潮的推動下，維新派提出開民智的主要途徑就是廣泛的介紹和傳播西學，將西學作為思想啟蒙的工具，對西學書籍的重視、翻譯和宣傳也就成了社會的普遍現象。這使得自維新運動興起後，西學書籍的翻譯數量遠遠超出之前時期。熊月之統計：

從 1900 到 1911 年，中國通過日文、英文、法文共譯各種西書至少有 1599 種，超過此前 90 年中國譯書總數的兩倍。其中，從 1900 至 1904 年 5 年，譯書 899 種，比以往 90 年譯書還多。⁷⁸

維新變法的思潮不僅反映在譯書數量上，翻譯的重心也從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轉向了人文和社會科學。光緒二十三年（1897），康有為、梁啟超在上海創辦大同譯書局，宣布翻譯的書籍「以政學為先，而次以藝學。⁷⁹」留日學生成立的譯書匯編社也「專以編譯歐美法政名著為宗旨⁸⁰」。從這兩個當時著名的譯書機構，代表著譯書活動的走向。政治、法律、哲學、經濟、思想道德、民權憲法等社會科學書籍的大量翻譯，使社會科學，尤其是政治史地類，逐漸代替了自然科學與應用科學方面的書籍，成為譯介的重點。錢存訓根據《東西學書錄》統計，發現洋務運動時期西方哲學社會科學文獻翻譯數僅占譯書總數的 22%。到了戊戌變法時期，《譯書經眼錄》中，西方哲學社會科學文獻翻譯數量已占此期總數的 61%。⁸¹如更加細分來看《譯書經眼錄》：史志類書籍最多，有 125 部，依次為法政 70 部，學校 48 部，地理 46 部，哲理 34 部，兵制 32 部，小說 26 部，議論 23 部，理化 21 部……。居前位的均為社科類書籍，由此反映出西學的譯介內容與甲午戰爭以前相比，已出現根本性的差異。

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人士，通過甲午戰爭，認識到洋務派的「中體西用

⁷⁸ 熊月之，「晚清西學東漸史概論」，《學術季刊》1 期（1995）：頁 158。

⁷⁹ 梁啟超，「大同譯書局敘例」，宋原放主編；汪家燾輯注，《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武漢市：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頁 225。

⁸⁰ 同註 76。

⁸¹ 同註 13, TABLE III、IV.

論」的錯誤，從而修正了西學譯書輸入的方針目標，將過去的以兵工事業、自然科學為主改為以法政體制、哲學思想為主。小說的譯介，也是因為維新派看到小說有開啓民智之作用。甲午戰後的譯書因為要變法維新，將焦點放在社會民眾的思想啓蒙上，要進行思想啓蒙，當然需要引進包括文學在內的各門社會科學的知識。所以在《東西學書錄》和《譯書經眼錄》中，才有了社會科學書籍超過自然科學書籍這種現象。

（二）日譯西學的傳入

晚清早期所譯西書均來自歐美國家，因為譯書的重點是彌補中國所缺少的現代科技，而歐美國家得科技發展之先，因此所譯西書均來自歐美國家是順理成章的。如《西學書目表》所錄鴉片戰爭後至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間出版的西學書籍全部譯自歐美國家。另一方面則是英美傳教士作為初期譯書的傳播主體，自然以英美書籍為主。然而隨著日本明治維新後的崛起，這對同屬於亞洲的中國是一大刺激，也因為日本與中國語言相近，後更因甲午戰爭失利於日本的直接影響，使得當時中國興起一股仿效日本，並藉由日本輸入西學的潮流。首先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所撰《勸學篇》中便力陳翻譯日文書籍的必要性：

大率商賈市井，英文之用多；公牘條文，法文之用多。至各種西學之要者，日本皆已譯之，我取徑於東洋，力省效速，則東文之用多。……學西文者，效遲而用博，為少年未仕者計也。譯西書者，功近而效速，為中年已仕者計也。若學東洋文，譯東洋書，則速而又速者也。是故從洋師不如通洋文，譯西書不如譯東書。⁸²

康有為更多次大力鼓舞借鑒日本以學習西方的途徑，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康有為完成第一部日文書的譯書書目《日本書目志》，幾乎與《新學偽經考》、

⁸² 張之洞，「勸學篇·外篇·廣譯第五」，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叢書集成初編》（北京市：中華，1985），頁127-128。

《孔子改制考》同時作，而且於次年春，由上海大同譯書局同時梓行。康有為有感於時局，即便舉全國之力也無法譯完學書籍，於是，來自於日本的西學譯書被擺上了特殊的位置，他在《日本書目志》序中說道：「泰西諸學之書，其精者日人已略譯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為牛，日本為農夫，而吾坐而食之。⁸³」

這不僅僅是日本已大略譯出泰西諸學之精者，加上日文近於漢文，便於國人接受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隨後在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提出的《請廣譯日本書派遊學摺》中所說：

日本昔亦閉關也，而早變法，早派遊學，以學諸歐之政治工藝文學知識；早譯其書，而善其治，是以有今日之強而勝我也。吾今自救之圖，豈有異術哉，亦亟變法，亟派遊學，以學歐美之政治工藝文學知識，大譯其書以善其治，……以為日本與我同文也，其變法至今三十年，凡歐美政治文學武備新識之佳書，咸譯矣，……譯日本之書，為我文字者十之八，其成事至少，其費日無多也。⁸⁴

正因如此，康有為構擬了一個由學入政的體系，藉由推廣來自日本的西學譯書，來達到變法自救的意圖。與此同時，梁啟超未待《日本書目志》刊行，就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時務報》上發了熱情洋溢、文筆縱橫的《讀日本書目志後》，呼籲光緒皇帝、慈禧太后、朝廷大臣以及全體國民讀日本書、效法明治維新，由此可見其推廣日譯西學書籍的主要意圖。

從他們的論點可以看出，當時之所以提倡透過日本轉口西學，主要的原因即在於中日間語文相似，方便於譯書活動的進行。復加甲午戰爭失利於日本，認為是其較早接觸西學，有豐富的資源可供利用。同時日本具有因維新而在短期內崛起的示範效應。同時日本也是較好地將西學本土化的榜樣。於是在甲午戰爭至戊

⁸³ 康有為，《日本書目志》自序。

⁸⁴ 康有為，「請廣譯日本書派遊學摺」，宋原放主編；汪家燊輯注，《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武漢市：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頁53。

戊變法之間的四、五年時間裡，中國知識學界多以日文為捷徑，廣泛傳播西學。通過提倡學習日文、日文中譯思想的醞釀，日文中譯作品逐步進入出版發行時期。

而後在戊戌變法時期及二十世紀初，日文新書新作更是大量的出版發行。顧燮光在光緒三十年（1904）出版的《譯書經眼錄》序中描寫道「日本文譯本，遂充斥於市，推行於學校，幾使一時之學術，寢成風尚。⁸⁵」梁啟超也說「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輒數家，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矣。⁸⁶」譯日本書風氣之盛，由此可見一斑。日文中譯作品在社會上得到廣泛的傳播，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迫使中國人從失敗的教訓中重新考察日本，學習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成功經驗。維新派人士認為「日本自維新以後，銳意西學，所翻彼中之書，要者略備，其本國新著之書，亦多可觀。⁸⁷」通過翻譯日譯西學書籍傳播西學，能夠滿足社會對西學的需求。梁啟超創設上海大同譯書局，主要翻譯日文作品。其他類似的翻譯機構還很多，翻譯出版了多種有關西學之社會、經濟、法律、歷史、教育等方面的日文書籍。

再次，日文中譯出版事業的繁榮與中國留日學生的翻譯出版活動有密切關係。甲午之戰後，到日本留學、親身了解日本改革富強的經驗，並吸收經日本引進消化了的西方文化，成為許多中國有志青年的選擇。據統計從 1896 年到 1906 年，留日學生人數從 13 人猛增到 12000 人。⁸⁸這些留日學生在日進行了大量文化交流活動。他們紛紛結社團，辦刊物，編譯書籍，參與了國內的日文翻譯活動，對傳播西學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如光緒二十六年（1900），作為留日學生相當重要的譯書出版事業機構「譯書匯編社」成立，出版有《譯書匯編》雜誌，連載日文中譯作品。《譯書匯編》創刊號刊載有法國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

⁸⁵ 顧燮光編，《譯書經眼錄》自序。

⁸⁶ 梁啟超著，《清代學術概論》（臺北市：商務印書館，1994），頁 161。

⁸⁷ 同註 71，頁 21。

⁸⁸ 周曉明，《多源與多元：從中國留學族到新月派》（武漢市：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 54。

的《萬法精理》、美國伯蓋斯的《政治學》、法國伊耶凌的《權利競爭論》等十餘種著名的西學著作。⁸⁹向留學生界和國內傳播西方和日本的資產階級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識。

對於日譯西學的大量引進，王闓運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就認為時人所習「名為西學，實倭學也」。葛兆光先生以為「這話應當反過來說，當時看上去雖然滿眼都是倭學，其實都只是轉手從日本販來的西學。」二人或各見其一個側面，不過當時的情形確如葛先生所說，大致已是「西潮卻自東瀛來」。⁹⁰鄒振環為晚清透過日本轉口西學的過程下了一個很好的結論：

日本學習西方文化，並成功地把自已的傳統與西方現代思想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塑造了自己獨特的形象，對甲午戰後的中國知識份子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20世紀初的日文西書中譯本以及日書中譯本都清楚地表明了這一事實：日本在中國近代化的過程中，發揮了西方文化中間人與啟蒙導師的雙重作用。⁹¹

錢存訓根據《譯書經眼錄》統計，光緒二十八年（1902）到光緒三十年（1904）年間出版的譯書 533 種，其中譯自英、法、美、德、俄的譯著 131 種，譯自日本者 321 種，後者為前者的 2.5 倍，其中史地類與社會科學類譯書達 264 種。⁹²另一方面據香港譚汝謙《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序言中針對光緒二十二年（1896）到同治三年（1911）整個時期日文中譯的統計資料來看。這一時期中譯日書共 958 種，其中社會科學類最多達 366 種，占整個譯書總量的 38%；世界史地有 175 種，占 18%；語言類 133 種，占 13%；其他科技類譯書僅近百種。⁹³兩者不單反應了日譯西書已佔了譯書的主體，也印證了之前所提晚清時

⁸⁹ 同註 73，頁 62。

⁹⁰ 羅志田，「西學衝擊下近代中國學術分科的演變」，《社會科學研究 1 期》（2003）：頁 111。

⁹¹ 鄒振環，「晚清西書中譯及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宋原放主編；汪家熔輯注，《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二卷（武漢市：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頁 147。

⁹² 同註 13, TABLEIV.

⁹³ 譚汝謙主編；小川博編，《日本譯中國書綜合目錄》，譚汝謙序，「中日之間譯書事業的過

期，譯書在社會科學門類的逐漸到突飛猛進的成長。然而由於留日學生受到理論素養與日語水平的侷限，只圖翻譯的數量，對原作不能善加選擇，因此，雖然他們譯書眾多，整體素質並不高。梁啟超語帶批評的說：「蓋如久處災區之民，草根木皮，凍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頤大嚼。⁹⁴」黃福慶也說：

雖然這種毫無選擇的介紹中有看許多毛病，但中國近代化的雛型卻是由於他們的畢路藍縷以啟其端。……留日學生在翻譯方面的貢獻，實為同時代留學其他國家的學生所不及。⁹⁵

由於日譯西書的大量引進，擴大了晚清西學的多面性，復加上當時日譯西書的良莠不齊，譯書書目爲了因應這樣的變化，自從康有爲首開先例，收錄日譯西書的譯書書目《日本書目志》，之後如光緒二十五年（1899）徐維則所編《東西學書目》、三十年（1904）顧燮光《譯書經眼錄》都收錄有日譯西書，同時普遍編有提要，正是爲此而做出的變化。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杜亞泉所編《日本理學數學書目》、二十八年（1902），梁啟超在他主編的《新民叢報》上開了「介紹新書欄」，並撰寫、刊行了一個推薦日本新書的《東藉月旦》都更加是針對日譯西書所編纂的譯書書目。

三、書目答問對西學的反應

十九世紀後，西方科學書籍被陸續翻譯到中國。儘管四部法能夠容納中國傳統典籍，涵蓋中國主要知識領域，但卻難以反映這些西學譯書的性質和內容。如前節所述，早期譯書數量不多，所以《四庫全書總目》能輕易的將譯書套入中國傳統學術的範疇，以古典目錄學的方式來編排譯書。但晚清時期，譯書數量的逐漸成長，內容大異於中國傳統學術，使得以古典目錄學的思維來編排譯書已相當

去、現在與未來」（香港：中文大學，1981），序頁 66。

⁹⁴ 同註 86，頁 162。

⁹⁵ 黃福慶著，《清末留日學生》（臺北市：中研院近史所，1975），頁 182。

困難，目錄學家昌彼得指出：

自四庫總目出，四部法遂得獨尊於一時。然而自鴉片戰爭後，海禁大開，西學東漸。同治、光緒間，同文館、江南製造局相繼設立，學人紛紛譯介東西洋的學術。東西洋學術皆於中國舊學不同。而國人新著作的內容與體裁，也與舊籍異。四部分類法不能專收舊籍，以之適用於新書，實枘鑿而方圓，格格不入。乃因外來的影響，生事實上的困難。歷時千餘年的四部法，遂呈動搖之勢。⁹⁶

因此一些中國學者便開始尋求變通、嘗試將譯書納入中國以四部為框架的知識系統之時，同時也對四部法作出適當調整。張之洞所撰《書目答問》無疑是其典型代表。

《書目答問》之作始於清同治十三年（1874），而初刻於光緒二年（1876），當時張之洞正在四川學政任上（1873—1876）。該書寫作的緣起，張之洞說是「諸生好學者，來問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為善。偏舉既嫌挂漏，志趣學業亦各不同，因錄此，以告初學。⁹⁷」這意味這是一部為初學者指導求學門徑的書目。全書基本遵循《四庫全書總目》的分類體例，但又稍有損益。在傳統「經史子集」四部之外，又增加了「叢書」和「別錄」兩個門類。在子目之下，又按「類例相近」者分小類，但是不標目，僅以「」（鈎乙）來區分。小類之中書目的排列則以時間為序。經過一番選擇，最後收錄了書目二千多部。在這二千多部書中，「其原書為修四庫時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庫雖有而其書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⁹⁸」也就是說，《書目答問》收入的書目，絕大部分是清人著述或者經過清人整理校勘的作品。可見，《書目答問》反映了清人閱讀及治學的基本趨向。《書目答問》在對於西學的態度上要比《四庫全書總目》開放得多。

《四庫全書總目》編撰之時，清朝正執行嚴格的閉關鎖國政策，因此，《四庫全

⁹⁶ 昌彼得、潘美月著，《中國目錄學》（臺北市：文史哲，1986），頁225。

⁹⁷ 張之洞，《書目答問》，略例。

⁹⁸ 同上註。

《四庫全書總目》的編撰者們對於外部世界的了解是十分有限的，對於西方世界的認識也是有著很大的偏見的。在對於西學的態度上，《四庫全書總目》秉持「西學中源」的思想，《四庫全書總目》對於宣揚天主教教義之書完全不錄，對於明末以來輸入的西方自然科學書籍也掛一漏萬。相較而言，《書目答問》對於西學的態度則已經開放得多。以當時傳入較多的天文算法類來說，《四庫全書總目》將譯書分入「推步」、「算書」，並沒有反映當時西方曆法所傳入的現象。而《書目答問》則以「中法」、「西法」、「兼用中西」分，中法與西法並列，顯然，西學譯書的價值在這裡已經得到很大的認可。又如史部地理類，其中收錄介紹世界地理的著作 12 部，其他如農書類、兵書類等都收錄有譯書。值得注意的是，張之洞收錄了鴉片戰後中國學者李善蘭等人翻譯之西洋最新數學著作，如李善蘭譯《新譯幾何原本》13 卷、及偉烈亞力著《數學啓蒙》等。張氏在解釋收錄這些書籍之原因時說「算學以步天為極功，以制器為實用，性與此近者，能加研求，極有益於經濟之學。⁹⁹」《書目答問》對待西學的態度相較《四庫全書總目》是相當大的進步。

然而《書目答問》對當時中外典籍進行分類之基本依據，仍然是四部法。這一方面說明此時傳入中國的譯書，仍然是四部所能容納的；另一方面也表明張之洞對於當時傳入中國之西學知識，並非沒有注意，但仍然以中學統攝西學的原則，將新譯天文、算學等書籍，納入到了四部法中。它與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明確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也就是說，《書目答問》的著述思想是同光新政以儒學為體而以西學為用思想的具體化。但時人江人度上書張之洞論之：

第思目錄之學最難配隸適當。《四庫提要》所列門目與昔之目錄家頗有出人。中堂《書目答問》與《四庫》復有異同。移甲就乙，改彼隸此，要亦難為定論。……然處今之世，書契益繁，異學日起，匪特《七略》

⁹⁹ 同註 97，天文算法第七。

不能復，即四部亦不能賅……且東西洋諸學子所著，愈出愈新，莫可究詰，尤非四部所能範圍，恐四部之藩籬終將沖決也。¹⁰⁰

江人度以目錄學的角度認為四部法遲早將無法處理日益眾多的西學譯書，《書目答問》雖然在四部法的基礎上做出了改變，但仍未能擺脫中國傳統學術的思考範疇。

《書目答問》作為一部導讀性的書目著作，以張之洞的身份地位，藉此向學生們推薦這些西學書籍，對當時的社會，必然具有某種象徵性意義，它說明在同光時期西學已經是學人不得不熟悉的知識內容了。《書目答問》不同於一般的中國古典書目就在於其編纂是為推薦學子與導讀而作，這已與中國之前古典書目是為藏書而作有本質上的差異。而它們在分類與學術上的性質又使它們與古典書目相近。《書目答問》開列導讀性書目的方法，對於近代的學風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甲午戰爭後，隨著變法失敗，書目被維新人士充分利用，作為宣傳政治思想的手段，書目的推薦導讀作用被明顯放大，並與政治、文化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產生了很多導讀性書目，而之後出版的譯書書目便是走向此一方向。

¹⁰⁰ 轉引自姚名達著，《中國目錄學史》（上海市：上海古籍，2005），頁 103-114。

第參章 譯書書目的編纂與著錄體例

本章將對譯書書目的發展概況及體例加以探討。先從譯書書目的類型切入，將譯書書目根據收錄書籍內容分為專科型及綜合型，以及機構編纂的出版目錄。藉由對譯書書目類型的區分，對譯書書目的內容有初步的認識。而後進一步對書目編著者的分析、釐清譯書書目的編纂思想、編著原因，由內而外的論述到譯書書目的著錄方法、類序應用、著錄項目，再由外而內的與譯書書目的編輯意涵相互映證。

第一節 譯書書目的類型

本節將從譯書書目的類型切入，將譯書書目根據內容分為專科型及綜合型，其中專科型譯書書目又可分為宗教、自然科學兩類。而綜合型譯書則是更加擴大所收錄的書籍，除了宗教、自然科學外，廣及社會科學、語言文字、教育、文學等。而除了這兩類譯書書目外，尚有江南製造局及廣學會，針對所出版的譯書，集結而成的機構出版目錄，也將提出來討論。

一、專科型譯書書目

(一) 《道學家傳》至《泰西著述考》：宗教譯書書目的產生

伴隨著天主教的輸入，明清之際幾部著名的書目也特別收錄傳教士和中國學者譯介的西方書籍。如《脈望館書目》設「大西人書類」、《白華樓書目》設「外學類」（其中有佛教書）以及《絳雲樓書目》設「天主教類」，從這類書目的編排，可以發現當時中國社會對西學譯書的認知，是以傳教士個人以及所傳宗教書為主。因此第一步將譯書獨立於中國古典書目之外而形成的書目，便是以宗

教譯書書目爲開端。

明清之際韓霖、張賡撰《道學家傳》，在各教士傳後列舉其所著譯之書名，《道學家傳》附刊於《聖教信證》之後，是本研究所發現最早的宗教性譯書書目。之後清初趙魏所編的《竹崦庵書目》載有韓霖《西士書目》。而據姚名達考究《西士書目》就是《道學家傳》的單行本。¹而清朝瞿穎山《清吟閣書目》中著錄有《耶穌會士著述目》，現已亡佚，臺灣中研院收藏有《耶穌會士姓氏著述目》，²因缺乏相關證據，不知是否爲同一書目。這類書目中以清光緒十五年（1889）王韜所編《泰西著述考》較爲著名，編者是晚清著名的政論家、學者。他頗留意西方科學史，對於天文學的研究也頗有造詣，著述有《西國天學源流》、《西學原始考》，而《泰西著述考》是他在墨海書館工作期間編成。據姚名達考證《泰西著述考》以韓霖、張賡的《道學家傳》爲藍本。³實際收錄明末清初西洋來華耶穌會士之傳記與著述，書目中以 92 名傳教士小傳爲目，介紹傳教士所著譯書 210 種。在傳中介紹教士來華時間、主要活動地點、卒年墓址以及部分教士所譯述之書。書目部分僅簡單著錄書名卷名，如熊三拔其目下著錄有：

《泰西水法》六卷 《簡平儀》 《表度說》⁴

其中相當多書籍並未記載卷數，著錄簡陋，書目也並未分類，這自然是因爲書目的用意在於介紹傳教士，而非以書籍爲主的緣故。

另外，法國傳教士費賴之於光緒年間（1868-1888）在上海編纂的《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則更加是以教士生平爲主的傳記作品，但是教士如有譯述作品，也會將其註明，但僅著錄書名與卷數，少部分詳加註明其梗概，起到提要之效。如鄧玉函其目下：

（三）《奇器圖說》三卷，一六二七年北京刻本，玉函口授，王徵筆

¹ 姚名達著，《中國目錄學史》（上海市：上海古籍，2005），頁 166。

² 中央研究院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善本書目》（臺北市，中研院，1968），頁 104。

³ 同註 1。

⁴ 王韜編，《泰西著述考》。

述。

一六二八年南京刻本，前有玉函弟子張某（Tchang Yong-yu）序。一八四四年收入《守山閣叢書》。徵與玉函別撰有《諸器圖說》一卷。

（五）《測天約說》二卷。⁵

值得注意的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書末附有「本書在傳人重要譯著書目」，於傳教士下附書名，相當方便使用者查找，發揮書目索引的功用。

以上所提的宗教譯書書目主要集中在譯書活動的前期，即耶穌會士譯書階段，書目中所收書均為教士的譯著。然而這類型的書目因多為宣揚傳教士在華傳教的貢獻，書籍並不是所關注的重心。因此書目的編排多以教士入華傳教時間為序，以教士小傳為目，在教士姓名下列其著作，著錄格式簡略，僅部分有簡略提要。著錄方式採取的是「以書類人」之法，不同於中國古典書目多採行的「以人類書」之法。「以書類人」之法在《隋書·經籍志》集部已見此例，是以書名注於人名之下，歐陽修《新唐書·經籍志》亦以人名居首。這都突顯了宗教譯書書目主要編纂目的。因此雖然傳教士的譯著除了經院哲學及神學著作外，仍包含有天文、數學、物理、軍事技術、生理學、地圖學等自然科學著作，但深究書目的本質，本研究將其歸類於宗教譯書書目。

（二）《曆書總目表》為開端的自然科學性譯書書目

在譯書書目中有一類專門閱讀書目，是編纂者專以某門學科，或某一專門問題為核心而推薦介紹必讀之精要書的書目，以期使初學之人盡快找到門徑。這類書目可以是包容某學科全面研究成果的圖書綜錄，也可以是圍繞某學科選萃重要書籍，作為入門推薦的導讀性質書目。由於明末開始傳入的西學譯書，除了宗教書籍外，數量最多的就是自然科學類書籍，所以這類專門譯書書目皆是屬於自然

⁵ 費賴之編，《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

科學學科。而在西學所傳入的自然科學書籍中，天文曆法一直受到相當的關注，數量也最多。這是由於中國社會自古重視曆算之學，加上明清兩代改曆的需要，中國士大夫急需從西洋之學中吸納較為先進的天文數學知識。因此這類譯書書目中最早出現的《曆書總目表》正為當時所翻譯西方曆法的書目。日後此類書目也一直以天文、算學為發展的重心。

明崇禎二年五月一日（1629）欽天監根據大統曆預測日食，誤差竟達兩刻，而徐光啓根據西法推算北京、瓊州、大寧日食都得到證實，於是用西法改革時曆就成為當務之急。崇禎二年年末（1629），徐光啓奉旨督領修曆事務，籌建曆局。徐光啓主持明末西洋曆局期間，與精通天文曆算的耶穌會士，主持編撰《崇禎曆書》137卷，其中翻譯了相當多的西方重要曆法圖書。崇禎四年（1631）徐光啓第一次進表詳述翻譯曆書的緣由，以及區分曆書的分類標準並紀錄初步翻譯的西方曆書，此表即為《曆書總目表》。

《曆書總目表》將所編譯的西方曆法書依2個分類系統細分，首先是節次六目：「日躔曆」、「恆星曆」、「月離曆」、「日月交會曆」、「五緯星曆」、「五星交會曆」；其次為基本五目：「法源」、「法數」、「法算」、「法器」、「會通」，可以看出節次是以曆書所涉及的曆法為主，而基本五目則是以曆書的內容性質為依歸，也就是體用之分。書目中的紀錄方式為每種書下記錄書名、卷數之後再予以分類。如：

日躔表二卷 屬法數 屬日躔⁶

由於所譯書籍數量不多，加上此表僅是為了提供御覽，所以著錄項目相當簡略。但採行的分類方式大大迥異於一般書目，突顯了書目的科學性質。

然而因清中葉的禁教措施，中斷了西學輸入的過程。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依循著中國傳統的「重道輕藝」的思想，雖然收錄有豐富的西方天文曆算之書，但子部天文算法類，其下僅分為「推步」、「算書」兩子目，使得自然科學

⁶ 徐光啓編，《曆書總目表》。

譯書書目無法進一步發展。但隨著新教傳教士再次展開的西學輸入與譯書活動，使得這類譯書書目再度得到發展的機會，不過卻因「西學中源說」以及「中體西用論」的提出，這類書目形成將翻譯的西方天文曆算之書與中國社會傳統天文算法之書合併收錄的模式，但由於所收錄仍以譯書為主，對西方天文曆算之書也多有提要介紹，本研究仍將其視為譯書書目。如梁兆鏗於清光緒年間所編纂的《天文算法考》與隨後丁福保所編纂的《算學書目提要》、馮徵所編《算學考》、劉鐸《若水齋古今算學書目》都採取了中西圖書混編的方式。

梁兆鏗於光緒年間編纂有《天文算法考》，此書目並未刊印，現僅存稿本。根據大陸學者整理現存 16 冊計 887 頁（線裝書雙面頁），四周無邊框，前無題、序，復無跋語，書中各頁均未編號，⁷存稿次序混亂。究竟這些混亂是作者本人未經整理加工造成的，還是後人修補裝訂中造成的，就無從查清了。⁸書目中僅有 6 冊封面題寫了卷數及類目名，即卷一、二、三、四、七、八，缺卷五、六。卷一為「敕撰、經籍」，卷二為「天象」，卷三為「儀象」，卷四為「曆術」，卷七為「天元、四元、幾何、借根、三角、代數」，卷八為「總義、叢書」。其餘各冊均無卷數及類目名稱，按其內容大致可歸入以上各卷。

從內容看，《天文算法考》是歷代有關天文算法著述之書目、提要、考證、序、跋的彙集。在這現存的 16 冊中、共收錄歷代天文算法著述一千兩百餘部，⁹其中天文學部分佔多數。書中著錄格式為每種書下著錄作者、書名、卷數，部分有提要，提要採輯錄體的方式，是輯錄諸家評述和其他書內有關資料而成的，而非書目編纂者所做。如華里司《微積溯源》的提要即輯錄此書譯者華蘅芳的自序。

《若水齋古今算學書錄》由劉鐸所編纂，光緒二十四年（1898）上海算學書局石印本。是上海算學書局編選的數學精要書目，著錄古今中外數學書籍 2313

⁷ 任繼愈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河南：河南教育，1993），頁 1-969。

⁸ 同上註，頁 1-970。

⁹ 同註 7。

部。¹⁰劉鐸自序曰：

案是書共分經、史、象數、樂律、兵法、格致、天文七門。後附各叢書
並子目蒐羅繁富，足資考證。¹¹

書目中先分爲 7 門，每大類下分若干小類，如「象數」下分「象數」、「象總」、「勾股」、「三角」、「割圓」、「弧角」、「曲線」、「數總」、「右之分」、「開方」、「比例」、「垛積」、「對數」、「天元」、「四元」、「代數」、「微積」、「象數總」、「算器」、「算表」、「算說」、「附算學叢書」共 22 類。共計 7 門 60 類。書目中著錄格式爲每種書下著錄書名、卷數、著譯者姓名和版本，並無提要，間有考證說明，也甚爲簡略，版本亦多有遺漏。如：

八星之一總論一冊 李提摩太撰 美華書館鉛印巾箱本 格致彙編本 名地球奇妙論 以日之熱力，演其生數，其宗旨在推廣教術，故不用密率。

¹²

《算學考》，馮徵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所刊印，自序曰：

數居六藝之一，故明史藝文志以算數入小學，誠以象數之學，為儒者所當務也。……爰仿秀水朱氏、南康謝氏、經義小學考例編算學考若干卷。卷首錄敕撰循二書例也。¹³

說明了書目的編纂體例是依循《經義考》的著錄方式。《算學考》共區分 3 類爲算學（卷一到十三）、天文（卷十四到十五）、曆法（卷十六到二十）。以作者人名爲單位，把一人所有著作萃取在一起，註明存軼或未刊，並錄有原書序跋，未錄者註明序跋未錄。這與劉鐸《若水齋古今算學書錄》以內容爲分類，並專詳版本者有所差異。其著錄格式如：

¹⁰ 來新夏主編，《清代目錄提要》（山東：齊魯書社，1997），頁 305。

¹¹ 劉鐸編，《若水齋古今算學書目》自序。

¹² 劉鐸編，《若水齋古今算學書目》。

¹³ 馮徵編，《算學考》自序。

徐光啟 交食曆指七卷 存¹⁴

以內容來看，《算學考》、《若水齋古今算學書目》雖以算學為名，但實際上仍收錄有相當數量的天文曆法，反應了中國傳統學術領域中，天文曆算為一家的狀況。

至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由丁福保任無錫埃實學堂算學教習時，所編纂《算學書目提要》則是專以算學書目為主。丁福保從中國古代象數著作和西洋傳入的翻譯著作中，選取「最切要而又令人心折¹⁵」的中西算學典籍編輯而成。清末著名科學家華蘅芳對此書目評價頗高，作序稱「其擇言簡要，持論平允，附記刊誤，尤為切實。¹⁶」書目分為 3 卷。上卷中算類收錄《周髀算經》等 20 部。中卷西算類，收《算法須知》、《對數表》等 41 部。下卷中西算總類，分中西算合著、算學叢書、算學目錄等小類，錄 27 部書，總計 88 部書。各書在類內由淺入深排列，且部分有簡單提要，記錄版本、學術價值等。著錄格式為每種書下紀錄有書名、卷數、編譯者、提要。如：

同文算指前編二卷通編八卷 泰西利瑪竇譯，明李之藻演。案是書前編言筆算定位，加減乘除分法，通編以西數論九章。¹⁷

《日本算學書目》刊載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所發行的亞泉雜誌 10 期，亞泉雜誌由杜亞泉主辦的亞泉學館翻譯出版，此書目是受到甲午戰後，因應日譯西學的傳入而編纂。但因本研究並未親見《日本算學書目》，無法提出其分類方式與著錄格式，但因與之後所提的《日本理學書目》同刊載於亞泉雜誌上，著錄格式應相仿。

《農務要書簡明目錄》不同於前面所提到的天文曆算譯書書目，所收書皆歐、美、日等各國農業方面專著，總計收書 216 種。由傅蘭雅口譯，王樹善筆

¹⁴ 馮徵編，《算學考》。

¹⁵ 丁福保，《算學書目提要》自序。

¹⁶ 丁福保，《算學書目提要》華蘅芳序。

¹⁷ 丁福保，《算學書目提要》。

述，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在自序中，傅蘭雅說明書目的分類以紐約藏書樓分類法為藍本，「此編得自紐約藏書樓，依其原書類列之次第，而略更動之。¹⁸」借鏡於外國成法來分類的方式與其他譯書書目分類法多為個人所編制有相當大的不同，惜本研究未見當時紐約藏書樓分類法，無法得知其參考依據。書目分為3大類：「泥土學」、「植物學」、「動物學」。每大類又分為4小類，計12個小類：「化學」、「水利」、「耕耙」、「糞壅」、「種田」、「種菜」、「種果」、「種花」、「牲畜」、「禽鳥」、「虫豸」、「魚蛤」，後附雜事。書目的著錄格式為每種書下著錄書名、著者、提要、美金價錢，部分標明有無附圖及頁數。如：

量地變法 必達著

書本甚小，便於攜帶。如量得地之長與寬兩數，查書中之表，一望而知面積之畝數。至一千五百尺之邊為限。六角¹⁹

《日本理學書目》刊載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所發行的亞泉雜誌7期，由杜亞泉主辦的亞泉學館翻譯，書目中共分13類：「理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氣象學」、「博物學」、「生物學」、「人類學」、「動物學」、「植物學」、「地質學」、「地震學」、「礦物學」。書目的著錄格式為每種書下著錄書名、作者、日本價錢，如：

地學淺釋 乙骨保田 100²⁰

《日本理學數學書目》刊載於亞泉雜誌8期（1901），由於與亞泉雜誌第7期所刊載的《日本理學書目》、第10期所刊載的《日本算學書目》在書目名稱上極為類似，但因本研究並未親見《日本理學數學書目》，也缺乏相關記錄，不知是否為《日本理學書目》與《日本算學書目》的合編本。但著錄格式應與兩者相仿。

¹⁸ 傅蘭雅口譯；王樹善筆述，《農務要書簡明目錄》。

¹⁹ 同上註。

²⁰ 杜亞泉編，《日本理學書目》。

二、《西學總目表》到《譯書經眼錄》：綜合型譯書書目的逐漸成長

綜合型譯書書目在本研究中的認定，是以包含有宗教、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綜合各學科譯書的書目，此類書目產生於晚清時期，以《西學書目表》首開先例。在譯書書目之中以此種書目著錄格式最為完備，收錄譯書也最為齊全、對社會的影響也最大。其下又可根據所收錄西學譯書的來源再做區分，由於晚清早期所譯西書均來自歐美國家，所以如《西學書目表》所錄鴉片戰爭後至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間出版的西學書籍全部譯自歐美國家。然而隨著日本明治維新後的崛起，甲午戰敗，這對同屬於亞洲的中國是一大刺激，康有為多次大力鼓舞借鑒日本以學習西方的途徑，光緒二十三年（1897），康有為完成第一部介紹日譯西書的譯書書目《日本書目志》，隨即梁啟超也編纂《東籍月旦》。隨著日譯西學的大量輸入，社會上出現將直接來自西方的譯書以及日譯西書收錄在一起的書目，如沈桐生《東西學書錄提要總序》、徐維則《東西學書錄》、顧燮光《譯書經眼錄》等。如以目錄學界的前例，即分為西學書目、東學書目，及東西學書目，以下分別介紹。

（一）《西學書目表》首開先例的綜合譯書書目

梁啟超作為晚清時期大力鼓吹西學以及維新變法思潮的代表人物，他為了廣泛介紹西方當時先進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書籍，並積極推動西書的翻譯工作。因而他便利用編制書目的方法，著手對西書進行編目和宣傳。他嘗試初編的西學書目為《西書提要》，但該書目並未刊印。梁啟超在之後發表的《西學書目表》序例中說到：「余既為西書提要，缺醫學、兵政兩門未成。²¹」因此《西書提要》終因缺少「醫學」和「兵政」兩門，而未克全部完成。而梁啟超雖曾於清光

²¹ 梁啟超編，《西學書目表》自序。

緒二十二年（1896）時務報上發表《西書提要》農學總敘，但文後並未附有書目。

梁啟超於同年時務報上繼續發表以《西書提要》為基礎所編纂的譯書書目即《西學書目表》的序言，而後《西學書目表》由時務報刊印出版。書目中分上、中、下和附錄共 4 卷，札記 1 卷，後附《通商以前西人譯著各書》、《近譯未印各書》《中國人所著書》、《讀西學書法》。這個書目除宗教圖書不收外，共收書 645 種。其中，正表部分著錄鴉片戰爭以後所譯西書 351 種，其中西學諸書 129 種，西政諸書 168 種，雜類之書 54 種。附錄通商以前西書譯著 86 種，近譯未印西書 88 種，國人所著與西書有關書籍 120 種，其中政書多於學書 38 種。²² 梁啟超自序曰：「光緒丙申以前新學書大致略具矣」，「此三百種者，擇其精要而讀之，於世界蕃變之跡，國土遷異之原，可以粗有聞矣。²³」

《西學書目表》中梁啟超將西書分為 3 卷。上卷為「西學諸書」，其目曰「算學」、「重學」、「電學」、「化學」、「聲學」、「光學」、「汽學」、「天學」、「地學」、「全體學」、「動植物學」、「醫學」、「圖學」。中卷為「西政諸書」，其目曰「史志」、「官制」、「學制」、「法律」、「農政」、「礦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下卷為「雜類之書」，其目曰「遊記」、「報章」、「格致總」、「西人議論之書」、「無可歸類之書」，共 3 大類 28 小類。前有序例，部分小類有類序，如「算學」類序：

由淺入深，故先以數學，先理後法。故次以幾何，凡諸形學附焉。次代數，通行之算也。微分積分，非深造不能語，故以終焉。²⁴

著錄格式為每種書下著錄書名、圈識、撰譯人、刻印處、本數、價值、識語。識語內介紹書的用途、內容深淺和好壞，也就是提要。圈識為在書名下上附加小圈，以小圍的多少來表示書的重要性。如：

²² 同註 10，頁 280。

²³ 同註 21。

²⁴ 梁啟超編，《西學書目表》。

西學考略 丁韋良 同文館本 二本 五錢 丁告假回國，歸而著此詳於學

00²⁵

校

但是《西學書目表》在著錄時也並非完整著錄，有相當部分著錄的相當簡略，並非對每一種書都有項目齊全的著錄。無圈識與識語的原因如梁啟超於「工政」類序所云：

諸書多未讀者，不敢妄加圈識，已讀諸書識之。²⁶

既然梁啟超所未讀之書並未加以圈識，自然也並非所有讀過的圖書，都能有一番心得，所以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圖書並未有識語。

《通商以前西人譯著各書》、《近譯未印各書》、《中國人所著書》附於《西學書目表》後，以下分別介紹。

《通商以前西人譯著各書》是收錄較早由耶穌會傳教士所翻譯編纂的書籍，書目並未分類，雖無註明，但本研究查考後發現未收宗教書。書目採取「以書類人」之法，其著錄格式為每種書下著錄書名、卷冊數、版本，無提要。如：

天問略一卷 天學初函本 藝海珠塵本 四庫著錄

以上陽瑪諾²⁷

《近譯未印各書》是收錄《西學書目表》成書時已譯成未印、尚未譯成、已亡佚之的譯書。分類為「算學」、「光學」、「電學」、「天文」、「地學」、「全體學」、「動植物學」、「醫學」、「圖學」、「氣學」、「史志」、「法律」、「礦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共 17 類，類目與《西學書目表》相同，僅大為刪減。其著錄格式為每種書下著錄書名、撰譯人、撰譯處、本數、目前出版狀況。如：

熱學 金楷理 製造局 二本 未印²⁸

²⁵ 同上註。

²⁶ 同註 24。

²⁷ 同註 24。

²⁸ 同註 24。

江衡

《中國人所著書》是收錄中國人所著有關西學之書籍。分類為「地志」、「交涉」、「遊記」、「議論」、「雜錄」5類。其著錄格式為每種書下僅著錄書名、撰譯人，部分有年代。如：

外國師船表 許景澄 光緒十四年²⁹

繼《西學書目表》，社會上陸續出現了許多以《西學書目表》為藍本的西學書目，如同年盧靖隨即增訂《西學書目表》而成《增訂西學書目表》、胡兆鸞編纂的《西書考》、隔年黃慶澄編纂的《中西普通書目表》、後年述盧編纂的《通學書籍考》都屬之。

《增訂西學書目表》由盧靖所增訂，盧靖在附識中說：

余於溧陽書院添設天算等小學堂，肄業生童，屢以應讀何書，請口授筆答，已不勝其繁矣。……今見梁君卓如所撰西學書目表、讀西學書法，收羅宏富，評論精當。……因授梓人重刻之，以分給生童。³⁰

由此可知盧靖所重新出版的目的是為了提供學堂學生讀書指引之用。書目著錄格式為每種書下著錄書名、撰譯年號、圈識、撰譯人、刻印處、本數、價值、識語。著錄格式方面幾乎沿用《西學書目表》，但多加註撰譯年號，盧靖說：

查譯書年號，可以別書之新舊，最關綱要。而此目錄未採入，因取譯書事略補之。有成書在後，為譯書事略未載者，則檢原書刊印之年以補之。……不可考者仍闕焉。譯書事略俱列西曆，中土人士觀之不便也，改用本朝正朔焉。³¹

由此可以發現梁啟超所編纂的《西學書目表》並未著錄有年代，年代實為盧靖所增訂。同時盧靖在補序中說道：「間為梁君未加圈識，其書為鄙人以讀者，亦妄補於目下。」盧靖也對梁啟超未曾看過的書加以了圈識。另一方面盧靖不只在著

²⁹ 同註 24。

³⁰ 盧靖編，《增訂西學書目表》補序。

³¹ 同上註。

錄格式上有所更動，也增補了梁啟超所少收的譯書：「表刻成後，黃君選卿為書院購來新書甚多，間為表所未載擇其切實有用者，當增其目於後云。³²」由於盧靖並未加以註明何書為其所增補，未能考證。

胡兆鸞編纂的《西書考》又名《西學通考》，書目共分爲「格致總」、「算學」、「重學」、「電學」、「化學」、「聲學」、「光學」、「汽學」、「天學」、「地學」、「全體學」、「動植物學」、「醫學」、「圖學」、「西文」、「叢書」、「史志」、「報章」、「學制」、「政治」、「法律」、「農政」、「礦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遊記」、「議論」、「教書」共 30 類。³³由於本研究並未親見《西書考》，也無二次文獻可資查考，因此無法提出其著錄格式與詳細內容。

《中西普通書目表》先有光緒二十四年七月（1898）上海算學報館自刻本，同年九月又有杭州小學堂重刻本。由於這是一種當時知識份子應對科學之用的一綜合推薦書目，所以短短二月間再版發行，可見其書目暢銷的程度。《中西普通書目表》雖然收錄有中書、西書，但並非混合編目，採取的是 3 表分立的方法：「中學」、「西學」、「三才之學」。中學分爲「中學入門書」、「經學」、「史學」、「子學」、「文學」5 類。西學分「西學入門書」、「算學」、「重學」、「電學」、「化學」、「聲光學」、「汽機學」、「動植學」、「礦學」、「製造學」、「圖繪學」、「航海學」、「工程學」、「理財學」、「兵學」、「史學」、「公法學」、「律例學」、「外交學」、「言語學」、「教門學」、「寓言學」、「西方叢刻書」等 23 類，共收有二百五十餘種書。分類較《西學書目表》略多。書目中較爲介紹算書和我國算學家的著作，這應與黃慶澄精通算學，創辦《算學報》有關。至於「三才之學」，這是黃慶澄自己創造的分類法，他認爲學不分中西，「中西書綜讀之，往往以西說證中理，而得新悟。

³² 同註 30。

³³ 《中國古籍總目》西學書籍分類研究，李國慶。

網址：<http://www.cnindex.fudan.edu.cn/zgsy/2005n1/liguoqing.htm>，日期 2006/05/01。

³⁴」學術終意是說明天地人三者之關係，爲了倡明這種學術思想，他從中學和西學的書籍中精選了一些有關天（天文）、地（地理）、人（醫藥）的著作，分在此表中，雖然這種分類初看是過去類書的分類條目，囊括中西學術。但其實這正是黃慶澄的中西一體分類思想的具體實現。是搜尋中西書目混編途徑的嘗試。³⁵在類序方面，每表前有大序，每類目部分有小序，部分圖書有簡明提要。由於本研究並未親見，所以缺少其詳細的著錄格式。姚名達對此書目稱讚曰：

雖非藏書目錄，且淺之無甚精義，然混合新舊之目錄於一編者，固未之或先也。是後遂有以新書為「時務部」列於四部之後者。流風所扇，入民國後猶有若干公立型書館習用此種新舊分列之辦法。³⁶

《中西普通書目表》不同於其他譯書書目的特點，即在於統一收錄中西書籍，使得書目能更爲普遍推行於中國社會。而書目中依中西書個別編目分類，也能突顯中西學術之間的差異，這種中西分列的方法不僅是《中西普通書目表》首開先例，日後也影響到中國圖書館初始的分類系統。

晚清西學之名屢屢見諸報刊。但在戊戌變法後輿論界開始以「新學」之名代替西學。如林樂知將其編撰刊印的介紹西學之書名為《新學彙編》、李提摩太則有《七國新學備要》顯然均是以「新學」指西學。因此日後也出現以新學爲名的譯書書目，如分別由沈兆煒、通雅齋同人所編纂之《新學書目提要》同名書目。

《新學書目表》光緒二十九年（1903）由沈兆煒編纂。書目收書四百餘種，分爲「法制」、「歷史」、「輿地」、「文學」、「西學」、「西藝雜錄」、「小說」等 8 類。³⁷隨後通雅齋同人又編纂同名書目《新學書目提要》3 冊，共分爲 18 類。³⁸其類目中首度出現兩種學科之間交叉的類目，例如商業和地理學交叉，出現了「商業地理學類」；商業和歷史學交叉，出現「商業歷史學類」；

³⁴ 黃慶澄編，《中西普通書目表》自序。

³⁵ 潘猛補，「黃慶澄與中西普通書目表」，《圖書館研究與工作》3 期（1993）：頁 42。

³⁶ 同註 1，頁 150。

³⁷ 同註 1，頁 248。

³⁸ 袁彤，「西學書目簡介」。《圖書館工作與研究》6 期（1998）：頁 56。

商業學和法學交叉，出現「商法學類」，又如「農業化學」，「醫律學」等，頗為創新。³⁹由於本研究並未親見以上兩部書目，分類部分為參考前人論述，著錄格式則因無相關研究，故無法提出說明。

《科學書目提要初編》由王景沂編纂，約為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左右由天津北洋官報局刊印。作者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旅居天津時，就北洋官報局藏書編纂而成。著錄圖書三百餘種，書目分為「政治」、「文學」、「武備」、「格致」、「農業」、「工藝」、「商業」、「醫術」8科，下分48子目。每小類後標明收錄種數，每小類均加按語，概述本目所錄主要內容、學術價值。如「文學科地理學」之下：

近代學者研究大地島陸之廣狹、海岸線之長短、山之阻修、川河之交、寒熱帶之氣候，則知國於其地之通塞、文野、貧富……《世界地理》輯本，實成於吾國留學生，亦教科書是也。於中國風物俗尚加詳焉，意深哉。⁴⁰

著錄格式為每種書下著錄書名、撰譯者（加註國別）、版本、卷冊數、部分有提要。

《譯書提要》為光緒三十三年（1907）清大臣赴外國考察回來後編纂的書目，共收錄30本書。分別涉及日、俄、英、法、比利時5國圖書，內容包含有憲法、政治、財政、學制、司法等。書目並未分類。由於此書為提供清末新政資料參考，所以在著錄上相當簡單，僅著錄書名與提要，將重點放在每書提要上。提要篇幅頗多，甚為完備。如《日本歲計豫算制度考》共有960字。提要多先說明此書涉及學科領域的重要性，而後介紹此書大綱，最後說明外國採行此理論的現況。如《日本統計類表要論提要》：

僅案統計之學，始於西人，蓋深得周官遺意。日本於明治十五年，仿行

³⁹ 同上註。

⁴⁰ 王景沂編，《科學書目提要初編》。

統計，歲出一冊。……增進日本各校兒童學齡表，日本全國陸軍一覽表，日本海軍一覽表。……以山海貧弱之國，而數載戰勝，驟致盛強。其非綜覈名實之效哉。⁴¹

《譯書表》由王仁俊編纂，本研究並未親見，也缺乏相關論述或記載，僅梁子涵編《中國歷代書目總錄》有收錄此一書目。

（二）日譯西學傳入後所產生的譯書書目

康有為在甲午戰爭後中國慘敗的刺激下，認識到日本由於引進西學而致強的緣由。但是西學書籍需從西方譯入，既有文字上的難度，又需從數量頗多的西書中選擇，不如藉由轉口日本已經編譯的西學書籍，一來文字較為相通，二來是日本所編譯的自然是已經挑選過的重要圖書。於是他針對日譯西學書籍進行了整理，編為《日本書目志》藉由推廣日譯西書，達到宣傳日本維新變法的目的。據管學大臣孫家鼐於清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初三（1898年8月19日）的奏摺，康有為向光緒皇帝進呈的書籍中，《日本書目志》便與《日本變政考》一同上奏。⁴²

《日本書目志》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出版，收書 7725 種。⁴³分為「生理」、「理學」、「宗教」、「圖史」、「政治」、「法律」、「農業」、「工業」、「商業」、「教育」、「文學」、「文字語言」、「美術」、「小說」、「兵書」15 門。每門又分若干小類，如「商業」門下有「商業歷史」、「商業地理書」、「商業書」、「銀行書」、「貿易書」、「交通書」、「度量衡書」、「相場書」、「簿記書」9 小類，總共有 246 小類。前有自序，並於「農業」門前有農工商總序，8 個大類有類序，246 個小類共有 88 篇類序，類序多帶有明顯的政治論述，如康有為在「圖史」門下「日本史」即說到：「日本…正史

⁴¹ 未著編人，《譯書提要》。

⁴² 孟昭晉著，「康有為的書目實踐」，孟昭晉，《書目與書評》（石家莊市：河北教育，2004），頁 43。

⁴³ 沈國威，「康有為及其日本書目志」，*Journal of studies on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West* 五號（2003）：頁 56。

題裁尤未備，本無可采焉。維自維新以來，大變政俗，以成富強。⁴⁴」由此可見一斑。著錄格式為每種書下著錄書名、冊數、譯者、價目。如：

國家社會制 一冊 光吉元次郎譯 五角⁴⁵

光緒二十八年（1902），梁啟超繼《西學書目表》後在《新民叢報》上發表《東籍月旦》。「月旦」帶有評論之意，⁴⁶《東籍月旦》在著錄中含有提要，故梁啟超將此譯書書目名為《東籍月旦》。書目包含有日譯西書以及部分日人自著。但《東籍月旦》並未完成，只寫完第一篇「普通學」內的第一、二章（倫理學和歷史）。梁啟超在序言中：「東之有學，無一不從西來。」一般中國人學日語相對容易，因此通過日譯西書學習，是一個「急就之法⁴⁷」。說明了藉由日本轉口西學的原因。《東籍月旦》的編制計畫很龐大，其中第一篇「普通學」，計劃包括：「倫理學」、「外國語」、「歷史」、「地理」、「數學」、「博物」、「物理及化學」、「法制」、「經濟」等類目，這是根據日本現行中學校普通科目所列。同時為了滿足他對西學中政法之類書籍的需求，將焦點放在法治、經濟上。「倫理學」下未分類，「歷史」下分 3 類即「世界史」、「東洋史」、「日本史」，大類與小類下均有類序。書目著錄格式為每種書下著錄書名、著者、譯者、冊數、價錢。如：

修身原論 法國福靈著 河津祐之譯 一冊 定價六角二⁴⁸

書目中有詳細精要的提要，有時針對一書，有時數本並論，幾乎所著錄的書籍皆有提及。如其中「世界史」類，《萬國史綱》（元良永次郎、家永豐吉）與《西洋史綱》（箕作元八、峰岸米造）即同列一提要：

此兩書皆據歷史之事實，敘萬國文明之變遷，以明歷史發展之由來。…

⁴⁴ 康有為編，《日本書目志》。

⁴⁵ 同上註。

⁴⁶ 《後漢書》有「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⁴⁷ 梁啟超編，《東籍月旦》自序。

⁴⁸ 梁啟超編，《東籍月旦》。

元良家永之書，凡分三篇…誠簡要賅備之作也。…其作峰岸之書，上海某局有譯本，題作《歐羅巴通史》。⁴⁹

提要中包含有讀書法，告訴讀者譯書優劣，內容深淺，寫作特點及閱讀程序，以幫助讀者解決「某科當先，某科當後。欲學某科，必不可不先治某科。一科之中，某書宜先，某書宜後，某書為良，某書為劣。」的問題。因此《東籍月旦》比《西學書目表》更具有推荐性，對讀者的指引導讀更為具體。而在另一方面《東籍月旦》更側重於社會政治書籍的介紹，自然科學技術圖書相應地居次要地位。這自然是因應梁啟超變法維新、廣開民智的思想，他在《東籍月旦》中強調：「不知學問所以能救國，以其有精神也。苟無精神，則愈博學而心術愈以腐敗。⁵⁰」因而把倫理學書籍擺在第一位，次歷史、地理等書，與科學有關的僅預備收錄數學、博物、物理及化學三大類，都在在反應了此點。

（三）兼採東學與西學的東西學書目

隨著日譯西學的大量輸入，也由於《日本書目志》與《東籍月旦》僅針對日譯西學的書籍而編纂，並無法滿足當時社會對西學譯書的迫切需求，社會上出現將直接來自西方的譯書以及日譯西書收錄在一起的書目，如沈桐生《東西學書錄提要總序》、徐維則《東西學書錄》、顧燮光《譯書經眼錄》等。

《東西學書錄提要總序》為沈桐生編纂，於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由讀有書齋刊印，時間與《西學書目表》、《日本書目志》相近，應為第一本出現的東西學書目。共分為「天學」、「地學」、「地志學」、「學制」、「兵學」、「農學」、「工學」、「商學」、「法律學」、「交涉學」、「史學」、「算學」、「圖學」、「礦學」、「化學」、「電學」、「光學」、「聲學」、「重學」、「汽學」、「醫學」、「全體學」、「動物學」、「植物學」總共 24

⁴⁹ 同上註。

⁵⁰ 同註 47。

類。⁵¹由於本研究並未親見《東西學書錄提要總序》，也無二次文獻可資查考，因此無法提出其著錄格式。

光緒二十五年（1899）徐維則編《東西學書錄》，作者曾任江西候補知縣、北京大學國史編纂處編纂，為著名學者。《東西學書錄》後另附有兩個書目，一為《東西人舊譯著書》、《中國人輯著書》。《東西學書錄》分類仿《西學書目表》，但顛倒了《西學書目表》中學、政的次序。所收書共分為「史志」、「官志」、「法律」、「學制」、「兵制」、「農政」、「礦政」、「工藝」、「商務」、「船政」、「格致總」、「算學」、「重學」、「電學」、「化學」、「聲學」、「光學」、「氣學」、「天學」、「地學」、「全體學」、「動植物學」、「醫學」、「圖學」、「遊記」、「報章」、「議論」、「無可歸類之書」28 大類。而每一類下又有細分如「史志」類下：「先通史次編年次古史次專史次政記次戰記次帝王傳次臣民傳記⁵²」。在編排上，西學譯書、日譯西學書籍並列，並無區分。著錄格式為每種書下著錄書名、卷冊數、版本、撰人、譯人、提要。如：

植物學啟蒙一卷 西學啟蒙本一冊

（英）艾約瑟譯，書中皆言植物學公理，其體貼之精為他書所不及。後附植物學程課之式極可取法。⁵³

相較於其他譯書書目，《東西學書錄》的提要雖然每篇長短不一，但已盡量做到每書都有提要。

《增訂東西學書錄》由近代著名的金石學家顧燮光在《東西學書錄》的基礎上增補，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出版。顧燮光首先在分類上增加了「交涉」、「理學」、「幼學」、「宗教」；減少了「官志」；改「學制」為「學校」、「礦政」為「礦務」、「無可歸類之書」為「雜著」；原有「法律」加入

⁵¹ 同註 33。

⁵² 徐維則編，《東西學書錄》。

⁵³ 同上註。

政治，改名為「政治法律」。故分類為「史志」、「政治法律」、「學校」、「交涉」、「兵制」、「農政」、「礦務」、「工藝」、「商務」、「船政」、「格致總」、「算學」、「重學」、「電學」、「化學」、「聲學」、「光學」、「氣學」、「天學」、「地學」、「全體學」、「動植物學」、「醫學」、「圖學」、「理學」、「幼學」、「宗教」、「遊記」、「報章」、「議論」、「雜著」共 31 類。著錄格式與《東西學書錄》一致。但由於「又得新書數百種」所以顧燮光「亦有所補焉⁵⁴」，因此在所增補的書籍後，顧燮光都加註「顧補」以資確認，但有極少數書加註為「徐補」，如《化學工藝初集》，則應為徐維則所提出，由顧燮光實際增補。

另外顧燮光不僅編纂《增版東西學書錄》，也一併增補了《東西學書錄》後附的《東西人舊譯著書》、《中國人輯著書》。由於本研究並未親見《東西學書錄》此兩附目，因此只以經顧燮光所增補的版本來討論。

《東西人舊譯著書》附於《增版東西學書錄》後，此書目收錄較早由西人與日人所翻譯編著的西學書籍，雖未特別提出年代，但所收錄的西人均為耶穌會傳教士，因此應可推估為清中期前的翻譯書籍。書目並未分類，僅不收宗教書，「凡傳入中國者之言教之書不具列。⁵⁵」採取「以書類人」之法，其著錄格式為每種書下著錄著譯著（加註字號、國別）、書名、卷冊數、版本，少數有提要。如：

艾儒略字思及義大利國人

幾何法要四卷 新法算書本

即幾何原本。求作線面諸法，而較幾何原本為詳⁵⁶

《中國人輯著書》附於《增版東西學書錄》後，此書目收錄中國人所編輯彙編或著述的各式西學書籍。分類為「史志」、「政治法律」、「學校」、「交

⁵⁴ 徐維則編；顧燮光增補，《增版東西學書錄》，蔡元培序。

⁵⁵ 徐維則編；顧燮光增補，《增版東西學書錄》。

⁵⁶ 同上註。

涉」、「兵制」、「農政」、「礦務」、「工藝」、「商務」、「船政」、「格致總」、「算學」、「重學」、「電學」、「化學」、「光學」、「天學」、「地學」、「醫學」、「圖學」、「理學」、「幼學」、「遊記」、「報章」、「議論」、「雜著」共 26 類，其下未分小類。其分類依據《增版東西學書錄》，僅加以刪減。著錄格式為每種書下著錄書名、卷冊數、編著者、版本。如：

電學問答一卷 天津水雷局輯譯 原刻本 西學大成本 格致彙編本⁵⁷

光緒三十年（1904）顧燮光在《增訂東西學書錄》的基礎上發表《譯書經眼錄》。其自序云：「本書係繼徐君已慈東西學書錄而作。⁵⁸」收書 573 種。後另附有《本國人輯著書》，但內容與《東西學書錄》的《中國人輯著書》並不相同，收書 643 種。⁵⁹書目中共分為、「史志」、「法政」、「學校」、「交涉」、「兵制」、「農政」、「礦務」、「工藝」、「商務」、「船政」、「理化」、「象數」、「地學」、「全體學」、「博物學」、「衛生學」、「測繪」、「哲理」、「宗教」、「體操」、「遊記」、「報章」、「議論」、「雜著」、「小說」共 25 類。而每一類下如同《東西學書錄》又有細分如「學校」類下：「首學制次教育次教授次文學次幼學⁶⁰」。在編排上，西學譯書、日譯西學書籍並列，並無區分。著錄格式為每種書下著錄書名、卷冊數、版本、撰人、譯人、提要。如：

新式毛瑟快槍學一卷 浙江武備新書刊本 續富強新書本

北洋武備學堂原本，浙江武備學堂重譯。前書言明毛瑟槍之理，此乃專言打靶命中之法，操演新軍所宜急讀者也。⁶¹

由於繼《東西學書錄》而作，《譯書經眼錄》的提要也是較為完備。提要中不僅

⁵⁷ 同註 55。

⁵⁸ 顧燮光編，《譯書經眼錄》自序。

⁵⁹ 同註 10，頁 284。

⁶⁰ 顧燮光編，《譯書經眼錄》。

⁶¹ 同上註。

介紹本書，也多提及它書，以備互相查考。

《本國人輯著書》附於《譯書經眼錄》後，此書目如同《中國人輯著書》是收錄中國人所編輯彙編或著述的各式西學書籍。分類為「史志」、「政治法律」、「學校」、「交涉」、「兵制」、「農政」、「礦務」、「工藝」、「商務」、「理化」、「算學」、「天學」、「動植物學」、「方言」、「地學」、「生理學」、「圖畫學」、「哲理學」、「體文學」、「幼學」、「遊記」、「報章」、「通論」、「雜著」、「小說」共 25 類。原書目作 26 類，但因其「理化」、「算學」標為第十與第十二，故漏列第十一類。未分小類，分類上與《譯書經眼錄》頗有差異。其著錄格式為每種書下著錄書名、卷冊數、編著者、版本。如：

地文學一卷 北洋學校司編纂 北洋官報局排印本⁶²

三、機構出版目錄

除了前述所提以內容來區分的各式宗教、科學、綜合性質的譯書書目外，還有許多專門記載翻譯館、書局、學會譯書的出版目錄。但這類型的譯書書目因為出版目錄的形式，這些機構所出版書籍往往不限於譯書，以及缺乏完整的類名、款目、編排方式，大多不能歸類於譯書書目。而這類書目中，江南製造局多次編纂的譯書書目、《廣學會譯著新書總目》與《益智書會擬著各種書目錄》則是專門針對譯書所編纂，符合譯書書目的定義，著錄項目也較為完備齊全，同時這幾部書目代表著中國官方機構與西方教會組織所參與的翻譯出版成果，在譯書書目中有其特別的意義。

⁶² 同註 60。

（一）江南製造局譯書書目

江南製造局於清同治四年（1865）在上海創辦，同治六年（1867）設翻譯館。翻譯館是江南製造局的附設機構，其對江南製造局的重要性，由當時的兩江總督曾國藩在奏稿中說道：「蓋翻譯一事，係製造之根本。⁶³」便可見一斑。翻譯館聘請中西人士，採用口譯與筆述相配合的譯書方法，從事於翻譯西洋科學技術等書籍。同時，又設印書處，自同治十年（1871）起出版譯書到清代結束，前後翻譯出版譯書一百多種。⁶⁴在洋務運動期間，江南製造局翻譯館作為中國實質上唯一的專門譯書機構，其譯書的數量與品質，都為晚清的翹楚。

據王揚宗考據，江南製造局自開局以來所刊印的譯書書目，主要有以下五種：

1. 光緒六年（1880），翻譯館主要口譯者傅蘭雅所著《江南製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所附錄的書目表，總計收入已刊譯書 98 部，已譯成而未刊者 45 種，未譯全者 13 種，共計 156 種。發表於由傅蘭雅主編的《格致匯編》卷五至卷八。
2. 《江南機器製造總局書目》，為江南製造局刊行的售書目錄，前有光緒二十八年（1902）五月的識語，計收譯書 145 種，另列滬局翻刻書籍 23 種；
3. 光緒三十一年（1905）魏允恭編《江南製造局記》，卷二中的「圖書目」，收譯書 154 種，翻刻書 18 種，其他非譯書 3 種。
4. 宣統元年（1909）陳洙等編《江南製造局譯書提要》，計收譯書 150 種，翻刻書 10 種。
5. 《上海製造局譯印圖書目錄》，此目附於滬局刊行的《西藥大成藥品中

⁶³ 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編輯室編，《洋務運動》（四）（上海：上海人民，1961）：頁 79。

⁶⁴ 王揚宗，「江南製造局翻譯書目新考」，《中國科技史料》第 16 卷 2 期（1995）：頁 3。

西名目表》重印本和《英國定准軍藥書》初刊本等之後，約於宣統三年（1911）編成，計收入譯書 168 種，翻刻書 29 種。此目是江南製造局譯書較為完備的一個目錄。⁶⁵

以上五種書目雖然都是江南製造局人員所編，但據王揚宗考據都各有其問題，如《江南製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所附錄的書目表把一種譯書分為數種；《江南製造局記》圖書目《江南製造局譯書提要》都有失收和訛誤，《江南製造局記》圖書目於各書刊行年代尤多誤，譯者、原作者等項亦有錯列；《江南製造局譯書提要》著錄項目疏漏較多等。⁶⁶江南製造局這五部譯書書目，著錄格式相差不遠，以下針對每部書目作說明：

《江南製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實際分為三部書目，首先為所附錄的江南製造局書目表；其次為《益智書會擬著各種書目錄》，最後為《寓華西人自譯各書目錄》。後兩者於後介紹。

江南製造局書目表先將所收錄的圖書區分為「已刊成出售各書目錄」、「已譯成未刊各書目錄」、「尙未譯全各書目錄」，再分為「算學測量」、「氣機」、「化學」、「地理」、「地學」、「天文行船」、「博物學」、「醫學」、「工藝」、「水陸兵法」、「年代表新聞紙」、「造船」、「國史」、「交涉公法」、「零件」15 類。

在「已刊成出售各書目錄」部分，每種書下著錄書名、撰書人名、譯書人名、筆述人名、刊書年歲、每書本數、每書連史紙價錢，無提要。如：

化學鑑原 英國韋而司 傅蘭雅 徐壽 一千八百七十一年 四本 一千文⁶⁷

「已譯成未刊各書目錄」部分，每種書下僅著錄書名、譯書人名、筆述人名、約成本數，無提要。如：

代數總法 傅蘭雅 華蘅芳 四本⁶⁸

⁶⁵ 同上註，頁 3-4。

⁶⁶ 同註 64，頁 4。

⁶⁷ 傅蘭雅編，《江南製造局翻譯西書事略》。

「尚未譯全各書目錄」部分，每種書僅著錄書名、譯書人名、筆述人名、原有本數，已譯本數，無提要。如：

測量儀器說 金楷理 趙元益 八本 四本⁶⁹

《江南製造局記》圖書目中並未分類。較為特別的是採取了表格的著錄格式，每種書下著錄書名、本數、卷數、附圖、原著、翻譯、筆述、校對、出版、價值，著錄項目相當齊全，但並非每種書籍都詳細著錄。格式如下：⁷⁰

書名	本數	卷數	圖	原著	繙譯	筆述	校對	出版	價值
行軍測繪	二	十	二百五 十五	英連提	傅蘭雅	趙元益	沈善蒸	同治十 三年	六角
東方時局論略	一	一		高麗鄧鏗					

《江南製造局譯書提要》則將書籍分爲「史志」、「政治」、「交涉」、「兵制」、「兵學」、「船政」、「學務」、「工程」、「農學」、「礦學」、「工藝」、「商學」、「格致」、「算學」、「電學」、「化學」、「聲學」、「光學」、「天學」、「地學」、「醫學」、「圖學」、「補遺」、「附刻」共 24 類。但其中「補遺」與「附刻」不同於前 22 類是以學科內容區分，而是以出版方式。每種書下著錄作者、譯者、版本、冊數、價錢，部分附有提要性的文字。如：

代數術 英國華理司著 傅蘭雅譯 華蘅芳筆述 六本 編輯既精，譯筆尤善，為算學家必讀之書。⁷¹

《上海製造局譯印圖書目錄》將圖書分爲：「史志」、「政治」、「交涉」、「兵制」、「兵學」、「船」、「學務」、「工程」、「農學」、「礦學」、「工藝」、「商學」、「格致」、「算學」、「電學」、「化學」、「聲

⁶⁸ 同上註。

⁶⁹ 同註 67。

⁷⁰ 魏允恭編，《江南製造局記》圖書目。

⁷¹ 陳洙編，《江南製造局譯書提要》。

學」、「光學」、「天學」、「地學」、「醫學」、「圖學」、「地理」、「補遺」共 24 類。在分類上與《江南製造局譯書提要》幾乎一致，僅增加「地理」，刪除「附刻」。每種書下著錄書名、卷數、冊數、價錢，並無提要。並同於《江南製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於價格處標明書籍用紙種類及價錢差異。另外有部分圖書加註「附圖」、「石印」等簡單相關書籍事項。著錄格式如：

開煤要法十二卷 二本 連史 四角五分

賽連 三角

繪地法原一卷 附圖 附表 一本 連史 二角

賽連 一角五分⁷²

至於《江南機器製造總局書目》本研究未親見，也缺乏前人對此書目的討論，所以無法確認其分類方式與著錄格式。

另外，如前章所述，晚清洋務運動時期除了設置有江南製造局、同文館等主要與西方接觸的機構外，另一方面，晚清官書局的也逐漸由刊刻經史讀本之類而設置轉向為譯刻西學書籍而設置。所以散佈各地的官書局同樣也編纂有各自翻譯出版的出版目錄。如《清史稿·藝文志拾遺》收錄有《福建求治局採錄西學書目》，但現僅存其目，無從查考。但從書目名稱推斷，應可屬於譯書書目。其他如來新夏主編《清代目錄提要》中也記載有《直隸官書局遠售各省官刻書籍總目》、《直隸津局遠售各省書籍總目》、《山東全省官書局書目》等官書局書目，然而其中雖應收有西學譯書，因並非以譯書為主的書目，因此本研究並不加以討論。

（二）《廣學會譯著新書總目》

廣學會（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for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⁷² 上海製造局編，《上海製造局譯印圖書目錄》。

the Chinese)於清光緒十三年(1887)由新教傳教士成立於上海，由光緒十年(1884)所成立的同文書會(The Chinese Book and Tract Society)改組而成。光緒十八年(1892)更名為廣學會。光緒三十二年(1906)英文名稱改為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廣學會的宗旨是編譯出版書刊，介紹西方文化。《同文書會發起書》寫道「本會的目的歸納起來可有兩條，一為供應比較高檔的書籍給中國更有才智的階層閱讀，二為供應附有彩色圖片的書籍給中國人家庭閱讀。⁷³」《廣學會譯著新書總目》卷首也說道：

本會夙以振興新學，開通民智為己任。創辦以來譯印各書千百餘種，此乃泰西名士奉為寶笈，人人必讀之要書也，擇其尤佳者，詳列於後。⁷⁴

因此廣學會在翻譯出版方面，涉及的西學譯書較為廣泛。

《廣學會譯著新書總目》書目中共分為「天文」、「地理」、「史類」、「傳記」、「醫學」、「通考」、「政學」、「理財」、「律法」、「格致」、「電學」、「算學」、「植物學」、「蒙學」、「小說」、「雜著」、「圖畫」、「道學」、「質學」、「性理」、「礦物學」、「化學」共計 22 個並行的一級類目。但在分類上卻有些疏漏，如卷首有 3 份廣學會出版的報紙，但未加以分類。同時書中有部分圖畫，並未統一歸入「圖畫」類，而是依內容各歸其類，如《五大洲各國統屬全圖》就收在「地理」類。而另外如《熱學須知》、《光學須知》收於「電學」類；而《聲學揭要》、《聲學須知》兩本同學科的書，前者收於「礦物學」、後者收於「化學」，則是相當明顯的錯漏，主要可能是因為書籍量少，所以並未特別設置相關類目，而是分入相近類目，也不排除是編纂時的疏忽。

由於廣學會相當注重譯書的流通，⁷⁵所以在價格與冊數上記載的相當詳細，書中如有附圖，也多加記錄。書目中完整的著錄體例為每種書下著錄書名、著譯

⁷³ 轉引自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市：人民，1994），頁 553。

⁷⁴ 廣學會編，《廣學會譯著新書總目》。

⁷⁵ 同註 73，頁 561。

者、冊數、提要、價格。如：

泰西新史攬要 英國李提摩太先生著上海蔡爾康筆述 泰西諸大國歷來改變之情形 八冊 價洋一元五角 縮本價洋八角⁷⁶

像《泰西新史攬要》這種相當風行的譯書，還特別提到有出版縮印本。但書目的著錄相當不完全、有的缺少著譯者、許多書籍沒有提要，最簡略的僅記書名、冊數、價格。如：

西醫內科全書 六本 價洋二元⁷⁷

這顯然與其為出版書目錄有相當大的關係，目的在於推廣、銷售譯書，而非前節所提綜合型譯書書目是以傳播西學，廣開民智為己任。這也反應在書目中並未編有闡述學術源流的類序，以及著錄不完全便可瞭解。

（三）《益智書會擬著各種書目錄》與《寓華西人自譯各書目錄》

清光緒三年（1877）傅蘭雅倡導在上海成立益智書會（The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光緒十六年（1890）機構改組，英文名改為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中文名仍為益智書會。光緒二十八年（1902）改稱中國學塾會，光緒三十一年（1905）改為中國教育會，民國五年（1916）再改為中國基督教教育會。益智書會翻譯出版的書籍，主要是作為各學科的教學之用，所編纂教科書在晚清教育領域有廣泛的影響。

《益智書會擬著各種書目錄》附刊於《江南製造局譯書事略》後，共收書42種。由於為益智書會擬編譯而非實際發行的書目，因此書目並未分類，著錄格式也相當簡單，每種書下僅著錄書名、著譯者所居地點、著譯者。如：

富國策 北京 丁韋良著⁷⁸

⁷⁶ 同註 74。

⁷⁷ 同註 74。

⁷⁸ 同註 67。

《寓華西人自譯各書目錄》與《益智書會擬著各種書目錄》同附刊於《江南製造局譯書事略》後。而這些寓華西人也多在各式與西學相關的推廣機構所服務，如丁韞良、合信、嘉約翰等人，所以一併於此處討論。《寓華西人自譯各書目錄》收書 62 種，並未加以分類。每種書下僅著錄書名、著譯者、價錢。如：

重學 艾約瑟 每部價洋一元⁷⁹

由這些機構所編纂刊印的出版目錄，我們可以發現書目大多採取的是一級結構的分類。一來是收錄書籍來自同一機構，自然受到機構譯書政策的影響，所涉及的學科門類應較綜合型書目來的單純或集中於固定學科。二來是書目主要是爲了推廣、介紹所出版的書籍，並不如綜合型書目藉由對西學的深入分類，達到辨考西學源流以及傳達變法思想的目的，這也可以從機構出版目錄並不如綜合型書目多編有類序得到證明。而在著錄方面，機構出版目錄也較爲簡單，少部分如《江南製造局記》圖書目、《江南製造局譯書提要》雖是具備有相當豐富的著錄格式，但絕大多數書籍都並非完整著錄，往往僅著錄書名、譯者、本數、價錢，同時，多未編有提要，如有提要，也僅是簡單提及。如《江南製造局譯書提要》中《代數術》：「編輯既精，譯筆尤善，為算學家必讀之書。⁸⁰」《廣學會譯著新書總目》中《泰西新史攬要》：「泰西諸大國歷來改變之情形。⁸¹」或僅註明出版相關事項，如是否附圖而已。這些機構譯書書目的狀況毋寧說是缺點，倒不如說是正好反應了機構譯書書目爲出版目錄的特性。

第二節 譯書書目的編纂思想

章學誠在《校讎通義》中說：

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辯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

⁷⁹ 同註 67。

⁸⁰ 同註 71。

⁸¹ 同註 74。

明於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後世部次甲乙，記錄經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闡大義，條別學術異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於墳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⁸²

又說：

古人著錄，不徒為甲乙部次計。如徒為甲乙部次計，則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業、閱年二紀、僅乃卒業乎？蓋部次條別，申明大道，敘列九流百世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⁸³

因為中國古典目錄學辨考學術源流的這種觀念，使得每個時代知識門類的發展，學術思想的變遷，社會觀念的變化，社會經濟政治的變動等因素都會反映到書目中。

明清時期譯書書目是圍繞傳播西學這一主要目的，適應當時社會、政治、文化發展的需要而編纂的。這些書目的編纂與當時時代、社會的發展變遷緊密地聯繫著，只不過有的書目單純是從傳播西學這一目的出發，但有的卻是在傳播西學的表像下蘊含著更深的意念。

一、介紹西學、推廣譯書

韓霖在《道學家傳》自序中說道：

有同學友問於余曰「天主教原從外國遠方傳來，諸公中華明理之士輒信從之，何說耶？……凡人未嘗其殼，弗識其味，未究其書，罔諳其理，試以虛心參考本教之編籍，其中道味奚若則自分明了徹。」⁸⁴

從這段大力讚揚天主教的內容中，我們可以發現宗教譯書書目的編纂目的，都是

⁸² 章學誠，《校讎通義》序。

⁸³ 章學誠，「互著第三」，《校讎通義》，卷一。

⁸⁴ 韓霖、張賡，「聖教信證自序」，徐宗澤著，《明清間耶穌會士提要》（上海市：上海書店，2006），頁173。

爲了介紹這些西方傳教士，藉以傳達宗教思想。西方科學知識只是學術傳教下的輔助工具，因此這些宗教譯書書目所採取的都是「以書類人」的體例。之後如《泰西著述考》自序：「爰為釐次其姓氏，詳述其著作，以臚於篇用。為談海外掌故者廣厥見聞云。⁸⁵」依然如此。後來的《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也都抱持著相同的編纂思想。

而諸如《廣學會譯著新書總目》、江南製造局譯書書目這類機構出版目錄並無類序，在著錄上多無提要，雖然著錄格式齊全，但著錄並不完全。這顯然也反應了機構出版目錄的編纂目的在於推廣、銷售本身機構所譯書籍，所以在體例上較爲不注重。而如傅蘭雅在《江南製造局譯書事略》的序中談到了他編制幾個附屬書目即《益智書會擬著各書目錄》、《寓華西人自譯各書目錄的》的目的時也說：

江南製造局內設翻譯館，業十餘年，遠近諸君幾若共聞；然其中本末裨益，尚有未詳知者，屢承顧問；且常有西人書緘頻寄……訪求所譯西書之目……另有局外所譯諸書，亦登其目錄，以便西人有所檢閱，不必另他處搜求。⁸⁶

在第四章「論譯書各數目與目錄」傅氏又談到了編纂目的：

蓋屢有西人視中國考究西學甚為重要，故頻問訊顛末。又有西士欲自譯書，因未深悉局內已成諸書，恐有重複。是故撰成此冊，以便諸士有所核察。⁸⁷

由此可知傅蘭雅編制這幾個附目的目的是爲了讓時人瞭解譯書情況，便於有志譯書者如西方傳教士等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從事翻譯，也僅是爲了介紹西學。

⁸⁵ 王韜編，《泰西著述考》自序。

⁸⁶ 同註 67。

⁸⁷ 同註 67。

二、經世致用下的援引西學

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中說道：「清朝一代學者對於曆算學都有興味，而且最喜歡談經世致用之學，大概受到利、徐諸人的影響不少。⁸⁸」在晚清著名的書目著作《書目答問》之中，子目之中儒家類以「議論經濟」、「理學」、「考訂」分。「議論經濟」的增設無疑是「經世致用」觀念在中國目錄學上的反應，它表明編纂者企圖從儒家自身所包含的經世致用內容以應對世局的努力。清代人們正是在經世思潮的引導下，逐漸將目光移向西學，促進了西學譯書的引入。

清代著名的經世致用文集《皇朝經世文三編》例言中，編輯者說到「假使欲圖富強，非師泰西治法，不能挽回。⁸⁹」故將當時輸入的西學，也納入傳統經世之學範圍。但是正如同張之洞所說：「新舊兼學，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舊學為體，新學為用。⁹⁰」以及馮桂芬所說的：「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根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⁹¹」我們可以發現在晚清經世致用思潮下的援引西學是必須立基於與洋務運動核心相同的「中體西用論」思想。

「中體西用論」的提出一方面突出了中學的主導地位，另一方面承認西學的輔助作用。他們一方面堅持以中學為核心的基本原則，另一方面強調西學在富國強兵的過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主張在維護中國原有的政治秩序和倫理信念的前提下，部分地吸收西學中有用的內容。如同河北書院設有「經義、治事」兩齋，「經義齋」課經學、理學、詞章、經制以及中國古代算學，「治事齋」則分

⁸⁸ 梁啟超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華巨，1994），頁9。

⁸⁹ 左玉河，「從經世之學到分科立學—近代早期的學術分科觀念及分科方案」，《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第17卷1期（2001）：頁30。

⁹⁰ 張之洞，「勸學篇·外篇·設學第三」，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市：文海，1966），482輯，頁14538-14539。

⁹¹ 馮桂芬，「采西學議」，宋原放主編；汪家熔輯注，《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武漢市：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頁15。

課西洋算學、方言、格致、律法、制造、商務、水陸兵法、輿地、測繪等。⁹²其中將西學歸納於「治事」之下，便可以得知在「中體西用論」下，對西學的吸收並未突破傳統以儒家經義為中心的整體架構，西學不過是過去的財賦、水利、吏治、典章、兵政、防務、荒政等經世之學的進一步擴充。

因此如梁兆鏗於光緒年間所編纂的《天文算法考》與隨後馮徵所編《算學考》、劉鐸《若水齋古今算學書錄》等天文算法譯書書目都明顯受到「中體西用論」的影響，不僅將翻譯的西方天文曆算之書與中國社會傳統天文算法之書合併收錄，在分類體系上也特別突顯中國天文算法之處。

梁兆鏗於光緒年間所編纂的《天文算法考》卷一為「敕撰、經籍」，卷二為「天象」，卷三為「儀象」，卷四為「曆術」，卷七為「天元、四元、幾何、借根、三角、代數」，卷八為「總義、叢書」。其中特別突出「敕撰、經籍」將其歸於卷首，也並未根據書籍內容予以歸類到其他以內容區分的類目中。而如《若水齋古今算學書錄》特別為「經史」分類，劉鐸自序曰：

案是書共分經、史、象數、樂律、兵法、格致、天文七門。後附各叢書並子目蒐羅繁富，足資考證。⁹³

《算學考》自序曰：

數居六藝之一，故明史藝文志以算數入小學，誠以象數之學，為儒者所當務也。⁹⁴

特別強調「象數之學」為儒者所當務。由以上的例子，便可見「中體西用論」在譯書書目中的反應。

而如黃慶澄編纂《中西普通書目表》採取的三表分立方法：「中學」、「西學」、「三才之學」，其中的「三才之學」，是黃慶澄從中學和西學的書籍中精

⁹² 程獻、談火生「分科設學與清末民初中國的學術轉型」，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5 卷 2 期（2002），頁 85。

⁹³ 同註 11。

⁹⁴ 同註 13。

選了一些有關天（天文）、地（地理）、人（醫藥）的著作，分在此表中，囊括中西學術。黃慶澄認為「中西書綜讀之，往往以西說證中理，而得新悟。⁹⁵」由「以西說證中理」，可以瞭解黃慶澄在編纂此表時所欲強調的方向。而諸如黃慶澄在收錄於「中學」其中的《管子》一書提要中注明「確有實用，其議論時與泰西新政暗合者。『禮儀生於富足』一語，尤足為今日西方強盛之佐證。⁹⁶」也可反應黃慶澄在編纂《中西普通書目表》所受到的影響。

最後必須特別指出來的是雖然江南製造局是洋務運動下的產物，翻譯館所編譯的書籍也是受到政府大員「中體西用論」的思想集中於自然科學，尤其是應用科學的部分。但是江南製造局所編纂的譯書書目實際上並未受到「中體西用論」的影響。我們從《江南製造局譯書事略》書目表與《江南製造局譯書提要》兩者的分類上可以看出雖然以自然科學類目為多，但實是因為所收錄的書籍以自然科學為主，在分類編排與著錄體例上並不如前述所提數本譯書書目上明顯的重視中國經籍，強調體用之分。僅僅是為了推廣銷售江南製造局所編譯之書籍，在編纂思想上較為單純。

三、維新變法與新民之道

由於甲午之戰作為洋務運動成果的北洋水師戰敗，不單代表著洋務運動的失敗，更意味著在「中體西用論」框架下，數十年經由西學擴充傳統知識的失敗。當時中國先進的知識份子都發現了與西方的差距並不能只從改善器械工具入手。正是這種氛圍之下，從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起，社會上宣傳變法圖強的思想及全面學習西方科學技術、政治制度的主張。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開始了對西學譯書的編目、評價、推薦。而在維新變法思潮的引領下，如前章所述不單西學譯書輸入的來源轉向於日本，譯書的內容也開始著重於社會科學方面，如

⁹⁵ 同註 34。

⁹⁶ 黃慶澄編，《中西普通書目表》。

政治、法治及各式社會制度等書。而這種趨勢不僅反應在維新時期譯書書目所收錄的書籍上，也連帶影響到譯書書目的編纂思維。

書目本身具有控制文獻、辨章學術的功能，用它來推薦文獻、傳播思想、學術，可說是相當適切的。因此，維新派人士爲了達到宣揚變法、開啓民智的目的是相當重視書目的應用。如梁啓超先後編纂《西書提要》、《西學書目表》、《西學書目表劄記》、《讀西學書法》，企圖構成一個完整推薦西學的功能體系，在《西學書目表》序例中，梁啓超開章明義的說道：「國家欲自強，以多譯西書為本，學護欲自立，以多讀西書為功。」不僅說明各類目乃至一些具體書籍的學術源流、優劣短長。而且「略言各書之長短，及某書宜先讀，某書宜緩讀。⁹⁷」指導讀者具體的閱讀活動，發揮傳播西學思想的效果。而康有爲在《日本書目志》序指出：

泰西之強，不在軍兵炮械之末，而在其上人之學、新法之書。凡一名一物，莫不有一學。皆以專門之士為之，此其所以開闢地球、橫絕宇內也……譯書以開四萬萬人之智，以為百度之本、自強之謀。⁹⁸

其後梁啓超在《讀日本書目志後》激動地進言：

願我公卿讀政治、憲法、行政學之書習三條氏之政議，究以返觀，發憤以改政，以保我四萬萬神明之胄；願我君後讀明治之維新書，借觀於寇雠，而諫厲其新政，以保我萬萬里之疆域……今日中國欲為自強第一策，當以譯書為第一義。⁹⁹

從他們的文中散發出濃厚的維新變法氣息，直接大膽的脫離傳統之議論，這與前述所提到的仍依據「中體西用論」思想而編纂的譯書書目已經有著相當大的差距。

而如康有爲在《日本書目志》的立類時，明顯是依據了自己的政治見解和當

⁹⁷ 同註 21。

⁹⁸ 康有爲編，《日本書目志》自序。

⁹⁹ 轉引自閔定慶，「維新派目錄學的文化內蘊」，《學術研究》3期（1994）：頁 85。

時政治的需要。他認為「天之道曰陰與陽，人之道曰生與殺，教化治亂之進退消長，視生殺之分數多寡。」他還認為「兵者殺道，亂世之極也。」所以把「兵書」門列為最後大類；而「醫者生道，太平之極也」、「大治在於醫¹⁰⁰」故以「生理」門冠諸篇焉，列為第一大類，雖然從科學、哲學上來說有幼稚之處，但表現了康有為強烈的救國之心。他以醫道的提倡象徵中國是一個急待救療的病夫，而療教之道在於日本成功引進的西學。而在「兵書」門類序中，他宣揚了軍力的強大要靠「變舊俗，開新學。¹⁰¹」人民的素質提高了，才有強大的國防力量。

而如《西學書目表》序例說：

西學各書，分類最難，凡一切政皆出於學…西學之屬，先虛而後學…故勸學、重學為首，電化聲光汽等次之，天地人（謂全體學）物（謂動植物學）等次之，醫學、圖學全屬人事，故居末焉。西政之屬，以通知四國為第一義，故史志居首；官制、學校，政所自出，故次之；法律所以治天下，故次之；能富而後強，故農、礦、工、商次之，而兵居末焉。

102

如果把這一系列與新政所倡的改官制、辦新學堂、訂憲法、立議會、築路開礦、發展農工商等內容比較，不難發現梁啟超藉由《西學書目表》所構擬分類體系的實質意義。同時在《西學書目表》中《列國變通興盛記》一書，梁啟超認為其中：「記俄日兩章頗佳」；在評論《泰西新史覽要》一書，「足以取法，垂鑒」；強調《日本國志》「其志深，其旨遠¹⁰³」，不僅在《西學書目表》中列為必讀之書，並開入湖南時務學堂的課程表和參考書目之中去。從此可看出梁啟超編纂的用意所在。

¹⁰⁰ 康有為編，《日本書目志》生理學類序。

¹⁰¹ 康有為編，《日本書目志》兵學類序。

¹⁰² 同註 21

¹⁰³ 同註 21

而從另一方面來看，雖然康有為在《日本書目志》的許多類序都引經據典，說明立目理由，如「國家政治學」類序云：

政治之學最美者，莫如吾六經也，當考泰西所以強者，皆暗合吾經義者。泰西自強之本，在教民、養民、保民、通民氣，同民樂，此《春秋》重人，孟子所謂與民同欲，樂民樂，憂民憂，保民而王也。¹⁰⁴

梁啟超在《讀西學書法》中也說：「舍西學而言中學者，其中學必為無用，舍中學而言西學者，其西學必為無本，皆不足以治天下。¹⁰⁵」表面看來，這似乎與「中體西用論」有異曲同工之處。但在《西學書目表》序例中，梁啟超卻又利用相當篇幅強調中國古聖先賢重視外國書之事：

大哉，聖人之道！孔子適周，求得二十國寶書。聖祖仁皇帝禦纂《數理精蘊》，潤色西算，舟諸卷首。高祖純皇帝欽定《四庫總目》，凡譯出西書，悉予著錄。先聖後聖，其事不同，其葵若一。¹⁰⁶

這種略帶矛盾的論點正如同閔定慶所說的：

他們內心演算的政治、文化、學術意圖，不妨以《清代學術概論》極力渲染的「借經術以文飾其政論」作為夫子自道來揭破。他們目錄學著作通常開篇就談「先聖後聖」重視西學、西書的「盛事」，說到底只是當作大編西學書、傳播西學的堂而皇之的「理論依據」，所以，在他們自創的書目分類法中，往往對中國傳統學術存而小論。葉德輝《讀西學書目表後》斥其「影附西書潛移聖教」，正從反面深刻道出了維新派目錄學的目的所在。¹⁰⁷

更加使人瞭解這些譯書書目編纂的實際用意。

¹⁰⁴ 康有為編，《日本書目志》國家政治學類序。

¹⁰⁵ 梁啟超編，「讀西學書法」，《西學書目表》。

¹⁰⁶ 同註 21

¹⁰⁷ 同註 99。

第三節 譯書書目的著錄體例

中國古典目錄學在發展的過程中，一直是以「致用」為努力的方向，歷代目錄學家最看重的就是書目所能發揮的作用。但必須注意的是，中國古典目錄學期望發揮之作用，並非是現代目錄學強調的使使用者方便地取得與共用圖書文獻，而是辨考學術源流。如宋代的鄭樵認為書目的功用就是如何使「學術自明」；清代的章學誠看來，就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年代相距甚遠的兩位目錄學大家，都抱持著同樣的態度。這也就使得歷代的目錄學家將目錄學的重點放在了對整體圖書文獻的分析整理上而忽略了具體的文獻需求。換而言之他們關心的是詳明類例或是編撰提要、類序，企圖從中反映個人的學術理念，成一家之言。而非關注如何使使用者方便地獲取所需圖書。也因為目錄學家將書目作為治學的工具，故傾向於實際的圖書文獻整理，而少有從理論上進行總結研究。所以如果要對書目有深入的認識，勢必要經由分析書目的編纂與著錄體例，才能對書目有所體認。本節即循此脈絡，從譯書書目的編纂與著錄體例來加以探討。

一、繼承：類序與提要的運用

漢代劉向父子等人在整理圖書文獻的過程中採用了校讎、分類、編制類序、編制敘錄等方法。類序主要是在各大小類下用一段文字說明該類學術發展之源流，如隋許善心之《七林》「各為總敘，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別其類例焉。¹⁰⁸」即篇首有總序，而於各類也有小序，說明作者立類意圖，以相區別。至《四庫全書總目》，則「四部之首各冠以總序，撮述其源流正變，以挈綱領。四十三類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詳述其分並改隸，以析條目。如其義有未盡，例有未該，則或於子目之末，或於本條之下，附注案語，以明通變之由。

¹⁰⁸ 《隋書》，卷五八《許善心傳》。

¹⁰⁹」都說明了類序的功用與編輯方法。至於敘錄又稱解題或提要（本研究統以提要稱之），是於每書下編寫相關文字，用以考作者生平事蹟、闡明圖書內容、評定圖書之得失價值，幫助使用者初步認識該書的內容。

劉紀澤在論及中國歷代書目體例時提出：

目錄之書，蓋有三類：一、部類之後有小序，書名之下有解題者。二、有小序而無解題者。三、小序解題並無，只著書名者。昔人論目錄之學，於此三類，各有論見，而于編目之宗趣，必求足以考見學術之源流，分類之本末，固殊途同歸也。¹¹⁰

我們可以發現由漢代劉向父子《七略》所開創，有類序、提要或只有類序、只有提要的書目一直都是中國古典目書目發展中的主流，這個書目典型包括幾個組成部分：

- 一、有一個分類體系
- 二、有一個總說明
- 三、每類之下有小序，說明各類的學術源流
- 四、每書都撰有提要（解題或敘錄）

劉紀澤又說：

綜以上諸家之說觀之，則其要義，可得而言。屬於第一類者，在論其旨歸，辨其訛謬，述作者之意。屬於第二類者，在窮源至委，竟其流別。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屬於第三類者，在類例分明，使百家九流，各有條理，並究其本末，以見學術之源流沿襲。以此三者互相比較，立論之宗旨，無不吻合，體制雖異，功用則同，蓋吾國從來之目錄學，其意義皆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¹¹¹

¹⁰⁹ 《四庫全書總目·凡例》。

¹¹⁰ 劉紀澤，「目錄學概論」，彭斐章等編，《目錄學資料匯編》（武漢市：武漢大學出版社，1986），頁140。

¹¹¹ 同上註。

由此我們便可知，中國古典書目是以講求類例、類序、提要用以辨考學術源流派別，希望以書目發揮如同學術史的功用。然而「劉歆作七略，王儉作七志，逾二紀而方就。¹¹²」這種累積豐富的圖書文獻以及編寫詳盡內容的書目是需要花費學者多年之精力而編纂，「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¹¹³」所以在六朝以後，便有著相對簡略，省略小序或提要的書目產生。

譯書書目因為收錄的西學譯書上內容大異於中國傳統學術領域，書目編纂者為了達到推廣西學的目的，希望利用中國古典書目這種以類例、類序、提要辨考學術源流派別的特性。正如同傅蘭雅說道：「仍舊例以賅新籍。¹¹⁴」因此有相當多的譯書書目在體例上仍延續著中國古典書目的精神。

（一）類序

類序包括各大類（略、部）之序和小類（種、類）之序兩種形式。學者有稱大類之序為「大序」或「總序」的，稱小類之序為「小序」。如《四庫全書總目》凡例云：「四部之首，各冠以總序，撮述其源流正變，以挈綱領。四十三類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詳述其分開改隸，以析條目。¹¹⁵」也有不區別大類之序和小類之序而合稱為小序的。所以其定義相當含混不清，因此本研究於此統稱為「類序」。

類序之體起始於《七略》中的《輯略》。《漢書·藝文志》散《輯略》之文，分載各略、各種（家）之後成為類序。自此以後，循劉、班之例而撰類序的，有南朝宋王儉《七志》、隋許善心《七林》、唐魏徵《隋書·經籍志》、毋暉《古今書錄》、宋代《崇文總目》及清《四庫全書總目》等。但由於《舊唐書·經籍志》據《古今書錄》為書，但記篇目，不取小序。因此日後也多有沿用

¹¹² 毋暉，《古今書錄》序。

¹¹³ 同註 82。

¹¹⁴ 同註 67。

¹¹⁵ 《四庫全書總目·凡例》。

者如《新唐書志》、《宋史》、《明史》藝文志、等均沿此體制，不撰類序。

類序是古代目錄書中介紹某一部類圖書的學術流變、特點、得失的說明性文字，具有很重要的學術價值。由於西學傳入中國，這就需要利用書目中類序的發揮，來對西學加以闡述，使讀者能更加瞭解西學梗概。譯書書目很好地利用此點，除了對學術的見解，有時還會將自己的政治見解滲入其中。

康有為《日本書目志》自序明確說道：「購求日本書至多，為撰提要，欲吾人共通之，因《漢志》之例，撮其精要、剪其無用、先著簡明之日，以待憂國者求焉。¹¹⁶」《日本書目志》因襲《漢志》體例，無提要而重類序。在每一門類書後以精鍊的文字敘述這門學術在西方或日本的源流、要點、優點及可資借鑒之處，還在一些類目下引經據典說明立類依據。其「自序」及「農工商總序」可視為全書目的總序，15 個大類（門）有 8 篇大序，即二分之一大類有類序。246 個小類共有 88 篇小序，即三分之一的小類有類序。康有為共為《日本書目志》寫作了約三萬三千字的類序。¹¹⁷在序中，康有為不僅闡述學術源流，更大肆宣揚政治主張。如「圖史」門中的「日本史」類序，就提到：

吾中國言變法數十年，而每變一法，弊端百出，僅為守舊者藉口攻擊之地。而國未嘗少收其效。…日本與吾同在東方，同文、同俗、同教。吾藉日本為經途、為探路，而後安步從之…其速至而立校雖數倍於日本可也…今考日本之史，若《日本文明史》…皆變政之際存焉。吾既別為《日本改制考》，以發明其故，而著其近世史之用，以告吾開明之士焉。¹¹⁸

梁啟超嘗試初編的譯書書目為《西書提要》，雖未完成，但梁啟超曾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時務報上發表《西書提要》農學總敘，此可以推斷《西書提

¹¹⁶ 同註 98。

¹¹⁷ 孟昭晉著，「康有為的書目實踐」，孟昭晉，《書目與書評》（石家莊市：河北教育，2004），頁 44。

¹¹⁸ 同註 44

要》如成書，應具備有類序。至於梁啟超隨後發表的《西學書目表》前有自序，略述西學源流，也可視為類序。而 28 小類部分有類序，如「電學」類序：

電學諸書皆舊法，西人半費不用，然譯出只此，欲學者宜求諸西文。¹¹⁹
但篇幅上與《日本書目志》相去甚遠，也多只是簡述此類譯書出版狀況與流傳情形。

其他還有像沈兆煒編纂的《新學書目提要》於法制類、歷史類、輿地類，每類都有一篇類序，同時在最早出版的法制類書目有自序一篇，也可視之為總序。王景沂編纂的《科學書目提要初編》分為「政治」、「文學」、「武備」、「格致」、「農業」、「工藝」、「商業」、「醫術」8 科，下分 48 子目。每小類均加按語，概述本目所錄主要內容、學術價值，也是類序的發揮。至於其他譯書書目雖然多有自序，在自序中也都略微對西學傳播以及所收錄的譯書做出概略的介紹，可視之為類似總序的大序。但於類目中卻未有類序，這應與大多數譯書書目將精力投注在提要上，而疏忽類序有關。

（二）提要

提要或稱敘錄、解題，為列於書名之後的短文，用以揭示圖書內容主旨、價值得失，介紹作者生平事蹟、學術源流，以及該書的版本、校勘、流傳情況等。提要是中國古典書目中重要的結構，是古典書目具有學術性和指示讀書治學作用的具體表現。

提要始自劉向。劉向所作《戰國策書錄》、《晏子敘錄》等，對各書的整理校勘情況、各書的作者、內容與學術源流等，都作了概括的敘述介紹或分析評價。但必須要提出的是，古典書目的提要在寫作體例上並不是完全統一的，前述劉向創始的那種由書目編撰者自己較為全面地簡介圖書作者、內容、形式及其

¹¹⁹ 同註 24。

校勘整理情況的體例，是提要的主要形式。但後代目錄學家也對此進行了某些變通，採取了一些不同的撰寫方法，如所謂「傳錄體」和「輯錄體」等。

而隨著印刷技術的成熟，書籍的數量也逐漸增長，書目的編纂者無法與劉向一樣，因為書籍數量較少，尚能花費大量時間來編寫提要，也由於如章學誠所說的「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¹²⁰」所以出現如《隋書·經籍志》這類書目，僅以自註的形式對所載某些圖書的作者、內容及亡佚、殘缺情況作簡要說明，雖然較為簡陋，但也可看作是一種不同風格的提要。

譯書書目普遍都有提要，其原因主要是由於西學譯書大量進入中國，中國社會對西學仍是十分陌生。而有了提要，將可方便讀者有效的進行學習與選擇。徐維則針對此點，在《東西學書錄》說的相當清楚：「學者驟涉諸書，不揭門徑，不別先後，不審緩急，不派源流，每苦繁瑣，輒難下手，不揣樛昧，於書目下間附識語，聊闢途徑。¹²¹」《西學書目表》、《東西學書錄》、《農務要書簡明目錄》、《東籍月旦》、《新學書目提要》、《譯書經眼錄》、《江南製造局譯書提要》等譯書書目都有提要。有的書目提要僅有寥寥數語，指明讀書要領、揭示圖書價值，如在《西學書目表》中梁啟超給《數學啟蒙》的識語是「數理精蘊之節本，極便初學」給《萬國史記》識語是「雖甚略，然華文西史者無詳者，讀之」給《佐治芻言》是「言政治最佳之書¹²²」。這些識語言簡意賅，發揮推薦圖書、指導閱讀的作用。有些書目則較為精詳，不僅指出圖書的價值與用途，更主要的是介紹圖書的內容。如《東西學書錄》、《譯書經眼錄》、《東籍月旦》等。《東籍月旦》不僅有單書提要，有時還將幾本書合起來一同做一篇提要，將主從分開，如其中「世界史」類，《萬國史綱》（元良永次郎、家永豐吉）與《西洋史綱》（箕作元八、峰岸米造）即同列一提要：

此兩書皆據歷史之事實，敘萬國文明之變遷，以明歷史發展之由來。…

¹²⁰ 同註 82。

¹²¹ 徐維則編，《東西學書錄》自序。

¹²² 同註 24。

元良家永之書，凡分三篇…誠簡要賅備之作也。…其作峰岸之書，上海某局有譯本，題作《歐羅巴通史》。¹²³

而部分譯書書目以提要為名，則更加詳盡。如《算學書目提要》、《江南製造局譯書提要》在揭示圖書內容之後還將其目次詳盡地列出。《算學書目提要》除了列舉目次外，有時還對一本書個別章節中的內容做進一步詳述，或指出這本書這章節的內容為他書所無等。這更使得譯書書目的作用擴大。如「西算類」中《數理啓蒙》的提要：

案：是書為《數理精蘊》之節本，每法只列一題，最為簡要，誠初學之善本，其對數一門，較精蘊為易讀。

第二卷有關諸乘法捷法，為《數理精蘊》所無。¹²⁴

而提要最為豐富完備的莫過於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清大臣赴外國考察回來後編纂的《譯書提要》。由於此書為提供清末新政資料參考，為了闡述國外改革之功效以做為中國之借鑑，提要篇幅多達數百字，猶如短文。以《日本貨幣制度考提要》為例：

右述日本貨幣制度，首言改革始末，及現行貨幣法，及造幣諸規則。以見於由銀本位進於金本位之次第。……區區三島對於歐美各強國得以支柱，不為其所吮吸，且興學練兵，靡無數金錢以戰勝強鄰。……中國欲整理財政，庶呼借鏡不遠也。¹²⁵

提要中不僅簡述書中內容，更大力抒發日本變政之功效。不單達到提要基本介紹書籍的功能，更將提要指示個人讀書治學作用進一步的發揮，提高到對整體政治、社會思潮的論述。

¹²³ 同註 48。

¹²⁴ 同註 17。

¹²⁵ 同註 41。

二、創新：著錄項目的多元化

王京山曾說：

為實現「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的，為充分揭示出學術文化發展的歷史過程及其來龍去脈，傳統目錄學要著重典籍內容，採用分類目錄的形式，以便從文獻的學術內容出發實現對文獻的標引和檢索。在分類的基礎上，再以「提要」、「解題」等內容著錄項目揭示典籍的學術內容和文化內涵。而著錄格式如書名、篇卷、作者等形式因素，則較為忽略。¹²⁶

中國古典目錄學這種傳統形成的原因，正如王雲五在其《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序中所提到：「我國書目，向為藏書家或內府所出，其目的在供學者之討究，非所語於平民也。」因為書目的編纂者與利用者都是同樣的學者士人，所以在著錄格式上自然較為忽略。而譯書書目的編纂原因其本質在於推廣西學，希望達到「販夫走卒，皆當瀏覽，非獨士大夫與大學者之研求已也。¹²⁷」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考慮到使用者的便利，譯書書目著錄項目較中國古典書目來的完整，還創新加上不少因應社會潮流的項目。

（一）完整的著錄項目

宗教譯書書目的用意在於介紹傳教士，所以採用「以書類人」的方法，往往僅簡單著錄書名卷數，與中國古典書目的著錄格式相去不遠。一直要到《江南製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所附錄的江南製造局書目表才開始設置有較中國古典書目完整的項目。如在「已刊成出售各書目錄」部分，每種書下著錄書名、撰書人名、譯書人名、筆述人名、刊書年歲、每書本數、每書連史紙價錢，無提要。

¹²⁶ 王京山，「中國傳統目錄學辨考與致用的辯証思考」。《圖書與情報》2期（2002）：頁25。

¹²⁷ 轉引自鄭鶴聲著，《中國史部目錄學》（臺北市：華世，1985），頁142、143。

如：

化學鑑原 英國韋而司 傅蘭雅 徐壽 一千八百七十一年 四本 一千文¹²⁸

其中共有 7 個著錄項目較中國古典書目往往僅標書名、作者、卷數來的更為齊全。特別的是不僅著錄著者與譯者，更特別著錄「筆述人」，其後的「已譯成未刊各書目錄」、「尚未譯全各書目錄」在著錄上雖較為簡單，但仍保留有「筆述人」。之後陸續出版的江南製造局譯書書目也都有「筆述人」的著錄項目，這反應了江南製造局早期「口譯筆述」的翻譯方式，也顯示著錄項目的完整。

《江南製造局記》圖書目中特別採取了表格的著錄格式，每種書下著錄書名、本數、卷數、附圖、原著、翻譯、筆述、校對、出版、價值，著錄項目共有 10 項，是譯書書目中最為齊全著，涵括了圖書的各部分特徵。如：¹²⁹

書名	本數	卷數	圖	原著	繙譯	筆述	校對	出版	價值
行軍測繪	二	十	二百五 十五	英連提	傅蘭雅	趙元益	沈善蒸	同治十 三年	六角

而除了以上兩種譯書書目外，梁啟超《西學書目表》中的著錄項目共有 7 項，分別為書名、圈識、撰譯人、刻印處、本數、價值、識語。不僅項目完備，更開創圈識之法。圈識為在書名下上附加小圈，圈識由 1 個到 3 個，大體以圈的多少表明書的優劣。圈越多，說明書越好。如《地理全志》有 2 個圈識，識語道：「簡而頗備」；《數學啟蒙》是 2 個圈識，識語道：「數理精蘊之節本，極便初學。」還有很多是 1 個圈識的，並不加以識語，應為品質一般的譯書。但沒有圈識的則是有兩種原因，一者為此書品質不佳，如《西算啟蒙》沒有圈識，識語便道：「太淺，不必讀」；但有部分則是因梁啟超尚未讀過，所以不加圈識，「諸書多未讀者，不敢妄加圈識，已讀諸書識之。¹³⁰」詳細著錄格式為：

西學考略 丁韋良 同文館本 二本 五錢 丁告假回國，歸而著此詳於學

¹²⁸ 同註 67。

¹²⁹ 同註 70。

¹³⁰ 同註 24。

而後盧靖所編纂的《增訂西學書目表》進一步增加撰譯年號於書名之後。如：

筆算數學 光緒元年 狄考文 鄒立文 益智書會本 三本 一元 用俗語教

00¹³²

學童，甚便，惟習問太繁

將著錄項目增加到 8 個。而其他譯書書目著錄項目雖較以上幾部書目為少，但都具備有書名、冊數、譯者、價目。如《日本書目志》：

國家社會制 一冊 光吉元次郎譯 五角¹³³

由以上觀之，雖然譯書書目的著錄體例普遍採取簡單的簿錄方法，如東西學書錄所說：「等於簿錄而已¹³⁴」。但著錄項目已較中國古典書目來得完備豐富，相當方便使用者作為查找譯書之用，發揮現代書目的功用。

然而實際上譯書書目雖然在著錄項目較中國古典書目來的齊全，但往往因書目資料收集困難，或相互疏漏，所以如《西學書目表》在著錄時就並非完整著錄，有相當部分著錄的相當簡略，並非對每一種書進行項目齊全的著錄。根據學者統計，以《增訂西學書目表》為例，有 85 種書沒有撰譯年號，有 45 種書沒有撰譯者，有 26 種書無刻印處，有 61 種書無本數，有 80 種書無價值；有 57 種書無圈識；有 262 種書無識語。¹³⁵其他譯書書目有完整的著錄書籍也是少數。這種著錄的殘缺不全，是必須要加以提出的。這種狀況其實反應了當時在編纂譯書書目上，一方面譯書資訊的蒐集困難；一方面則是編纂者雖然都是中國的博學之士，但在接觸大量的譯書下，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二）強調版本

著錄版本則是中國古典書目編制上的一個特性，這主要是由於明代中後期版

¹³¹ 同註 24。

¹³² 盧靖編，《增訂西學書目表》。

¹³³ 同註 44

¹³⁴ 同註 121。

¹³⁵ 參考程磊，關於《西學書目表》的一些問題，河南圖書館季刊（1982；4）。

刻的發達，以及宋元以來版本類型的眾多，以及受到明代開始大盛的私人藏書風氣所影響下產生的。如《脈望館書目》為宋版、元版、內府版設專類，《得月樓書目》專記版本，以及《讀書敏求記》的專記宋元舊刻和精校精鈔本，都證明了此一現象。

近代譯書雖無珍奇版本可言，但譯書書目卻多有著錄。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出自便於購讀的需要，如梁啟超說：「收藏家最講善本，故各家書目於某朝某地刻本至為艱艱。今所列皆新書，極少別本，仍詳列之者，不過取便購讀，與昔人用意微殊。¹³⁶」其次則是如開明書店創設啓事中曾講到：「譯書日多，優劣參半。¹³⁷」也有出版者為牟利，往往會將書籍改名易題，甚至割裂成書。所以為了使讀者在方便取得譯書的同時，顧及到譯書的品質，譯書書目沿用著錄版本的方法。如《若水齋古今算學書錄》、《西學書目表》、《日本書目志》、《東西學書錄》、《譯書經眼錄》、《新學書目提要》、《科學書目提要》等都注明了版本，如「上海益智譯社本」、「商務印書館洋裝本」、「南洋官報本」、「江南製造局排印本」、「西政叢書本」等。《東籍月旦》雖無著錄版本，但對所錄收日文圖書中，有漢譯本的便加以註明，如《支那文明史論》下註有「上海普通學書室有譯本¹³⁸」，也可看做另一層面的版本著錄。

（三）著錄價值

梁啟超《西學書目表》的序例中說：「目錄家皆不注價值，蓋所重在收藏，無須乎此。今取便購讀，故從各省官書局之例，詳列價值。¹³⁹」這提到了譯書書目在著錄項目上的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對圖書價格的記錄。如江南製造局各譯書書目中著錄有價目。其中以《江南製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所附錄的江南製

¹³⁶ 同註 21。

¹³⁷ 轉引自魯軍，「第二次外來知識大輸入的歷史記錄—論清末譯書目錄」，《資料工作通訊》2 期（1982）：頁 36。

¹³⁸ 同註 48。

¹³⁹ 同註 21。

造局書目表「已刊成出售各書目錄」以及《上海製造局譯印圖書目錄》兩書目最爲特別。前者在價格部分標明書籍用紙，爲「每書連史紙價錢」，這是因爲「連史紙」是當時較爲高級的印刷紙張，因此特別提出來以做爲購買上的參考。後者同於前者，於價格處標明書籍用紙種類及價錢差異。但多了較爲廉價質差多用於報紙的「賽連紙」。如：

西藥大成十卷 十六本 連史 六元

賽連 三元八角¹⁴⁰

兩者價差接近一半，方便不同階層的讀者根據本身喜好加以選擇。

《農務要書簡明目錄》更進一步的乃是註明美元價值，並說明從國外購求的方法，使書目交流功能進一步拓展。自序曰：

中國購西國圖書，往往因不知其價值而憚於搜羅，故此篇於各書下列其價值，皆美國藏書樓所定之價…再西國售書章程，如由各大書院購買，一律照原價八折，亦購書者所宜知也。¹⁴¹

《日本理學書目》註明的是日圓價值，爲了讀者方便起見，還特別說明了日圓與中國銀兩間的換算方式，書目中說明：「其定價之單位為日本錢數，每百錢合日本金一圓，每日本金一圓又三十四錢合我銀一兩。¹⁴²」此外如《西學書目表》《東籍月旦》、《日本書目志》、《東西學書錄》、《譯書經眼錄》等也都標明價格，價格幾乎爲譯書書目所必備之項目。

¹⁴⁰ 同註 72。

¹⁴¹ 傅蘭雅口譯；王樹善筆述，《農務要書簡明目錄》自序。

¹⁴² 同註 20。

第肆章 譯書書目的分類系統

在中國古典目錄學發展的過程中，歷代書目皆是因為文獻整理而產生，這些圖書文獻經過分類編排後的成果便反映在書目上。如果只有分類而最終沒有形成書目，所分之類只能是空泛的安排，缺乏圖書實際的印證；而未加分類的書目必然又是混亂的，由此可知書目實與分類密不可分。《遂初堂書目》序言說道：「若其部析條流，整齊綱紀，則有目錄一卷。甲乙丙丁之別，可以類知，一十百千之凡，從於數舉。¹」正意味著中國古典目錄學家運用分類的概念與符號來表達圖書文獻的秩序性和規律性。分類構成了書目的基礎，對書目分類系統的認知方能真正瞭解書目體系的建構。因此，從分類系統出發來研究書目，也成為中國古典目錄學的特點。誠如姚名達先生在《中國目錄學史》所說：「我國古代目錄學之最大特色為重分類而輕編目，有解題而無引得。²」余訓培也說道：

綜觀中國目錄學史，目錄學特徵與方法之重要者不外乎如下幾點，一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錄學學術史的職能和事實，二是目錄學著述和目錄成果中呈現出來的分類思維制約下的結構體系。也就是說，中國的目錄學和目錄學研究，必然繞不過此二者，此二者乃中國傳統目錄學特徵與方法的基本組成。³

分類的體系反映了學術的源流；學術的流變影響了分類的標準。所以中國古典目錄學一直以分類的研究為核心。如鄭樵提出「類例既分，學術自明」旨在強調分類的重要，章學誠目錄學思想的核心理論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這皆是為了實現「即類求書，因書究學」的理想。一直到汪辟疆也在其《目錄學研究》說道：「研究目錄學之標準，當必博稽其源流，商榷其類例，與夫義例之變遷，分

¹ 尤袤，《遂初堂書目》序。

² 姚名達著，《中國目錄學史》（上海市：上海古籍，2005），頁307。

³ 余訓培，「中國目錄學傳統之目錄學與文獻整理之二位一體」，《圖書館理論與實踐》1期（2006）：頁116。

隸之出入，皆宜詳究。⁴」都證明了此點。

中國古典目錄學家通過考察分類而得出關於目錄學的結論，在譯書書目的發展過程中，分類系統與盛行於中國古典書目中四部法的大相逕庭，不僅反應了譯書書目所傳播的西學思想與中國傳統學術體系的差異，更隱含了譯書書目的編纂者是如何改造中國古典書目的傳統來藉以傳達西學的嶄新意念。本章先由中國古典目錄學的分類系統進入，瞭解中國古典目錄學發展過程中書目分類是如何架構的，討論古典書目的分類基礎與思想。繼而希望就此導引出西學引進後，中國學人初步面臨到西學的迷惘，與逐漸複雜的譯書書目分類系統。

第一節 中國古典目錄學的分類系統

一、因書而設類—中國古典書目的基礎

西漢以降，幾乎每個朝代都有在政府主持下的大規模的圖書文獻整理活動，也就是七略所提及的「校書」，最後以文字形式保留下來的成果就是官書書目。如西漢武帝時期，軍政楊仆「摭摭遺佚⁵」，整理兵書而成《兵錄》；劉向負責整理國家藏書，「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⁶」匯成《別錄》；魏秘書郎鄭默的《中經》、宋代《崇文總目》和明代《文淵閣書目》一直到清代的《四庫全書總目》都是在政府組織下的大規模校書活動中產生的。而在中國古典書目中佔有一席之地私家書目，其中所著錄的圖書自然是來自於藏書家的私人藏書。從中國古典目錄學的發展過程，我們可以清楚的發現中國的歷代書目都是產生於具體的圖書文獻。即便如《隋志》著錄了梁有隋亡之書；鄭樵《通志·藝文略》立志「記百代之有無」、「廣古今而無遺⁷」，這些所提到

⁴ 汪辟疆著，《目錄學研究》（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頁11。

⁵ 《漢書》，卷三十《藝文志·兵家總序》。

⁶ 《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總序》。

⁷ 鄭樵，《通志》，卷六十三《藝文略》。

的圖書，也都是具體存在的。

而在另一方面，我們稍加回顧，便可發現從漢班固編撰官修正史《漢書·藝文志》開始，到後來歷代官修正史《藝文志》的書目整理，主要都是爲了表明各代所藏圖書。日後逐步出現興盛的私家藏書目錄，也同官家各種書目一樣，其整理編目的目的也是重在表現個人所藏。正如王雲五在《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序中所云：「夫時移勢移，中外同然，我國書目，向為藏書家或內府所出，其目的在供學者之討究，非所語於平民也。⁸」所以中國歷代書目的編纂者，他們所考慮的是如周彥文所說：「一是如何將書籍『學術系統化』，二是如何在書目中傳達出教化思想。⁹」也就是王心裁所說：「古典目錄學的重點是在文獻整理，由此深化即為學術整理，這不是說古代就完全忽視了文獻需求，而是這種需求在文化大背景中隱沒了。¹⁰」

既然中國古典書目是在圖書文獻的整理收藏下而產生，而書目分類的目的也是重在典藏，而非提供個人的檢閱。爲了因應這種傳統，中國學者便採取了「因書而設類」的方法，這與現代分類體系如《中國圖書分類法》，在本質上有相當大的不同。前者是根據手中所有的圖書類型，來制訂類別。後者是預先制定一個分類系統，並準備收錄未來可能出現的所有圖書。最大的差異便在如古代書目如收有宗教一類的書，則必設相關類目，而不收則不設。正因爲中國古典書目的分類都是從具體圖書文獻入手的，一部部的典籍構成了中國古典書目的基礎。所以當西學傳入後，古今、中西圖書文獻之異勢必將塑造兩套並不相同的書目分類系統。

⁸ 鄭鶴聲著，《中國史部目錄學》（臺北市：華世，1985），頁143。

⁹ 周彥文著，《中國目錄學理論》（臺北市：學生，1995），頁26。

¹⁰ 王心裁，「從古典目錄學到現代目錄學」，《圖書情報工作》4期（1989），頁5。

二、七分而四部—古今不易之法

西漢末期劉歆編制的《七略》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分類書目，原書雖早已亡佚，但從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中尚能理解《七略》書目分類的梗概。大類稱爲略，略下分種，種下分家。《七略》的分類法奠定了中國古典書目分類的基礎，對後世的圖書分類有深遠影響。《七略》分類法基本上是按照當時盛行的學術來區分的，除「輯略」是各書的述說外，有「六藝略」就是當時的六種經典作品，後來通稱爲「四書五經」。有「諸子略」，近似哲學之類的圖書。有「兵書略」，就是軍事學。有「術數略」是天文算術等類。有「方技略」包括醫藥與藝術等。這 6 大類又分爲 38 小類，構成整個書目體系，貫穿著尊重儒家的思想。

之後南朝宋王儉編《七志》。《七志》突破《七略》的收書範圍，試圖運用《七略》的原則把一切圖籍納入統一的體系之中。七志分爲：一、經典志，二、諸子志，三、文翰志，四、軍書志，五、陰陽志，六、藝術志，七、圖譜志，並附有「道」、「佛」二類。隨後，南朝梁阮孝緒以《七略》、《七志》爲基礎編制《七錄》。分爲：一、經典錄；二、紀傳錄；三、子兵錄；四、文集錄；五、技術錄；六、佛錄；七、道錄。兩者都在《七略》的基礎上，因應當時的圖書而做出改變。

但由於後代學術的發展，圖書內容和類型的變化，後來關於歷史的書增多了，加以佛教的興盛，佛經翻譯的發展，而兵書、術數、方技的書數量減少。依循著《七略》體系的七分法逐漸不能滿足需要，容納不下新增加的圖書，於是出現四部分類。在三國，魏鄭默編《中經》；晉荀勗又根據《中經》改編《新簿》，將圖書分爲四部：一、甲部，包括六藝與小學；二、乙部，包括諸子、兵書、術數；三、丙部，包括史記、舊事、皇覽簿；四、丁部，包括詩賦文集。晉代的李充又把五經作爲甲部，史記作爲乙部，諸子作爲丙部，詩賦作爲丁部，但互換乙丙兩部類目之書，由荀勗的經子史集順序，改爲經史子集順序。這一改動

雖然不大，但有獨具匠心之處，也反應了中國社會對史書的重視。唐代修《隋書·經籍志》，將甲乙丙丁之符號，第一次換成經史子集之類名，從此以後相繼沿用，幾乎由唐代到清代的史志書目和官修書目清一色都是四部法。¹¹子目雖有變化，四大類卻是穩定的。

中國書目的發展過程中，除上述兩種主要分類系統外，還有九分法、十二部分類法等，但都是大同小異，影響很小。如袁學良即認為：

通觀漢至清的各式各樣的典籍分類法，雖類目有多寡，體例有差異，然而其基本板塊結構卻極為相似。究其原因，首先應該歸結於它們具有相同的封建時代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基礎。¹²

劉國鈞也提到：

千餘年來的變化不過是部以下類目的增減和名稱的變換而已。即使有極少數學者提出不同的意見，也始終沒有得到通行。二千年間我國封建社會性質沒有變，統治階級以孔子學說為中心的思想始終沒有變。因而分類法的基本結構也沒有變。¹³

由此便可知道由於中國古典書目濃厚的考辨學術源流特性，所以一直在儒家學術思想影響下的中國學人自然都循著相同的軌跡。

而後到清乾隆三十二年（1773）編四庫全書的時候，分經、史、子、集四部。經部分 10 類；史部分 15 類；子部分 14 類；集部分 5 類。共 44 類。類之下再分屬，共有 65 屬。乾隆皇帝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說道：

朕意從來四庫書目，以經、史、子、集為綱領，褒輯分儲，實古今不易之法。¹⁴

¹¹ 同註 9，頁 36。

¹² 袁學良，「論古籍分類法體系構建的政治文化思想基礎」，《四川圖書館學報》2 期（2005）：頁 77。

¹³ 劉國鈞，「中國圖書分類法的發展」，史永元、張樹華編，《劉國鈞圖書館學論文選集》（北京市：書目文獻，1983），頁 396。

¹⁴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

從此幾乎確定了四部法在中國古典目錄學上史實質與精神上的主導地位。

一部書目的撰寫不僅僅是編纂者主觀選擇安排的結果，目錄學家的主觀認知也將會透過書目而反應出來，它使得每部書目在不同的作者筆下呈現出各自不同的類例與編纂特色。當然，目錄學家的創造性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因為目錄學有自己發展演變的過程，並且在演變中逐步形成某些固定的類型。同時又受到時代、政治、社會等各種因素的影響。在中國古典目錄學史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從劉向、劉歆父子《七略》所開創的書目分類系統經過不斷的演變發展而逐步成為四部法的書目分類模式，這種分類模式到編修《四庫全書總目》而達到極盛。雖然如學者所說：「四庫所以在近代以後尚有很大影響，不是因為有什麼優點，而是沒有較好的類例替代它。¹⁵」或是「四部制度之得以推行者，藉政府之勢力，非其制本身完善。¹⁶」以今日眼光來看，四部法實存有相當多的缺點，並非如乾隆皇帝所說的「古今不易之法」。但是四部法在中國古典書目的發展過程中，沿用持續相當長的時間，並最終成為中國古典目錄學的基本模式，這意味四部分類是基本能夠反映中國學術體系的特徵的。四部法儘管有所欠當，但對於部次中國圖書典籍，還是基本適用的。但對於明末從西洋翻譯而來之西學典籍，則在四部法的分類體系中難以找到合適之門類。江人度曾說過：「東西洋諸學之書，愈出愈新，莫可究詰，尤非四部所能範圍，蓋《七略》不能括，故以四部為宗，今則四部不能包，不知以何為當？」¹⁷於是對於這些翻譯而來之西書，譯書書目勢必得面對改造書目分類系統的難題。

三、學科分類或學術分類—中國古典書目所依循的腳步

綜觀中國古典書目中所使用的分類法，無論採取的是七分法或四部法的系

¹⁵ 王國強，「中國古典目錄學新論」，《圖書與情報》1期（1992）：頁25。

¹⁶ 劉國鈞，「四庫分類法之研究」，史永元、張樹華編，《劉國鈞圖書館學論文選集》（北京市：書目文獻，1983），頁21-22。

¹⁷ 同註2，頁103。

統，無論是二級或三級的從屬結構，都是以書籍為主要的思考焦點，也就是前述所提的因書而設類的分類基礎。而在這基礎上，進一步藉由圖書的類別，達到考辨學術源流的目的。而在這種思維影響下，中國古典書目是採用什麼分類理念呢。

中國古典目錄學的分類理念，絕大多數學者都認為所遵循的是學術分類而非學科分類。什麼是學科分類呢？就是以圖書的學科屬性為依據，建立一套規則，按照規則可以將所有的圖書納入該系統。這是一套可以供不同圖書長期使用的規則。學科分類的目的在於保持圖書分類的規則性和連續性，可以提供使用者方便查找相關的圖書文獻，而這樣的方法普遍為西方目錄學所利用。而學術分類是按照學術的系統和派別對圖書進行分類，每一類由學術性質類似的圖書組成。與學科分類所不同的是，學術分類更注重其人文意識。好比說不論是七分法還是後來的四部法都將經部從知識體系中抽離出來成為類首，以四部法來說，具有教化意義的《詩經》被分入經部，同樣性質的詩歌卻被分入集部；《尚書》屬於經部，同樣性質的詔令卻屬於史部；《論語》《孟子》是經部的組成部分，而其他儒家作品卻劃入諸子。這樣的作法是為了顯示中國的學術源流與範疇，這便與學科分類僅依照圖書的內容來加以分類有著相當大的差異。比較兩種分類思想，我們可以發現學科分類所著重的是圖書本身的內容差異，而學術分類則更著重圖書所體現的學術思想。

具體而言，中國古典書目所遵循的「學術分類」，非指作為學術門類之學科，而是指含義更廣的學問或知識。如所謂「四部之學」，不是指經、史、子、集四門專門學科，更不是特指經學、史學、諸子學和文學等，而是指經、史、子、集四部範圍內的學問。這是指由經、史、子、集四部為框架建構的一套包括眾多知識門類、具有內在邏輯關係之樹狀知識系統。有人精闢地指出：

經部，為中國文化之根源，猶如中世紀歐洲之神學—新舊約全書。史部，為事實之紀錄，子部，為哲學家之思想，集部，為文學作品。又如

希臘亞里斯多德根據人類記憶、理性、想像之三性能，分學問為歷史、詩文、哲學三大類。易言之，經為根，史、子為幹，集則為枝；聚根、幹、枝而成樹之整體。故四部法依經、史、子、集之次第先後排列，亦即在表明全部知識之體系。¹⁸

由此可見一斑。

學術分類在中國古典書目中被長期使用，首先是因為不論是政府藏書還是私家藏書並不對外開放，也就是不提供其他使用者檢索，因此在分類整理上不需要考慮所有的圖書文獻，自然不需採取學科分類的方式。其次每部書目的編纂都是由不同的主體執行，個人目錄學思想、觀點和方法的不同也同樣意味著書目的不同。好比說自隋、唐以來，四部法在中國的目錄學界便被視為主流，然而綜觀自隋、唐以降的中國古典書目，我們可以發現，四部法一直沒有明確的定義，以致於在大家遵循的四部法的概念下，其下分類卻隨時可以調整。這種不穩定和隨意性正是書目編纂者以個人學術思想加為分類的印證。

但實際來看中國古代書目在分類上，也並不是完全以學術為準則，就中國古典書目的基本組成來說，類別的建構有著「崇質」和「依體」兩種模式。¹⁹所謂「崇質」，就是以著作的內容性質來歸類。這部分就是依照學術分類的理念。所以詩經被歸類於經部詩類，並不因為《詩經》的體裁是詩歌而將之歸於集部總集類。而「依體」就是純粹以體裁為分類標準。例如史部編年類，凡編年體的史書皆入此類等。中國書目的分類一向是崇質和依體這兩種標準互相使用的。如姚名達指出：

分類之綱目，始終不能超出《七略》與《七錄》之矩矱，縱有改易，未能遠勝。除史部性質較近專門外，經、子與集頗近叢書，大綱已誤，細目自難準確，故類名非學術之名而為體裁之名，其不能統攝一種專科學

¹⁸ 劉簡著，《中文古籍整理分類研究》（臺北市：文史哲，1981），頁77。

¹⁹ 同註9，頁47。

術也必矣。²⁰

所以黃晏好認為如依崇質和依體這兩種標準互相使用的程度，中國古典書目的分類體系應當為：

從分類思想看，中國古代的圖書分類實際有兩個帶傾向性的體系並存：從《七略》到《通志》一系，在整理書籍的同時梳理學術源流，其所分的類別也更接近所處時代的學術劃分；而從魏晉開始到清代四庫全書的四部分類是另一系，逐漸以整理書籍為主，越來越少關注學術源流。²¹

但章學誠卻認為文集這一類的出現就是由於「師失其傳」而使「學無專門²²」。因此，我們必須知道實際上，中國古典書目的分類理念雖然與學術分類密切相關，但呈現在書目上卻仍有些歧異。

第二節 西學帶來的迷惘

西學書籍之翻譯出版及譯書書目之編制，實際上代表著西方近代學科知識體系輸入的過程。這種學科體系及知識系統，與中國呈現在書目上以四部法為主的傳統學術分類體系有著很大差異。最主要的原因即來自於影響中國古典書目的傳統學術思想中兩個主要的特徵，首先是「學尚博通」的治學思想，其次為重文史輕技工的「重道輕藝」思想。當西學剛剛輸入中國時，因其數量有限，西學還可以被納入四部法的框架中，如《四庫全書總目》以及《書目答問》。但隨著西書翻譯之增多及傳入的西學門類更加繁瑣，四部法顯然難以適應這些來自西方的嶄新知識系統。這使得中國學人士子在面對西學，編纂譯書書目的過程中，勢必先有一段迷惘、掙扎的過程。

²⁰ 同註 2。

²¹ 黃晏好，「四部分類是圖書分類而非學術分類」，《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 期（2000）：頁 110。

²² 章學誠，《和州志·藝文書敘例》，倉修良編《文史通義新編》（上海市：上海古籍，1993），頁 771-773。

一、學尚博通的中國治學思想

近代目錄學家劉國鈞曾指出：

近世學術，側重專門，故西方之圖書分類亦主精詳。中土學風，素尊駭博。故圖書類部，常厭繁瑣。²³

楊燕起也認為：

與西方文化中嚴密的學術分類比較，中國的民族文化更喜歡做模糊的全面的把握。這樣，在具體的文化學術觀念上，便不是把文學、史學、哲學、宗教、天文、法律等等個別的學術類別獨立起來，而是更看重各門類間的相互關係。因此，中國古代的歷史文獻學家看待歷史文獻，便不是侷限於個別的單獨門類，而是從思想文化的整體把握，主張會通各方面而作一種綜合性的研究。²⁴

由此便反應了一個重點，即中國古人治學講綜合和融會貫通。如近代大學者王國維曾說：「夫『不通諸經，不能解一經』，此古人至精之言也。²⁵」錢穆也曾說：

中國古人並不曾把文學、史學、宗教、哲學各別分類獨立起來，毋寧是看重其相互關係，及其可相通合一處。因此，中國人看學問，常認為其是一整體，多主張會通各方面而作為一種綜合性的研究。²⁶

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古代儘管有自己的學術分科體系，也有各自的專門之學，但注重的是各學術門類間的相通之處。也就是左玉河所說：「中國傳統學術的基本特色是注重『通』，具有濃厚之『通儒』取向。這種會通，一是自然科學與社會

²³ 劉國鈞，「中國圖書分類法·導言」，史永元、張樹華編，《劉國鈞圖書館學論文選集》（北京市：書目文獻，1983），頁55。

²⁴ 楊燕起、高國抗主編，《中國歷史文獻學》（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89），頁18。

²⁵ 王國維，《王國維學術經典集》（上卷）（南昌市：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頁159。

²⁶ 錢穆，「中國學術通義·四部概論」，羅聯添編，《國學論文選》（臺北市：學生：1985），頁4。

科學的會通，二是文史哲會通。²⁷」這也反應在學者所指出的：

若以近代學術範疇來劃分人文與社會學科，我國歷代的發展情況，顯然又有不同。語言文字學、哲學、史學、地理學等，已經分科獨立，而法律、政治、軍事、財政、經濟、倫理等部門，不是處於附屬地位，就是含混籠統，歷史上有不少傑出的政治家，精通財政、軍事、法律諸學。

28

所以當中國學者士人嘗試編纂譯書書目時，是很難不受到這種長久以來的治學觀念所影響。當梁啟超應門人之求作《西學書目表》時，便明確地提到了這種困惑：

西學各書，分類最難，凡一切政皆出於學，則政與學不能分，非通群學，不能成一學。非合庶政不能舉一政。則某學某政之各門不能分。今取便學者，強為區別。一顧自七略七錄，以至四庫總目，其門類之分合，歸部之異同，通人猶或瞥之，聚訟至今，未有善法。此事之難久矣，海內君子，惠而教之，為幸何如。²⁹

二、儒家思想下的重道輕藝

《格致書院課藝》是格致書院所舉辦的歷次考試中優勝者答卷的匯編，格致書院曾多次專門就西學而出題。檢閱學生們的答卷，作為在晚清時期接受到有系統西學教育的中國學生，我們大體可從其如何看待中西學的關係，來反應中國學人的西學觀。如潘敦先說：「中西之學，本不相同，中國重道而輕藝，故以義理為勝；西國重藝而輕道，故以格致見長。³⁰」鍾天緯也說：「蓋中國重道而輕藝，故其格致專以義理為重，西國重藝而輕道，故其格致偏於物理為多。此中西

²⁷ 左玉河著，《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上海市：上海書店，2004），頁90。

²⁸ 劉岱主編，《中國文化新論·學術篇》（臺北市：聯經，1982），頁22。

²⁹ 梁啟超編，《西學書目表》自序。

³⁰ 王韜編，《格致書院課藝》第13冊，頁3。

之所由分也。³¹」從他們的答案中反應了一個事實，也就是中國歷來傳統學術領域受到儒家思想影響下一向是重文史而輕技藝的。如富有正統儒家思想的韓愈在《師說》中所寫道：「百工之人，君子不齒。³²」

從漢朝開始，漢武帝為鞏固其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度，採用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以儒家學說來維護階級制度。漢成帝命劉向等人編校的書籍也是以儒家經傳等文史書目為主。劉歆編撰的《七略》先是輯略，它分別說明六略種目的意義與學術源流，其次是「六藝略」，主要是儒家經典著作以及學習六經的書目。「諸子略」，指哲學、政治、法律等書，是「六經之支與流裔」，因而列為第二。「詩賦略」指雜賦、詩歌等。「兵書略」收軍事書籍。「數術略」是天文、歷法、占卜、星相的書。「方技略」是有關醫藥、衛生的書。從編制的六類書目看，基本都是文史類書目。後來開官修書目正式先例的《漢書·藝文志》、第一次以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的《隋書·經籍志》以及清代最巨大的官修書目《四庫全書總目》單從類目名稱上看，也是以文史書目為主。總而言之，中國古典目錄學一直都是圍繞著文史或接近文史性質的書目的軌跡發展的。這是由於：

自從《七略》把儒家經典「六經」置於圖書分類體系的首位，此後……都毫無例外地把儒家經典置於圖書分類表的首位。儒家思想作為統治思想的主體貫穿於封建社會的始終，只要儒家思想在封建社會中作為統治思想的地位不變，儒家經典在圖書分類體系中的主導地位也就不會改變。³³

杜定友也說了：「四部分類法以『尊經衛道』為綱領，以『諸子』（哲學）是『六經之支與流裔』。³⁴」這都反應了儒家思想對中國古典書目的影響。

³¹ 王韜編，《格致書院課藝》第4冊，頁16。

³² （唐）韓愈，《師說》。

³³ 高路明著。《古籍目錄與中國古代學術研究》（杭州市：江蘇古籍，1997），頁4。

³⁴ 杜定友，「圖書分類法史略」，錢亞新、白國應編，《杜定友圖書館學論文選集》（北京市：書目文獻，1988）頁218。

明清之際開始輸入的西學，總而言之，一為天文曆象；二為算學物理；三為實用之學；四為輿地之學；五為哲學；六為美術建築。³⁵以今日眼光看來都偏向於自然科學。而發展到晚清時期，則更加是包羅萬象，大致分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門類。自然科學主要包括數、理、化、天文、地理、地質、生理、生物學等學科，社會科學主要包括文、史、哲、政、法、經、邏輯、社會學等學科。在中國長久以來受到儒家重道輕藝的思想影響下，中國古典書目中對於自然科學書籍是帶有貶抑的。從《七略》把《術數略》和《方技略》列在六略最末開始，古代各分類法均視自然科學為小道，將其歸於數術、方技之列。例如《新唐書·方技列傳》說：「凡推步、卜相、醫巧，皆技也；……小人能之。³⁶」認為「技」不過是「小人」之事。《隋書·經籍志》說：「夫仁義禮智，所以治國也，方技數術，所以治身也。³⁷」兩者自然不能相提並論。這也可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為耶穌會士艾儒略的《西學凡》所寫的提要《西學》得到證明：「其致力亦以格物窮理為本，以明體達用為功，與儒學次序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數之末；而所窮之理，又支離神怪而不可詰。是所以為異學耳。³⁸」因此當以自然科學為先的西學傳入後，長期不重視自然科學書籍收錄與分類的中國古典書目勢必面臨到相當大的衝擊。

劉國鈞曾云：

- A. 有研究之範圍擴大者。如教育，昔人多言學制，少及方法。今則蔚為專門之學。又如經濟，昔人僅言食貨財賦，認為政事之一端。今則言及私人經濟，脫政治學之範圍。若此之類，不能不准今日之情形，另立門類，而以古來類目，附之於下也。
- B. 有研究之範圍精深者。如農業，昔謂之農家，四庫所載，止十數

³⁵ 郭廷以，「近代西洋文化的輸入及其認識」，《大陸雜誌》第2卷7期（1951）：頁22。

³⁶ 《新唐書》，卷二一七《列傳第一百二十九·方技》。

³⁷ 《隋書》，卷三十二《志第二十七·經籍一》。

³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五，子部雜家類存目。

書。今則雖一農作物之微，亦有著為專書者。又如天文算法，古人僅言推步。今則天文、算學截然兩科。每科之中，且分專類。此不能不另分細目者也。

C. 有因研究之方法變更而影響及於學術之性質者。如昔人言草木禽獸之書，率為譜錄。今之著作純然異趣。不能不立動物學、植物學之名，而以昔人著作，入其中為子目者也。

D. 有純粹為昔人所未嘗有者。如物理、化學之類。此不能不為之另立新類，而位之於有關係之學科間者也。³⁹

文中精闢的指出當代學術與中國古典學術之差異，從中便能一窺西學傳入後，所帶給中國學人的困惑與迷惘。

第三節 譯書書目的分類體系

文化不同，相關的整序體系也就各異。這一分類書目的重要理論，雖然不是被譯書書目最早認同，但卻為譯書書目最早實踐。綜觀中國書目分類歷史，《七略》以降的傳統書目分類雖有六分、四分、七分、十二分等不同體系，但是，以儒家經籍為重心，以史學和諸子為兩翼的傳統文化系統卻得到了一以貫之的體現。⁴⁰

因此，無論是傅蘭雅還是康有為、梁啟超、徐維則，當其克服前述所提中國傳統學術對西學的困惑後，進一步對翻譯之西書進行分類以編制書目時，勢必面臨到另一個困擾的問題。即這些反應西方近代學科知識的譯書，因為無法融入四部分類體系中，就必須獨辟蹊徑，改變四部分類框架而謀求新的分類系統。梁啟超為《西學書目表》作序曰「西學各書，分類最難。⁴¹」徐維則亦云「東西學書

³⁹ 同註 23。

⁴⁰ 傅榮賢，「西學書目表論」，《山東圖書館季刊》4期（1996）：頁 59。

⁴¹ 同註 29。

分類更難，言政之書皆出於學，言學之書皆關乎政。政學不分，則部次奚定？今強為區別，取便購讀，通人之譏，知難免焉。」由於譯書不能納入傳統之四部法，這勢必要用西方以學科為分類標準之新法來「強為區別⁴²」。正是這種嘗試，方逐漸創建出一些與四部法相去甚遠的嶄新書目分類體系。

由於自然科學譯書書目採行的分類方式大大迥異於一般譯書書目，如《曆書總目表》的節次六目與基本五目；《若水齋古今算學書目》象數門下分為「象數」、「象總」、「勾股」、「三角」、「割圓」、「弧角」、「曲線」、「數總」、「右之分」、「開方」、「比例」、「垛積」、「對數」、「天元」、「四元」、「代數」、「微積」、「象數總」、「算器」、「算表」、「算說」、「附算學叢書」22類。都大大突顯了書目的科學性質與其獨特性，因此以下所論及的譯書書目分類體系將以綜合型譯書書目為主要論述對象。

一、中國學人對西學的初步分類

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東來，攜來了有關數學、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學知識，這些自然科學知識對中國人來說是陌生的，當時在中國並沒有意義對等的詞來稱呼它，因此利瑪竇、徐光啓等最初的西學傳播者就借用前人使用的「格致」一詞來稱呼這些西方科學。傳教士利瑪竇在《幾何原本序》中首先使用：「夫儒者之學，亟致其知，致其知當由明達物理耳。……格物窮理之法，視諸列邦為獨備焉。⁴³」徐光啓在介紹利瑪竇時說：「顧惟先生之學，略有三種：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窮理，物理之一端別為象數。⁴⁴」徐光啓開始把西學分為3種：一為「修身事天」，即天主教教義、教規等宗教神學；二為「格物窮理」之學即為自然哲學；三為「象數」之學，即天文曆算等自然科學。到明天啓三年

⁴² 徐維則編，《東西學書錄》自序。

⁴³ 徐光啓，「幾何原本序」，徐宗澤著，《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上海市：上海書店，2006），頁198。

⁴⁴ 同上註，頁197。

(1623)，艾儒略在《西學凡》中，再將西學全面系統化爲 6 大學科，即「文科」、「理科」、「醫科」、「法科」、「教科」、「道科」，即爲今天的修辭學、哲學、醫學、法學、教規學和神學。由於經歷過清中期的禁教，這兩者大概可以作爲在晚清大規模西學輸入以前中國方面對西學知識與學科體系的初步認知。

(一) 新式學堂帶入的西方學科觀念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馬禮遜學堂從澳門遷到香港，其所開課程分爲英文與中文兩科，英文科設有天文、地理、歷史、算術、代數、幾何、初等機械學、生理學、化學、音樂、作文等課程。⁴⁵儘管該學堂傳授的多屬常識性知識，但西方近代的數學、歷史學、地理學、生理學和化學等基本知識，及其包含的一套西方學科觀念，開始傳入中國。

同治十三年(1874)年徐壽等人創辦格致書院時，述其辦學宗旨是「意欲令中國便於考究西國格致之學，工藝之法，製造之理。⁴⁶」它的課程設置是以講授西方的科學技術爲主，傅蘭雅曾爲格致書院設計一套內容相當全面的西學課程提綱，包括礦務、電務、測繪、工程、氣機、製造等 6 類，每類又設置幾門到幾十門課程。例如：電務類下設置了代數學、幾何、三角、重學略法、水重學、氣學、熱學、汽機學、機器重學、鍋爐學、電氣學等分支課程。這 6 大類包括了上百門課程。⁴⁷

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各地設立的許多教會學堂。這些學堂除了宣講基督教義外，也開始傳授當時的西學知識。如光緒十年(1884)建立的鎮江女塾，所設西學課程包括筆算、心算、代數、形學、動物學、植物學、格物入門、全體入門、

⁴⁵ 同註 27，頁 116。

⁴⁶ 程獻、談火生「分科設學與清末民初中國的學術轉型」，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5 卷 2 期(2002)，頁 85。

⁴⁷ 郝秉鍵，「晚清民間知識份子的西學觀」，《清史研究》3 期(2006)：頁 84。

生理衛生、地理學等。⁴⁸登州文會館所設課程與鎮江女塾大同小異，西學有算術、代數、幾何、格物、化學、天文、地理、動物學、植物學、測繪學、人體解剖學、富國策等課程。⁴⁹由這些課程設置上看，外國傳教士設立的這些學校，都是按照西方式的學科原則組織教學的，其所講授的課程，主要是西方當時的各種自然科學和基本的史地知識。當時西方存在的許多學術門類，如數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地理學、生物學等科目以及分類觀念因此或多或少地介紹到了過來。

當時中國的學堂也開始設置有關西學的課程，如河北書院設有「經義、治事」兩齋，「經義齋」課經學、理學、詞章、經制以及中國古代算學，「治事齋」則分課西洋算學、方言、格致、律法、制造、商務、水陸兵法、輿地、測繪等。⁵⁰同治元年（1862），清政府在北京創辦同文館。光緒二年（1876）總教習丁韞良按照西方學科制定了新的課程表。他所制定的課程表，分為兩種，一種是八年制課程，另一種為五年制課程。其中的西學課程，包括有外國語言文字、算學、天文測算、格致學、化學、公法與富國策、地理學、金石礦物學等。格致學和數學分類更細，格致學分為7門，即力學、水學、聲學、氣學、火學、光學、電學等，動植物學也歸此類；數學則包括代數、幾何、三角、微積分等分支門類。⁵¹

由以上可知西方分門別類式的近代科學、工藝等學術透過新式學堂逐步深入的介紹到中國來，這無疑開闊了中國學人的眼界，使他們逐步了解並接受了西方學科分類的觀念和方法。也就是建立在對西方近代學術分科門類有一定了解的基礎上，這些譯書書目的編纂者才能提出不同於四部法的分類系統。

⁴⁸ 同註 27，頁 117。

⁴⁹ 熊月之著，《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市：人民，1994），頁 293。

⁵⁰ 章柳泉著，《中國書院史話》（北京市：教育科學，1981），頁 77。

⁵¹ 同註 27，頁 118。

（二）中國士人對西學的初步認知

清光緒十四年（1888）刊印的《西學大成》，專門為「有志泰西經濟之學者，苦無門徑可尋⁵²」而編輯，將翻譯而來的泰西經濟之學分為 12 門：算學、天學、地學、史學、兵學、化學、礦學、重學、汽學、電學、光學、聲學。這 12 門西學書籍，基本上代表了晚清洋務運動時期以前傳入中國之主要的西學內容，包含有西方近代之數學、天文學、地理學、歷史學、軍事學、化學和物理學的各門類（重學、汽學、電學、光學、聲學等）。張之洞將其總結為：「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而張之洞是如此區分西政與西藝的：「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西政也。算、繪、礦、醫、聲、光、化、電，西藝也。⁵³」嚴格來說，這個劃分是相當籠統的，但這種三分西學的格局在晚清影響極大，反應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對西學的基礎知識架構。

在「西政」、「西史」的部分主要介紹與西方歷史、政治相關的學門，從梁啟超所編纂的《西政叢書》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對這類學科的分類方式。該書：「專言西國政治，內分八門，一史志、二官制、三學制、四公法、五農政、六工政、七商政、八兵政。⁵⁴」而「西藝」主要是介紹西方自然科學學科，其實也就是之前中國所提格致之學的進一步發展。正如馮桂芬所說的：「至西人之擅長者，歷算之學，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此外「如算學、重學、視學、光學、化學等，皆得格致至理，輿地書備列百國山川厄塞，風土物產，多中人所不及。⁵⁵」從同治五年（1866）美國傳教士丁韞良編譯的《格物入門》中，全書分

⁵² 王西清、盧梯青編，《西學大成》序。

⁵³ 張之洞，「勸學篇·外篇·設學第三」，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市：文海，1966），482 輯，頁 14538。

⁵⁴ 《申報》，1898 年 2 月 14 日，第 4 版。

⁵⁵ 馮桂芬，「采西學議」，宋原放主編；汪家熔輯注，《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武漢市：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頁 13。

爲力學、水學、氣學、火學、電學、化學、測算舉隅等 7 卷。便可以瞭解「西藝」之學的基本架構。而隨著西方自然學科的逐步引進，之後如車善呈在《格致書院課藝》中說：

泰西藝學，如天學、算學、地學、物學、化學、光學、聲學、熱學、電學、醫學、測量繪圖、機器製造紡織、輪艦航海、軍械鐵路礦務等，以至通商貿易事宜，凡百洋貨，紛起疊陳。⁵⁶

光緒十七年（1891）張力臣在《蠡測危言》談到當今西國格致學時，認爲當時已經沒有艾儒略在《西學凡》內談到的各種名目，而應該代之以另外十五種：

言之今西國格致會分十五家，一、天文算學，二、重學及機器之學，三、測量家學，四、植物學，五、農務學，六、數學謂考校貨物出入多寡之數也，七、世務學，八、聲學，九、天時風雨寒暑之學，十、地理學，十一、化學，十二、地內學謂辨別方物也，十三、金石學，十四、人學謂族類肥瘠壽夭之別，十五、醫學，其殫精研思考驗真實皆卓然可觀。其源多出于墨子及關尹淮南亢倉論衡諸書。⁵⁷

以及殷之輅認爲：

考今西國格致會中，所列諸學，如天文學、算學、重學、機器學、測量學、植物學、動物學、農務學、商務學、世務學、聲學、熱學、光學、電學、氣學、地理學、化學、礦學、金石學、人學、醫學等，凡廿餘家。⁵⁸

都相當詳細描繪了當時中國方面對「西藝」之學的認知。

而從《西學富強叢書》中：「廣為搜集西書之有裨于國計民生者，無不畢備，舉凡算學十三、重學一、電學二、化學五、聲學一、光學二、天學二、地學

⁵⁶ 《格致書院課藝》第7冊，頁35-36。

⁵⁷ 轉引自孫青，「晚清之西政東漸與本土回應」（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年4月），頁66。

⁵⁸ 同註57。

一、史志七、法律五、礦政七、工政二十、兵政十五，以西書精華盡薈萃于此。

⁵⁹」

以及光緒十八年（1892），薛福成在其出使法國所記的日記中，談到「西學之最有用者」時提到：「初七日記西學之最有用者，曰幾何學、化學、重學、汽學、熱學、光學、聲學、天文地形學、電學、兵學、醫學、動植學、公法學、律例學。⁶⁰」雖然都偏重於自然科學，但明顯可以看出中國「西政、西史、西藝」的三分格局。

隨著西學譯書之增多及西方現代分科觀念的影響，譯書書目的分類向細密化發展是大勢所趨。不同於四部法的分類體系，譯書書目明顯是以晚清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近代的分科觀念為原則，逐步創建出一套能包含西學書籍的分類系統。因此從以上晚清時期幾位著名的學者對西學的初步分類，我們可以便看出日後譯書書目分類的雛形。

二、綜合型譯書書目分類體系

四部法之最大缺陷是不能以學科門類作為分類標準，不能按照書籍的學科性質歸類。綜合型譯書書目不同於自然科學或宗教譯書書目，因為牽涉到廣泛的學科內容，在分類上更加困難。最早作這種嘗試者，是英國人傅蘭雅。其在清光緒六年（1880）《江南製造局翻譯西書事略》附錄的書目表中設置了 15 個並列的一級類目，完全打破了四部法。對此，蔡元培曰：

英傅蘭雅所作《譯書事略》，嘗著其目，蓋從「釋教錄」之派，而參以「答問」之旨者也。其後或本之以為表，別部居，補遺逸，揭精沽，系讀法，駸駸乎藍勝而冰寒矣。⁶¹

⁵⁹ 《申報》，1901年7月2日，第4版。

⁶⁰ 薛福成著，「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轉引自《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長沙市：岳麓書社，1985），頁590。

⁶¹ 同註42，蔡元培序。

傅蘭雅將所收錄的圖書區分為「算學測量」、「氣機」、「化學」、「地理」、「地學」、「天文行船」、「博物學」、「醫學」、「工藝」、「水陸兵法」、「年代表新聞紙」、「造船」、「國史」、「交涉公法」、「零件」15類。江南製造局的書目不同於自然科學性譯書書目僅針對特定學科而分類，它設置15個並列的一級類目開創對廣泛譯書分類的的第一步，但由於受到譯書主題的侷限，多數類目都屬於自然科學。而且劃分方式也不科學，如「年代表新聞紙」以體裁分不同於其他類目以內容分；「工藝」、「零件」應為同一類；「天文行船」並列有所不當，而排列又無一定次序，因此並未受到後續譯書書目的沿用。一直要到《西學書目表》所開創以「學、政、雜」為主體的3大類28小類的體系，之後多數譯書書目雖然在內容上有所更易，但精神卻大多依循著這個譯書書目的分類體系。

（一）《西學書目表》開創的「學、政、雜」體系

梁啟超在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刊行的《西學書目表》中，將當時所譯西書分為了學、政、教3類。教類是爲了西方傳教士所傳宗教書而虛設，不著錄圖書；而不能歸屬之書，則立雜類以納之。所以《西學書目表》的分類體系實際分爲學、政、雜3大類以及其下的28小類。不同於傅蘭雅在《江南製造局譯書事略》中所採用的一級並列類目，梁啟超在編纂《西學書目表》時採用了二級結構。中國古典書目的分類結構，正如周彥文所說：「中國歷代的書目一向是以二級以上的轄屬結構為正宗的。因為只有二級以上的分類法，才可以把書籍的屬性以及學門之間的關聯性完全的顯示出來。⁶²」書籍統屬於類，類統屬於部，書籍的性質，不可超越於類的定義之外；而類的定義，又不可超越於部的定義之外。藉著這樣的結構，可以清楚明白表示書籍的屬性。《西學書目表》所收列的書

⁶² 同註9，頁107。

籍，其知識內容與文化思維是與中國文化大相徑庭的。正因為如此，梁啟超才自覺地設法擺脫中國古典書目分類的束縛，創造性地建立了「學、政、雜」的3大類分類體系，但梁啟超仍然是試圖以中國古典書目的思維方式來處理西學譯書的。

《西學書目表》上卷為「西學諸書」，其目曰「算學」、「重學」、「電學」、「化學」、「聲學」、「光學」、「汽學」、「天學」、「地學」、「全體學」、「動植物學」、「醫學」、「圖學」。中卷為「西政諸書」，其目曰「史志」、「官制」、「學制」、「法律」、「農政」、「礦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下卷為「雜類之書」，其目曰「遊記」、「報章」、「格致總」、「西人議論之書」、「無可歸類之書」。從《西學書目表》的分類體系來看，我們可以確定的是這與張之洞將西學劃分成「西藝、西政」理念是相當一致的。

梁啟超在《西學書目表》序說：

西學各書，分類最難，凡一切政皆出於學……門類之先後，西學之屬，先虛而後實；蓋有形有質之學，皆從無形無質而生也。故算學、重學為首；電、化、聲、光、汽等次之；天地人（謂全體學）、物（謂動植物學）等次之；醫學、圖學全屬人事，故居末焉。西政之屬，以通知四國為第一義，故史志居首。官制、學校，政所自出，故次之；法律所以治天下，故次之；能富而後能強，故農、礦、工、商次之，而兵居末焉。農者地面之產，礦者地中之產。工以作之，作此二者也；商以行之，行此三者也。此四端之先後也。船政與海軍相關，故附其後。⁶³

梁啟超不固守七分和四部，敢於從西學的實際情況出發設置類目，由此來看，梁啟超將各書總分為3大類：學、政、雜，從這3大部類的劃分中，我們已能大致看出這樣的雛形：學部，即自然科學；政部，實即社會科學；雜部，實即綜合性

⁶³ 同註 29。

圖書。梁氏遠在百年之前就能提出這樣的分類思想，則不能不承認確屬難能可貴。其中政出於學，故學在政前，而雜類附後，這是一個層次。以當時的時代背景，梁啟超將西書中屬於基本學科之書有意識的放在最前面，這與張之洞所說的：「大抵救時之計，謀國之方，政尤急于藝。然講西政者，亦宜略考西藝之功用，始知西政之用意。⁶⁴」將「西政」與「西藝」視為兩個學術體系，梁啟超這種「凡一切政皆出於學」觀念雖然是有問題的，但已經是相當進步的。再進一步，學中各類，又有先後之序，而他認為「西學之屬，先虛而後實。蓋有形有質之學，皆從無形無質而生也，故算學、重學為首，電、化、聲、光、汽等次之。天、地、人（謂全體學）物（謂動植物學）等次之。醫學、圖學全屬人事。故居末焉。」這種順序排列，基本上與西方近代科學各門漸次形成的順序相吻合，考慮到了各門科學之間的內在聯繫。在西政諸書中「史志居首」，這是由於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後，為了救亡圖存，因此士人特別重視史學的作用，史書可作為一種有力的工具，介紹外國歷史以為中國變法的借鑒。梁啟超在其所編纂的《西政叢書》中，一樣是把史志排在最前面。

梁啟超在《西學書目表》中不僅提出了一個嶄新的分類體系，也連帶論述了有關譯書分類的理論方法。除了前述所在序例中所提及的各類的分類標準外，為了避免圖書分類中的分歧，在序例中梁啟超還訂定了一些切實可行的分類規則。例如，他說：「其有一書可歸兩類者，則因其所重。如《行軍測繪》，不入兵政而入圖學，《禦風要術》，不入天學而入船政，《化學衛生論》，不入化學而入醫學是也。」這就是說，要根據圖書內容的重點進行歸類。這條分類規則，直到現在還在分類實踐中被我們採用著。他還認為如「官制、學制、農政諸門，竟無完帙」然「猶列為一門」、「懸其目以俟他日之增益云耳。⁶⁵」《西學書目表》雖仍未脫因書劃類的範疇，但不似傅蘭雅因書少而併其類。足見其劃類乃是根據

⁶⁴ 同註 53，頁 14537。

⁶⁵ 同註 29。

西學整體做了考慮，因而類目排列，也較成系統。之後如《譯書經眼錄》在「工藝」類下分爲「首工學次塘工河工路工次汽機次雜工次雜藝⁶⁶」5類，但僅收錄《修路說略》一書。都是接受《西學書目表》開始的懸目作法。

而除了序例的說明外，梁啓超在有的類目下還有說明，如算學類下注：「由淺入深，故先以數學。先理後法，故次以幾何，凡諸形學附焉。次代數，通行之算也；微分積分非深造不能語，故以終焉。」又如在醫學類下注：「先內科、次外科、次藥方、以衛生諸書終焉。⁶⁷」這種簡略的說明雖然不比真正的類序，有對學科的闡釋與說明。但相當於現代分類法中的類目注釋，同時又有進一步細分的含義，而它的先後次序，也是比較合理的。這種方式也被日後的譯書書目所繼承，如《東西學書錄》以及《譯書經眼錄》都採取了相同的作法。

（二）分類體系的細化

《西學書目表》在分類上基本採取了張之洞「西藝、西政」的分類格局，但也根據梁啓超自己的對西學的詮釋而加以變化。自從《西學書目表》以來，此後各種譯書書目在精神上大體都接受了這種排列，只是略作修改而已。如徐維則作《東西學書錄》，便說：「東西學書，分類更難，言政之書，皆出於學，言學之書，皆關乎政，政學不分，則部次奚定。今強為區別，取便購讀，通人之消，知難免矣。⁶⁸」仍然是保留了學政二分的觀點。而最大的差異在於之後的譯書書目多取消了《西學書目表》學政雜三大類劃分，直接將梁啓超在二級類目中使用的原則應用到一級類目來，分類趨向是越來越細。如胡兆鸞編纂的《西書考》分爲30個大類；黃慶澄所編纂的《中西學普通書目表》西學類分爲23大類；《江南製造局譯書提要》、《上海製造局譯印圖書目錄》則將書籍分爲24類都是相同

⁶⁶ 顧燮光編，〈《譯書經眼錄》〉。

⁶⁷ 梁啓超編，〈《西學書目表》〉。

⁶⁸ 同註42。

的作法。而如徐維則、顧燮光所編纂的《東西學書錄》、《增版東西學書錄》、《譯書經眼錄》除了將《西學書目表》二級類目中的原則應用到一級類目來，各分為 25、31、28 個大類外，其下每大類更分有子目。如《增版東西學書錄》在「政治法律」下分為：「首政治次制度次律例次刑法⁶⁹」4 個小類，總計共有 87 小類；《譯書經眼錄》則更為精細，在「政治法律」下分為：「首政治次憲法次財政次經濟次警察次法制次法學次法律⁷⁰」8 個小類，總計共 91 小類。如《法國律例》一書在《西學書目表》為「法律」類；在《增版東西學書錄》為「政治法律」下「律例」類。《富國策》一書在《西學書目表》為「商政」類；在《增版東西學書錄》為「商務」下「商學」類。而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王景沂編纂的《科學書目提要初編》其下分為「政治」、「文學」、「武備」、「格致」、「農業」、「工藝」、「商業」、「醫術」8 科，子目達 48 種。以及譯書書目最初分類是單項並列關係，然後逐漸出現交叉的多邊關係，如光緒二十九年（1903）通雅齋所編的《新學書目提要》中，商業學和地理學交叉，出現商業地理學類；商業和歷史學交叉，出現商業歷史學類；商業學和法學交叉，出現商法學類；又如農業化學、醫律學（法醫學）等等。在在都反應了分類體系與類目逐漸細化的現象。

由於西方自然科學引進的較早，中國方面對屬於西藝部分的自然科學譯書分類上已有相當共識，所以後續出現的譯書書目對《西學書目表》中的「學類諸書」的分類並沒有太大變化。其中影響比較大的有西學書目表第二十六「格致」一類，自胡兆鸞《西書考》而改為「格致總」置於群學之首，大體相當於現今分類的「自然科學總類」安排較為合理，之後譯書書目也多依循《西書考》的分類模式。如徐維則顛倒《西學書目表》學政次序，以政為先。「格致總」為《增版東西學書錄》的第十一類。因此實為在學類子目之首。而《譯書經眼錄》則以

⁶⁹ 徐維則編；顧燮光增補，《增版東西學書錄》。

⁷⁰ 同註 66。

「理化」冠於學類之首，也是因物理化學為自然科學的基礎，相當於「格致總」的涵意。

有人在為沈兆煒的《新學書目表·法制類》作跋時說：「吾長慨念同光之始，吾中國之吮歐學者，藝學而已，至甲午而政學之新研發，戊戌而哲學之智炬燭。庚子大創而歐花怒發，亞草咸莢。⁷¹」這反應了在西學中政治相關學科較晚傳入的事實。因此在《西學書目表》中政類各子目的排列和名稱較之「學類諸書」就來得有些問題，其原因在於：一是這些學科在西方發展較晚，有的尚在形成之中；二是梁啟超還未擺脫中國傳統學術的影響，以有關國計民生的學問為「政」。所謂「民無恆產，則國不可理，於是乎有農政、礦政、工政、商政…⁷²」；三是梁啟超為推動維新變法，而新政的內容不外乎是改官制，辦學校，訂憲令，立議會，築路開礦，發展工農商業，以求富國強民，從《西學書目表》中的政類內容來看，是相當符合的。最後則是這種認識的侷限將所謂政類中諸門學問與「學」類生硬地分開，乃至於「農」、「礦」、「工」、「商」等實業亦被視為「政」之一項，結果造成了許多麻煩。但後來的譯書書目也接受下來了，名稱及排列多有沿襲，這種情況，倒也從反面說明《西學書目表》在譯書書目上的分類的影響和地位。

直到光緒二十九年（1903）沈兆煒編纂《新學書目表》時，這種困惑看來似乎仍未解決：

今日之著書陳義，欲以見諸施行者，專門之言則曰「政學」，策世之言則曰「政論」。顧求其界域，則旁衍方滋，每多泛濫，必欲劃為一定之範圍，抑又隘矣。譬如學校管理之方，理財經濟之術，權利義務之說，進化現勢之篇，於事實皆與政界相關，於目錄則與政談不合，如改附他類，則穿鑿必深，另立一門則冗雜尤甚，別裁之用，于是為難。⁷³

⁷¹ 沈兆煒編，《新學書目表》法制類，趙祖德序。

⁷² 梁啟超編，《西政叢書》序。

⁷³ 沈兆煒編，《新學書目表》。

而在《西學書目表》之後的譯書書目，以《增版東西學書錄》首先在政類諸書的部分做出改動。和《西學書目表》相比，《增版東西學書錄》在政類的部分減少了「官志」類，增加了「交涉」、有些類目的類名，略有改動。如「學制」改爲「學校」，「礦政」改爲「礦務」，「工政」改爲「工藝」，「商政」改爲「商務」，「兵政」改爲「兵制」，「西人議論之書」改爲「議論」，此外，原「法律」加入政治，更名爲「政治法律」。如《萬國公法》一書在《西學書目表》爲法律類；在《增版東西學書錄》爲「交涉」下「公法」類。《列國歲計政》一書在《西學書目表》爲「史志」類；在《增版東西學書錄》爲「政治法律」下「政治」類。但徐維則和梁啓超，都沒有把討論政治哲學、政治理論的書籍歸入政類諸書的相關類目中，如《治國要務》、《時事新論》、《新政策》等，而是另列「西人議論之書」、「議論」類目。孫青認爲這顯然和當時人們對於「政治」的理解有關，「政治學」應該是不包括學理的制度性知識。⁷⁴此分類雖仍與《西學書目表》有相似的問題，但是卻是譯書書目對政類諸書分類率先的改動嘗試，作爲後續譯書書改進的依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如梁啓超的《西學書目表》雖然受到早期譯書中小說數量不多的關係，並無設置小說相關類目。但梁啓超引用康有爲的話：「僅識字之人，有不讀經，無有不讀小說者。故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入，當以小說入之；語錄不能諭，當以小說諭之；律例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梁啓超又說：「然則小說學之在中國，殆可增七略而爲八，蔚四部而爲五者矣。⁷⁵」可以看出他對小說的重視程度，以及希望小說所發揮之廣開民智之功效。當時時人也說：「科學小說者，文明世界之先導也，世有不喜科學書，而末有不喜科學小說者，則其輸入文明思想，最爲敏捷。⁷⁶」由於小說在西學譯書中所佔數

⁷⁴ 同註 57，頁 112。

⁷⁵ 梁啓超，「譯印政治小說序」，張靜盧輯註，《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補編（上海市：上海書店，2003），頁 105。

⁷⁶ 包天笑，《鐵世界譯余贅言》，1903 年。轉引自李素楨、田育誠，「論明清科技文獻的輸入」，《中國科技史料》第 14 卷 3 期（1993）：頁 17。

量增加，《增版東西學書錄》與《譯書經眼錄》都設立有「小說」類目。《增版東西學書錄》是在雜著下的二級類目：「先雜記次小說次瑣錄次叢編⁷⁷」。《譯書經眼錄》將小說提升到一級類目，其下分爲：「首政治次科學次偵探次兒女次冒險次神話次社會次理想⁷⁸」。如《百年一覺》一書在《西學書目表》爲無可歸類之書；在《增版東西學書錄》爲「雜著」下「小說」類。

（三）自行其道的《日本書目志》

康有爲《日本書目志》的分類體系在綜合型譯書書目中是頗具特色的。《日本書目志》整個分類體系共有兩級類目。康有爲首先將所收錄的圖書歸入 15 門即大類，共分爲「生理」、「理學」、「宗教」、「圖史」、「政治」、「法律」、「農業」、「工業」、「商業」、「教育」、「文學」、「文字語言」、「美術」、「小說」、「兵書」。每門又分若干小類，如「商業門」下有「商業歷史」、「商業地理書」、「商業書」、「銀行書」、「貿易書」、「交通書」、「度量衡書」、「相場書」、「簿記書」9 小類，15 門總共有 246 小類。

《日本書目志》的分類與梁啓超《西學書目表》3 大類 28 小類相比是來得更爲詳細。在《日本書目志》的分類體系中，二級類目的劃分詳細。部分大類的小類排列次序是依照從總論到分論的原則，條理明晰，體現康有爲在分類上的科學性。

我們從《日本書目志》的分類系統可以發現出一些特點，首先，康有爲在立類時明顯受到了如前章所提維新變法的編纂思想影響，他認爲「天之道曰陰與陽，人之道曰生與殺，教化治亂之進退消長，視生殺之分數多寡。」他還認爲「兵者殺道，亂世之極也。」所以把「兵書」門列爲最後大類；而「醫者生道，

⁷⁷ 同註 69。

⁷⁸ 同註 66。

太平之極也」、「大治在於醫⁷⁹」故以「生理」門冠於篇首，列為第一大類，雖然從科學角度上來看並不妥切，但恰恰表現了康有為強烈的救國之心。他認為中國是一個急待救療的病夫，而療教之道在於日本成功引進西方的科學新知識，因而大力的提倡醫道。而在「兵書」門類序中，他宣揚了軍力的強大要靠「變舊俗，開新學。⁸⁰」強大的國防力量是要建立在人民的素質上，所以將兵書門置於最後。另外康有為首開先例設立「小說」門，在類序中高度讚揚了小說的教化功能。他介紹說「泰西尤隆小說學哉」、「經義史故極宜譯小說而講通之⁸¹」。他鼓吹小說在圖書分類體系中的地位，是希望藉由小說達到啓迪民智的作用，雖然將小說自「文學」門中分離出來並不恰當，但正反應了譯書書目的分類系統受到編纂者試圖藉由書目所傳達的思想影響。如梁啓超的《西學書目表》雖然受到早期譯書小說數量不多，並無設置相關類目，但從梁啓超大力鼓吹：「然則小說學之在中國，殆可增七略而為八，蔚四部而為五者矣。⁸²」便可得知一二。

其次是康有為《日本書目志》的分類用語上與同時代的譯書書目有很大區別，沈國威認為這主要是由於《日本書目志》直接取材於日本書肆的圖書目錄，基本上並沒有做過改動，是原封不動地照搬。例如，當時日本書肆的圖書目錄較常見的以某某門進行分類，排列方式一般是豎排，依次為書名、冊數、著譯者、定價。《日本書目志》的版面完全相同。⁸³而根據沈氏的考証，《日本書目志》的各類書名中使用了大量的日本新詞，而這些日本新詞與當時中國的使用用語上是有若干差別的。如其中第五卷「政治」門中所涉及的日本新詞就有：

社會制、憲法、政体、選舉法、立憲、代議、請愿、預算、內閣、政党、裁判、主權、警察、取締、財政學、會計法、社會、進化論、社會

⁷⁹ 康有為編，《日本書目志》生理學類序。

⁸⁰ 康有為編，《日本書目志》兵學門類序。

⁸¹ 康有為編，《日本書目志》小說門類序。

⁸² 同註 75。

⁸³ 沈國威，「康有為及其日本書目志」，*Journal of studies on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West* 五號（2003）：頁 66。

學、進步、退步、經濟學、保險、統計學、特許、意匠、商標、信用組合、殖民論、家政學等等。⁸⁴

因此《日本書目志》有部分分類造成了意思上的誤差，而康有為並沒有能力察覺。如「政治」門中收錄有「家政學」一類，但其中以料理法、裁縫書為主，這明顯的疏誤應當為康有為望文生義而改動，也可以推測他並沒有見到實書。以及康有為在「社會學」類下說到：「大地上，一大會而已。會大群，謂之國；會小群，謂之公司，謂之社會。⁸⁵」日本人以「社會學」三個漢字組成新詞來翻譯「Sociology」，但是康有為在《日本書目志》社會學目下的按語中，卻顯然把它解讀為集社、成會、建黨等組織民間議政團體的學科，康有為的認定其實與社會學類圖書的內容有相當出入。而最大的問題出現在第二卷的「理學」門中，「理學」門中收錄了「理學總記」、「理科學學校用」、「物理學」、「橫文物理學」、「理化學」、「化學」、「橫文化學」、「分析書」、「天文學」、「曆書」、「氣象學」、「地質學」、「礦山學」、「地震學」、「博物學」、「生物學」、「人類學」、「動物學」、「植物學」共 19 類的自然科學圖書，但也收錄「哲學」、「橫文論理學」、「心理學」、「倫理學」4 類人文科學圖書。在分類系統上將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收入在同一類中，已值得商榷，更何況兩者所涉及的學科內容更是天差地遠，這是《日本書目志》在分類上相當大的謬誤之處。沈國威認為這是由於日本在江戶時代是用「理學」指稱「自然科學」，但明治時期，也有學者是以「理學」來翻譯西方的「Philosophy」，康有為可能是受到日本當時的觀點而同時沿用。⁸⁶由於康有為在「理學」門並無說明立類與收錄圖書的依據，沈國威的看法是相當可信的。

沈國威的研究証明了康有為在轉抄日本書肆的書目廣告編輯他的《日本書目志》時，未必見過這些具體的書籍。其所加類序也顯示了康氏在對日文書名望文

⁸⁴ 同註 83，頁 61。

⁸⁵ 康有為編，《日本書目志》。

⁸⁶ 同註 83，頁 57。

生義的過程中，產生了許多誤解。因此《日本書目志》與其他譯書書目相比，為中國提供了另一種西學分類的圖景，反應了當日本人早先譯介西籍時，將一些與中文同形的漢字重新組合來翻譯西方的概念。而通過日本了解西學的中國知識分子，又大多不能閱讀西文，因此他們就對這些重新組合了的漢語新詞望文生義來揣摩西學學科分類的架構。康有為的《日本書目志》就呈現了這種非常奇特的塑型。也就是如孫青所說：

康氏的設想，後來被清末留日學生付諸實施。日本書肆流行的這種圖書分類體系，雖然是一種出於商業銷售目的做法，遠非日本知識界對於西學的主流意見，但是它卻經由《日本書目志》及後來依據《書目志》而實施的大規模日文譯書活動，對國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⁸⁷

⁸⁷ 同註 57，頁 47。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譯書書目在中國目錄學史上的源流

中國古典目錄學的理論及其特質，主要是在清以前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的，隨著歷代文化的演進而產生變化。在近代面臨到西方文化的衝擊，由於文獻環境的改變，以收集譯書為己任的譯書書目是中西、新舊知識交替的特殊產物，譯書書目大多為中國學者所編撰，在思想上雖延續著中國古典目錄學的精神，但是由於所譯書籍種類繁雜、內容新穎，早已非中國古典目錄學所能涵蓋。在編纂上勢必得採用不同的分類方法與著錄體制，因此具有強烈的時代特性。由此可知譯書書目實為中國古典目錄學向現代過渡的橋樑，雖然其發展的時間並不長，理論也不系統，在中國古典目錄學中，並不能作為主要的書目類型及理論依據，但卻意義深遠，理應在中國目錄學史上具有一席之地。

長期以來，目錄學史的研究一直是中國目錄學研究的重點領域，學者的主要關注焦點多放在歷代目錄學思想的發展和理論成果。然而也有許多學者認為目錄學史中純粹「史的研究」的狀況，制約了當代目錄學的思想革新，而提出了新的觀點。倡導將目錄學史與傳統文化背景和哲學思考相結合，從文化史的角度對目錄學進行研究，認為此舉將能夠改變整個傳統目錄學研究的面貌，也可影響和推動中國目錄學史的進一步研究。¹本研究即以此觀點為出發，希望藉由對譯書書目的探討，將譯書書目的發展與時代聯繫起來，描繪出目錄學研究的新風貌。

¹ 參考朱天俊，「目錄學研究中若干問題的思考」，《中國圖書館學報》第 18 卷 4 期（1992）：頁 11-15；錢振新，「近年來目錄學研究動態的回顧與思考」，《情報資料工作》3 期（1993）：頁 18-20；薛旻、王娟，「1998 年以來目錄學史研究綜述」，《圖書館》3 期（2004）：頁 26-29。

一、譯書書目產生的歷史背景

本研究首先在第貳章經由考察明至清末的譯書活動所涵蓋的各個層面，釐清譯書在西學傳播脈絡中的實際情況與涉及的環節，並藉由對當時中國古典目錄學重要著作如《四庫全書總目》與《書目答問》是如何因應西學而變化，瞭解譯書書目發展的背景。明至清末的中西文獻交流活動，譯書內容廣泛、數目巨大、譯者眾多、機構龐雜，呈現出一派紛繁複雜的局面。從傳播主體看，除了傳教士外又有國內的各種社會力量。林則徐、魏源代表了國內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先進知識分子；以李鴻章、張之洞為代表的洋務派；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變法派以及留學日本、歐美的學生陸續都成為傳播西學文獻的主導力量。總體來說，在介紹西學傳入、翻譯西書方面，傳教士的目的在於宗教思想的傳播，以宗教書籍為主，西方科學知識只是學術傳教下的輔助工具；而洋務派的目的在於中體西用，保留祖宗之法和中學之體，以西方的科技協助中國進步；維新派則著眼於社會政治改革，注重介紹西方的社會政治學說，以其為變法的基礎。這三種力量的出發點不同，著重點各異。但前後聯繫來看，便呈現了西學的漸進趨勢，反應圖書編譯範圍的逐步擴大和學術層次的提高，也使得以譯書為主體的譯書書目一再地嬗變。從中我們瞭解到徐光啓的《曆書總目表》是明清之際西方曆法傳入的成果；王韜的《泰西著述考》收錄傳教士的著述、傅蘭雅《江南製造局譯書事略》反應洋務時期政治力量的介入；康有為《日本書目志》、徐惟則《東西學書錄》、顧燮光《譯書經眼錄》兼收東西學譯書。這些譯書書目蘊育、成熟、轉變的軌跡，正是西學在近代中國的輸入引進的始末。

二、譯書書目的類型與體制淵源

緊接著在第參章以譯書書目的類型為開端，將譯書書目根據收錄書籍內容分為專科型及綜合型，其中專科型譯書書目又可分為宗教、自然科學兩類。而綜合

型譯書則是更加擴大所收錄的書籍，除了宗教、自然科學外，廣及社會科學、語言文字、教育、文學等。而除了這兩類譯書書目外，尚有江南製造局及廣學會，針對所出版的譯書，集結而成的出版目錄。透過對譯書書目類型、著錄方法、類序應用、著錄項目的考證，不僅對譯書書目的基本情況與類別有了相當程度的認識，也對譯書書目著錄體例的淵源更加瞭解。譯書書目由於所收多是西方新知識，就需要利用類序與提要這種中國古典目錄學用以闡明學術源流、抒發見解的獨特形式加以介紹，如《新學書目提要》成書的有法制、歷史、輿地三類，每類都有一篇類序，同時在最早出版的法制書目卷首有總序一篇。《科學書目提要初編》分為「政治」、「文學」、「武備」、「格致」、「農業」、「工藝」、「商業」、「醫術」8科，下分48子目。每小類均加按語，概述本目所錄主要內容、學術價值。而《日本書目志》因襲《漢志》體例，無提要而重類序。其「自序」及「農工商總序」可視為全書目的總序，15個大類有8篇大序，即二分之一大類有類序，246個小類，共有88篇小序，即三分之一的小類有類序。康有為則為《日本書目志》寫了約三萬三千字的類序。²譯書書目更普遍編有提要，其原因主要是由於明末開始進入我國的西學對廣大民眾來說還是十分陌生的知識，有了提要就可以有選擇地進行學習。提要的形式多樣，有的指明讀書要領，言簡意賅；有的提要較詳細，不僅指明圖書的價值與用途，還揭示圖書的主要內容。譯書書目編纂者為了達到推廣西學的目的，雖然所著錄的內容大異於中國傳統典籍，但仍延續了中國古典書目這種以類例、類序、提要考辨學術源流派別的特性，也就是傅蘭雅所說的：「仍舊例以賅新籍。³」

² 孟昭晉著，「康有為的書目實踐」，孟昭晉，《書目與書評》（石家莊市：河北教育，2004），頁44。

³ 傅蘭雅編，《江南製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

三、譯書書目的分類理念

本研究在第肆章藉由對譯書書目分類系統的探究，來考察當時中國本土的知識份子是如何依據中國學術傳統，去構築那個迷惘下的西學學術體系。編纂譯書書目的人物大多是中國知識份子中的菁英，當他們在轉向傳統尋求相應的知識分類架構去接引西學之時，突然發現中國劃分知識的傳統與西學間的格格不入。作為當時中國文化的承載者，他們依據傳統解讀西學的方式和途徑也就非常複雜多樣。在西方學術的影響之下，中國傳統學術也出現了門類擴大和細化的趨勢，而這也使得作為中國傳統學術縮影的書目分類逐漸產生變化。

中國書目傳統的四部法自東晉李充創立，雖不至於如同時人所說「秘閣以為永制⁴」，但長期以來一直都是公私藏書書目所主要遵循的方向。但是它的最大缺陷就是不能統一按照學科分類，缺乏邏輯性和客觀性。而這些西學譯書從基本文化思維特徵來看，它們無疑是和中國的傳統典籍、文化有著重大差別的。雖然一開始的宗教性譯書書目都採取了「以書類人」的方式，並不注重分類。但後續譯書書目編纂者在處理涉及到不同學科的譯書便遇到很大的難題。梁啟超《西學書目表》序中講道：「西學各書，分類最難。⁵」徐維則在《東西學書錄》序中也說：「東西學書分類更難⁶」。憑藉從新式學堂所傳入的西學學科以及中國學者通過對西方諸類學術的介紹和研習，譯書書目的編纂者逐漸有了心得。一方面自然科學性譯書書目採行的分類依據譯書的科學性質。一方面自從《西學書目表》在分類上基本採取了張之洞「西藝、西政」的分類格局以後，以後的綜合型譯書書目也都採取了相似的體系。梁啟超從西學的實際情況設置類目，其分類體系實質上是因應當時科學發展下的產物，反映了時代的思潮，這正是其進步的獨特地方。因為他設立學、政、雜，徹底衝破四部法的藩籬，開創了一個嶄新的分

⁴ 《晉書》，卷九十二《文苑傳·李充》。

⁵ 梁啟超編，《西學書目表》自序。

⁶ 徐維則編，《東西學書錄》自序。

類體系。形成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綜合性圖書 3 大類的基本雛型。

參、肆兩章分別從譯書書目的外在特徵（體例）與精神內涵（分類系統）兩部分探討。本研究希望做的，就是通過考察明清時期譯書書目的產生、發展過程，具體而微的呈現中國古典目錄學轉型之初的複雜歷史圖景。

第二節 譯書書目的過渡性質

近代西書中譯從明末清初主要著眼於西方科學理論開始，到晚清從實用技術知識向哲學史學的轉變，反映了由抽象到具體，又由具體到抽象的歷史發展軌跡，以收集譯書為己任的譯書書目成為了新舊知識交替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的特殊產物。傅蘭雅、梁啟超、徐維則等人所編纂之譯書書目，均以編纂者個人對近代西學的認知進行圖書分類。因為人們對西學理解的分歧，不可避免的，同樣會造成圖書分類之混亂，故存在著較大侷限性。同時他們所作之書目分類，主要是對西學譯書的分類，並沒有涉及到中國傳統典籍。故難以適應近代圖書分類以及中西圖書混編之需要。正因如此，這種過渡時期之分類，必然要被更科學之西方分類法所取代，「所以到西洋杜威十進法傳入中國，經過改良以使適合部次我國典籍後，這些過渡時期所創訂的分類，遂歸於淘汰，沒有人再沿用它們。⁷」但是譯書書目部類名稱的變化和分類體制的嘗試，對中國圖書文獻的重心思考歸類，乃至今天各圖書館所使用到的統一分類法的誕生，應該有著深遠的意義。如清光緒三十年（1904），徐樹蘭編成《古越藏書樓書目》，這部書目在中國目錄學史相當重要。書目中將當時中西書籍歸在一起分為政、學 2 部共 47 類 331 子目，做到中外典籍統一立目。將中外典籍分為學部、政部，即在梁氏的西學分類基礎上進而搜求中西書書籍混合編目。

總的說來，由於身處中國歷史發展過程的極遽變化的時代，平心而論譯書書

⁷ 昌彼得、潘美月著，《中國目錄學》（臺北市：文史哲，1986），頁 232。

目是一個特定歷史過渡時期的產物，並不具備經過深思熟慮的成熟形態，所以除了在分類體系上大異於中國古典書目之外，基本上仍然是古風猶存的書目體制。譯書書目以傳統的類序、提要宣揚西學思想，與其說是追求契合傳統形式便於爭取國民的支持；不如說是在無西方目錄學可資借鑒的情況而求其次的作法，也從某種程度反映出人們普遍的困惑。⁸但作為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譯書書目的歷史作用也同樣不能被忽視。

第三節 譯書書目的學術價值

一、譯書書目的歷史作用

中國目錄學家歷來重視書目在指導人們讀書治學上的作用。清代學者王鳴盛就曾說過：「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⁹」梁啟超則進一步指出：「著書足以備讀者之顧問，實目錄學家最重要之職務也。¹⁰」書目本身具有控制文獻、辨章學術的功能，用它來推薦文獻、傳播思想、學術，可說是相當適切的。譯書書目是圍繞傳播西學這一主要目的，適應當時社會、政治、文化發展的需要而編纂的。這些書目的編纂與當時時代、社會的發展變遷緊密地聯繫著。如早期的宗教譯書書目編撰者都為教徒或傳教士，其編撰譯書書目的目的自然是為了宣傳教義，擴大傳教範圍。正因如此，西學與中國固有的儒家思想的紛爭也反映到譯書書目上。保守派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精神下編纂譯書書目。維新派則企圖以譯書書目傳達變法思潮，廣開民智。如康有為「撮其精要，剪其無用，先著簡明之目，以待憂國者求焉。¹¹」梁啟超先後編纂《西書提要》、《西學書目表》、《西學書目表劄記》、《讀西學書法》，希望

⁸ 閔定慶，「維新派目錄學的文化內蘊」，《學術研究》3期（1994）：頁87。

⁹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一。

¹⁰ 梁啟超著，「佛家經錄在中國目錄學之位置」，梁啟超著，《飲冰室文集》第67冊（北京市：中華書局，1927）頁128。

¹¹ 康有為編，《日本書目志》自序。

藉以構成一個完整的推薦書目的功能體系，不僅說明各類目乃至一些具體書籍的學術源流、優劣短長。而且標示「某書宜先讀，某書宜晚讀。¹²」指導讀者具體的閱讀活動，導讀的最終目的則是為了實現其國富民強的改良主義理想。在當時確實起到了指導學術門徑，宣傳圖書的客觀效果。所以當時學者甘雲鵬肯定該書目說：「部次門類，識別優劣，頗便初學，欲尋西學軌途，固無逾是書者。¹³」隨後梁啟超的《東籍月旦》也是為那些「學東文能讀書者……顧恨不得其途徑。¹⁴」者而編。

此外，黃慶澄編撰的《中西普通書目表》適應了光緒二十四年（1898）清朝改變科舉辦法，廢止八股取士的需要，為科舉之士而編的。其他如《算學書目提要》與《農務要書簡明目錄》的編纂也是因應當時宣導農學和算學的需要。由此可以看出譯書書目雖然編纂思想各有其所異，但在當時都發揮了傳播西學，促進社會變革的歷史作用。

二、譯書書目的史料價值

譯書書目的價值不僅在於歷史上它所發揮的作用，而且還在於它所具有的史料價值。西學輸入中國，大體可以說有三種途徑：辦學堂請人講學；出洋考察或留學；譯書。然而，無論是請人講學或留學考察，其成果終歸落實於文字，來華任教者的講義也多翻譯成書，如傅蘭雅、丁韞良等人授課用書多有譯本。因此譯書可說是明末以來西學輸入的主要途徑。因此相當多學者在進行有關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時，都透過了對譯書的內容與數量的探究，做為研究的基礎。然而明清譯書，由於在政治、社會各種原因的紛擾下而保存下來的並不完整，顧燮光

¹² 同註 5。

¹³ 甘雲鵬，「西學書目表序」，轉引自艾克利。「論梁啟超的新學書目」。《西安外國語學院學報》第 7 卷 1 期（1999）：頁 66。

¹⁴ 梁啟超編，《東籍月旦》自序。

在《譯書經眼錄》序中已有「此所著錄，迄求諸坊間，煙沒始將半矣。¹⁵」的感歎。那麼可想而知至今日所能苟存者，數量應該是更加稀少。而譯書書目經過編纂者的整理，基本上已保存了當時各學科譯書的資訊，可作為後代學者研究的基本依據。如在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中佔有相當重要地位由錢存訓所發表的《近代譯書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¹⁶，便是依據徐維則《東西學書錄》、顧燮光的《譯書經眼錄》等譯書書目運用計量目錄學的方法來分析西學的傳播內容。而部分譯書書目的編纂者更是根據其整理提出對譯書翻譯情況的描述，如梁啟超說到在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前，西學書籍的翻譯情況：「始事迄今，垂三十年，而譯成之書不過百種。¹⁷」又統計「中國官局所譯者，醫學類為多。」而各地製造局，則以工藝為多，「惟西政各籍，譯者寥寥，官制、學制、農政諸門竟無完帙。¹⁸」因而指出，不能依賴官方輸入西學。又如徐維則指出：「惟公法公理、格致之書中國極少，後之譯者當注意於斯。¹⁹」顧燮光亦據其統計情況指出：「惟礦學、醫學兩種，甚乏新譯，富國強種，均當務之急，有心人盍起圖之。²⁰」這些經由譯書書目所記錄的譯書資訊，正有助於後代學者在相關議題上的深入探索。

除了透過譯書書目所蒐集譯書的數量、種類、譯者、著者等圖書外在表象來瞭解西學傳入的情況外。譯書書目的編纂者利用類序與提要對譯書的內容多有著墨，在當時希望發揮推薦圖書、指導閱讀的作用。而在如今，這些經由譯書書目編纂者所寫出言簡意賅的文字便成為我們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相關議題的豐富資訊。

因此，明末清季時期的譯書書目，不僅本身即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同時藉

¹⁵ 顧燮光編，《譯書經眼錄》序

¹⁶ Tsuen-hsuei Tsien, "Western Impact on China through Translation," *Far Eastern Quarterly*, 8 : 3(May 1954), 305-327.

¹⁷ 梁啟超，「大同譯書局敘例」，宋原放主編；汪家燊輯注，《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武漢市：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頁 225。

¹⁸ 同註 5。

¹⁹ 徐維則編；顧燮光增補，《增訂東西學書錄》徐維則序。

²⁰ 同註 15。

由譯書書目所蒐集譯書的數量、種類、譯者、著者等圖書外在表象，以及包含譯書內容的提要與分類系統等譯書書目的內在意涵，都有助於我們在明清時期西方文化之輸入過程中出現的許多問題，做出較為客觀而準確的評價，作為我們研究近代中外關係史、宗教史、學術史、出版史和翻譯史的珍貴史料。

附錄一：譯書書目書影

泰西著述考

長洲 王韜 仲弢甫輯撰

西洋葡萄牙國自明武宗正德十二年始與我中國通商立埠於廣東之澳門由是歐洲各國接踵東來不但賈舶商踪相繼不絕於道而傳教之士亦復懷鉛握槧而至挾其天算輿地之學與名公鉅卿相交際爭以著書立說以自鳴高於是我中國始知地球爲圓體秣算格致於焉日啟西學之入中國實自此始余嘗得其目錄觀之獲傳於世者約略二百十一種亦可云富矣當時著名之士凡九十有二人文辭爾雅彬彬乎登述作之林蓋自東西兩海道通以來約百有餘年所至者皆天教會中之修士凡其初至之年所著之書及其卒葬處所無不班班可考爰爲釐次其姓氏詳述其著作以臚於篇用爲談海外掌故者廣厥見聞云

泰西著述考

1. 《泰西著述考》，王韜編，清光緒十六年（1890）鉛印本。

華蘅芳序曰：余既與西士傳蘭雅譯畢代數術二十五卷，更思求其進境，故又與傅若譯此書焉。先是咸豐年間，曾有海甯李壬叔與西士偉烈亞力譯出代微積拾掇一書，流播海內，余素與壬叔相友，得讀其書，粗明微積二術之梗概，概所以又譯此書者，蓋欲補其所略也。書中代數之式甚繁，核算不易，則劉君省卷之力居多，今刻工已竣矣，故序之曰：吾以為古時之算法，惟有加減而已，其乘與除乃因加減之不能其繁，故更立二術以使之簡易也。開闢方之法，又所以濟除

法之窮者也。蓋算學者自有加減乘除開方正法，而一切淺近易明之數無不可通矣。惟人之心思智慮日出不窮，往往以能人之所不能者為快，遇有窒礙難通之處，輒思立法以濟其窮，故有減其所不可減而正負之名，不得不立矣。除其所不受除而寄母通分之法，又不得不立矣。代數中種種記號之法，皆出於不得已而立者也。惟每立一法，必能使繁者為簡，難者為易，速者為遲，而算學之境界藉此得更進一層。如是屢進不已，而所立之法於是乎日多矣。微分積分者，蓋又因乘除開方之不勝其繁，且有窒礙難通之處，故更立此

二術以濟其窮，又使簡易而速者，以觀圓徑求周真數求對數等事，雖無微分積分之時，亦未嘗不可求，惟須乘除開方數十百次，其難有不可言喻者，不如用微積之法，理明而數捷也。然則謂加減乘除開方代數之外，更有二術焉。一曰微分，一曰積分，可也。其積分術為微分之還原，由猶之開平方為自乘之還原，除法為乘之還原，減法為加之還原也。然加與乘其原無不可還，而微分之原，有不可還者，是猶算式有不可開之方耳。又何怪焉。如必曰加減乘除開方已足供吾之用矣，何必更求其積，是舍舟車之便利而必欲負

重運行也。其用力多而成功少，蓋不待智者而辨矣。葦里司

2. 《天文算法考》，梁兆鏗編，清光緒年間稿本。

化學定性分析書	久原 高木	六〇	日本氣候學	小出	一〇
分析化學	生田 高木	五〇	中編博物學	今村	三
定性分析	平野 河村	九五	新編博物學	藤井	四
定性分析	山田	五五	實驗博物學	白井	三
生理化學分析法	高坂	九五	新編博物學	大石	三
四全書天文學		二五	實編博物學	大石	三
初等教育小天文學	文部省	一八	中編博物學	高橋	三
初等教育小天文學	文部省	一一	中編博物學	高橋	三
普通天學新書	敬業社	一五	新編博物學	高橋	三
天文學新書	富山房	二〇	中等教育博物學	山崎	五
百科全書歲時計	文部省	一三	中等教育博物學	山崎	五
歷日諺解	柳務省	一三	新撰博物學	長坂	三
太陽兩歷對照表	內務省	一四	小學博物學	堀坂	五
和洋對照表	撫蘭軒	三六	日本博物學	堀坂	五
五氣象學		五〇	日本博物學	須永	二
中央氣象臺		五	日本博物學	須永	二
日天氣圖	大川	八〇	物理學問題	白井	一
天氣圖	大川	八〇	物理學問題	白井	一
氣象學	橫山	一〇	物理學問題	白井	一
氣象學	橫山	一〇	物理學問題	白井	一
農家須知氣象觀測法	文部省	一八	通信教授生物學	岩好	六
農家須知氣象觀測法	文部省	一八	通信教授生物學	岩好	六
氣候論	井上	二六	進化新論	石川	二

3. 《日本理學書目》，杜亞泉編，載於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亞泉雜誌七期。

西學書目表上	
書名	撰譯年號 撰譯人 刻印處 本數 價值 識語
算學	由淺入深故先以數學先理後法故次以幾何凡諸形學附焉次代數通行之算也微分積分非深造不能語故以終焉
筆算數學	光緒元年 狄考文 鄒立文 益智書會本 三本 一元 用俗語教學實甚便惟習問太繁
西算啟蒙	一本 一角 太淺不必讀
心算啟蒙	光緒十二年 奴愛士 一本 一角 太淺不必讀
數學啟蒙	光緒十二年 偉烈亞力 上海排印本 二本 六角 數理精蘊之節本極便初學
數學理	光緒五年 傅蘭雅 趙元益 製造局本 四本 四角
幾何原本	同治四年 利瑪竇 徐光啟 偉烈亞力 金陵刻本 爵壽齋算學叢書 翁恭本價值三千七百 初學宜先讀前六卷
又前六卷	明萬曆三十五年 利瑪竇 徐光啟 製造局依數理精蘊排印本 三本 四角 有刪改不如讀原書

4. 《增訂西學書目表》，盧靖編，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慎始基齋叢書本。

右讀書字類一百五十三種	
大日本速記法	一冊 丹羽瀧男著 二角
日本新字速記秘訣	一冊 林瓊巨著 二角五分
傍聽速記法獨習書	一冊 竹內祐之助著 一角
速記術大要	一冊 林茂淳著 二角
言論傍聽速寫之秘術	一冊 藤井原太郎著 二角五分
文體文字新論	一冊 矢野文雄著 五分
右速記法六種	
由繁而簡者天道之自然人事之至情也行草書行用之廣從事之敏可增壽命泰西多捷記法亦吾草書之意後世其必行哉吾中人多創之矣姑取日書鑑焉	
凡語言文字學十四類八百六十種	
日本僻在荒島無文學也六朝以前師佛學隋唐以後師吾中學皆加重譯而	

5. 《日本書目志》，康有為編，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上海大同譯書局石印本。

增版東西學書錄卷三

會稽徐維則輯顧燮光補

格致總學第十一

格致總學啟蒙三卷 西學啟蒙本一冊

英艾約瑟著先論物理次論體質次論心性取其切近者條剖縷分罕譬而喻務盡其理於格致學之通義畧備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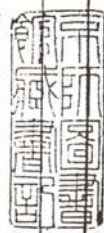
格致啟蒙一卷 製造局刻格致啟蒙四種本 上海石印四種本

英司郁藿著美林樂知譯鄭昌棧述凡九十章專言動力吸力漲力滲力縮力傳力壓力速力及流定變化之性最便初學 格致益聞滙報印有法白耳脫保羅讓王編理譯格致和枕未成

英赫施齊著英羅亨利瞿昂來同譯第一章論物與格物第二章論有體質之物第三章論生物卷葉雖少然推論公理甚為明晰講水學重學氣學者先以此為綱要

格致質學啟蒙一卷 西學啟蒙本一冊

上海石印本



6. 《增版東西學書錄》，徐維則輯；顧燮光補輯，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石印本。

譯書經眼錄卷之六

會稽 顧燮光 譯 耀氏輯

博物學第十五 首博物次植物次動物次蟲學

博物學教科書一卷 尤緒壬寅益智社石印本一冊

日本飯塚啟著益智學社譯全書四十八章發明動植礦三物生殖功用關係之

理其學總名博物學雖有機無機二體之分然其循環滋生之故變化孳乳之功

固可以證天擇物競學矣所繪五十六圖以表各物之形狀位置尤為明晰附博

物統系表亦足備全書考鏡之用

博物學教科書一卷 啟文譯社洋裝本一冊

虞和寅編譯博物學為動植礦石諸科之門徑區域甚大編考從中東文各書編譯成

書以動植礦石分科叙述頗有條理

近世博物教科書一卷附錄一卷 科學叢書本一冊

日本松村任三校閱日本藤井健次郎編纂樊炳清譯第一篇曰植物凡十二章

第二篇曰動物凡十二章第三篇曰礦物凡十六章後附實驗之部分植物動物礦

7. 《譯書經眼錄》，顧燮光編，民國二十三年（1934）杭州金佳石好樓石印本

江南製造局翻譯西書事略 第六卷	
各書目錄	撰書人名
一 運規約指	英國白起德 傅蘭雅
二 代數術	英國華里司 傅蘭雅
三 行軍測繪	英國連提 傅蘭雅
四 徵發溯源	英國華里司 傅蘭雅
五 測地繪圖	英國富路瑪 傅蘭雅
六 算板印圖	英國浙蜜斯 傅蘭雅
七 算式集要	英國哈司韋 傅蘭雅
八 三角數理	英國海麻士 傅蘭雅
九 數學理	英國祿麼甘 傅蘭雅
十 代數難題解法	英國倫德 傅蘭雅
十一 數根開方術	行素軒算稿 華衛芳
十二 開方表	則梅山房 買步緯
十三 量法代算	錢塘項名達梅侶稿 買步緯
十四 勾股六術	朱氏
十五 算學啟蒙	程大位汝思
十六 算法統宗	金山顯觀光尚之著
十七 九數外錄	數理精蘊 買步緯
十八 弦切對數表	數理精蘊 買步緯
十九 對數表	數理精蘊 買步緯

8. 《江南製造局翻譯西書事略》，傅蘭雅編，清光緒六年（1880）格致匯編本。

江南製造局記		卷數		圖		原		著		繙		筆		述		校		對		出		版		價		值			
保富述要	二一	二	二	二	二	英布來德	傅蘭雅	徐家寶																					
列國歲計政要	六十二	三	三	三	三	英麥丁富	林樂知	鄭昌棧																					
佐治芻言	三一	二	二	二	二	法勃利德	李景鎬																						
西美戰史	二	二	二	二	二	英咳勒低	傅蘭雅	范熙庸	潘松																				
法國新志	二四	三	三	三	三	英咳勒低	傅蘭雅	潘松																					
俄國新志	三八	四	四	四	四	英咳勒低	傅蘭雅	潘松																					
西國近事彙編	由每年四冊自癸酉至己亥年共一百八冊 由繙譯館委員分年編輯計價洋十六元	八	八	八	八	林樂知	嚴良勳	蔡澄																					
埏紘外乘	五	四	四	四	四	美林樂知	嚴良勳	李鳳苞																					
四裔編年表	四	四	四	四	四	美林樂知	嚴良勳	李鳳苞																					
書名	數	本	卷	數	圖	原	著	繙	譯	筆	述	校	對	出	版	價	值												

9. 《江南製造局記》（圖書目），魏允恭編，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刻本

工業與國政相關論二卷	二本	毛太	二角五分
格致類			
格致啓蒙四卷	四本	連賽連史	一元七角
格致小引一卷	一本	連賽連史	五角五分
物體遇熱改易記四卷	二本	連賽連史	五角五分
物理學上四卷	四本	連賽連史	一元八角
物理學中四卷	四本	連賽連史	一元八角
物理學下四卷	四本	連賽連史	一元八角
算學類			
算式集要四卷	二本	連賽連史	五角五分
算式解法十四卷	二本	連賽連史	五角五分
數學理九卷附一卷	四本	連賽連史	六角
代數術二十五卷	六本	連賽連史	一元九角五分
三角數理十二卷	六本	連賽連史	一元九角五分
代數難題解法十六卷	六本	連賽連史	一元八角五分
微積溯源八卷	六本	連賽連史	一元七角五分
電學類			
電學十卷首一卷	六本	連賽連史	一元八角
電學綱目一卷	一本	連賽連史	一元二角五分
電學測算一卷附表	一本	連賽連史	一元二角五分
通物電光	一本	連賽連史	四角五分
無線電報	一本	連賽連史	二角五分
化學類			
化學鑑原六卷	四本	連賽連史	一元八角
化學鑑原續編廿四卷	六本	連賽連史	一元五角
化學鑑原補編六卷附一卷	六本	連賽連史	一元五角
化學分原八卷	二本	連賽連史	七角五分
化學考質八卷附表	六本	連賽連史	一元四角五分
化學求數十五卷附表	十四本	連賽連史	一元四角五分
化學源流論四卷	二本	連賽連史	二元四角
化學工藝初集四卷二集四卷三集二卷附編	十三本	連賽連史	二元四角
化學材料中西名目表	一本	連賽連史	一元五角

10. 《上海製造局譯印圖書目錄》，上海製造局翻譯館編，民國年間鉛印本。

聲學須知

凡人身不體無一爲虛設者目司視耳司聽鼻司嗅舌之辨味莫不各有其職也究非自能之知覺各事者全主乎腦腦髓分散腦筋徧佈百體各適應用遇有外事卽傳動於腦是腦猶主耳目舌鼻各司職也均有相關之外務惟耳之爲聲聲之爲類甚多聲之成有三要事一本物震動而發爲聲一空氣盪動而傳爲聲一耳官接受而覺爲聲三者互相爲依格致家考求此事其理微矣至矣一冊價洋八分

如購以上書籍望照價匯下無不隨到隨寄空函恕不奉覆此致

上海河南路四百四十四號廣學會謹啟

11. 《廣學會譯著新書總目》，廣學會編，清末鉛印本。

參考書目

1. 專書

01. 丁福保、周雲青合編。《四部總錄》。臺北市：商務印書館，1957。
02. 王錦貴主編。《中國歷史文獻目錄學》。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03. 王紹曾主編。《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北京市：中華，2000。
04. 王韜、顧燮光等編。《近代譯書目》。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05. 白國應著。《圖書分類法》。北京市：書目文獻，1981。
06. 史永元、張樹華編。《劉國鈞圖書館學論文選集》。北京市：書目文獻，1983。
07. 左玉河著。《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上海市：上海書店，2004。
08. 任繼愈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河南：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1995。
09. 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市：文海，1966。
10. 李希泌、張椒華編。《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後）》。北京市：中華，1982。
11. 呂紹虞著。《中國目錄學史稿》。臺北市：丹青，1986。
12. 余嘉錫著。《目錄學發微》。成都市：巴蜀書社，1991。
13. 李瑞良著。《中國目錄學史》。臺北市：文津，1993。
14. 余慶蓉著。《中國目錄學思想史》。長沙市：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15. 李雪梅著。《中國近代藏書文化》。北京市：現代，1998。
16. 宋原放主編；汪家熔輯注。《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武漢市：湖北教

- 育出版社，2004。
17. 昌彼得著。《版本目錄學論叢》（二）。臺北市：學海，1979〔民 68〕。
 18. 周壽昌編。「譯刊科學書籍考略」。胡適、蔡元培、王雲五編。《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民國叢書第二編 98。上海市：上海書局，1989。
 19. 周彥文著。《中國目錄學理論》。臺北市：學生，1995。
 20. 來新夏主編。《清代目錄提要》。山東：齊魯書社，1997。
 21. 來新夏等著。《中國近代圖書事業史》。上海市：上海人民，2000。
 22. 周振鶴編。《晚清營業書目》。上海市：上海書店，2005。
 23. 姚名達著。《中國目錄學年表》。臺北市：商務印書館，1967。
 24. 姚名達著。《中國目錄學史》。上海市：上海古籍，2005。
 25. 計文德著。《從四庫全書探究明清間輸入之西學》。臺北市：漢美，1991。
 26. 俞君立、陳樹年主編。《文獻分類學》。武漢市：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
 27. 俞君立主編。《中國文獻分類法百年發展與展望》。武漢市：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2。
 28. 郝秉鍵、李志軍著，《19 世紀晚期中國民間知識分子的思想：以上海格致書院為例》。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29. 馬祖毅著。《中國翻譯史》。武漢市：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30. 高路明著。《古籍目錄與中國古代學術研究》。杭州市：江蘇古籍，1997。
 31. 徐宗澤著。《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上海市：上海書店，2006。
 32. 梁子涵編。《中國歷代書目總錄》。臺北市：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3。
 33. 張蔭麟著。「明清之際西學輸入中國考略」。李毓澍編。《張蔭麟先生文集》。臺北市：九思出版社，1977。
 34. 梅憲華著。「晚清的官書局」。程煥文編。《中國圖書論集》。北京市：商務印書館，1994。

35. 張品興編。《梁啟超全集》。北京市：北京出版社，1999。
36. 張靜廬輯註。《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上海市：上海書店，2003。
37. 彭斐章主編。《目錄學資料匯編》。武漢市：武漢大學出版社，1986。
38. 彭斐章主編。《中外圖書交流史》。長沙市：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39. 彭斐章、喬好勤、陳傳夫編著。《目錄學》。武漢市：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
40. 傅榮賢著。《中國古代圖書分類學研究》。臺北市：學生，1999。
41. 程煥文著。《晚清圖書館思想史》。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42. 鄭鶴聲著。《中國史部目錄學》。臺北市：華世，1985。
43. 熊月之著。《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市：人民，1994。
44. 蔣元卿著。《中國圖書分類之沿革》。臺北市：中華，1966。
45. 劉簡著。《中文古籍整理分類研究》。臺北市：文史哲，1981。
46. 蔣貴麟主編。《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臺北市：宏業，民 1987。
47. 黎難秋編。《中國科學文獻翻譯史料》。合肥市：中國科學技術大學，1996。
48. 潘玉田、陳永剛著。《中西文獻交流史》。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49. 錢亞新、白國應編。《杜定友圖書館學論文選集》。北京：書目文獻，1988。
50. 譚汝謙主編；小川博編。《日本譯中國書綜合目錄》。香港：中文大學，1981。
51. 嚴靈峯編。《書目類編》。臺北市：成文，1978。
52. 蘇精著。《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臺北市：蘇精，1985。
53. 蘇精著。《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臺北市：學生，2000。
54. 嚴佐之著。《近三百年古籍目錄學要》。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1994。

2. 學位論文

01. 李瓊。「明清之際西學傳入與中國社會的迎納心態」。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5月。
02. 武增鋒。「試論戊戌維新派西方文化觀的轉型」。河北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6月。
03. 胡珍貴。「論康有為早期文化思想」。安徽大學專門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5月。
04. 胡文生。「學術·體制·人—晚清學術轉型的多維透視」。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年6月。
05. 馬金華。「論康有為的科學思想」。山東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4月。
06. 孫青。「晚清之西政東漸與本土回應」。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年4月。
07. 張淑玲。「從江南機器製造局譯書看西方近代科技知識之輸入」。國立清華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8月。
08. 崔躍峰。「西學東漸與中國高等教育中近代學科的設立」。河南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5月。
09. 許剛。「中國私家目錄與時代學術文化」。貴州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5月。
10. 梁進學。「試論清末民初舉要目錄的發展」。華東師範學院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5月。
11. 梁松濤。「梁啟超文獻學思想研究」。河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6月。
12. 彭樹欣。「論梁啟超對文獻傳播的貢獻」。蘇州大學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2001年4月。

13. 鄒桂香。「十六至十八世紀西學文獻在中國的傳播」。鄭州大學管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5月。

3. 期刊論文

01. 王揚宗。「晚清科學譯著雜考」。《中國科技史料》第15卷4期（1994）：頁32-40。
02. 王揚宗。「江南製造局翻譯書目新考」。《中國科技史料》第16卷2期（1995）：頁3-18。
03. 王心裁。「從古典目錄學到現代目錄學」。《圖書情報工作》4期（1999）：頁2-7。
04. 王心裁。「試論中國目錄學傳統」。《大學圖書館學報》3期（2000）：頁68-73。
05. 王京山。「中國傳統目錄學辨考與致用的辯証思考」。《圖書與情報》2期（2002）：頁25-28。
06. 王先明。「關於近代新學的文化模式」。《歷史教學》1期（2004）：頁12-18。
07. 朱義祿。「西方自然科學與維新思潮—論康有為、嚴復、譚嗣同的變革思想」。《學習與探索》2期（1999）：頁63-68。
08. 艾克利。「論梁啟超的新學書目」。《西安外國語學院學報》第7卷1期（1999）：頁66-69。
09. 宋巧燕。「論明清之際耶穌會士譯著文獻的翻譯特色」。《江西社會科學》5期（2004）：頁126-132。

10. 李剛。「知識分類的變遷與近代學人治學形態的轉型」。《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 5 期（2005）：頁 72-77。
11. 余訓培。「中國目錄學傳統之目錄學與文獻整理之二位一體」。《圖書館理論與實踐》1 期（2006）：頁 115-117。
12. 吳彤。「洋務派與維新派的西學觀之比較」。《長春師範學院學報》第 25 卷 1 期（2006）：頁 48-51。
13. 林立強。「明至清末譯書書目的狀況與評價」。《東南學術》3 期（1999）：頁 106-109。
14. 林啓彥。「王韜中西文化觀的演變」。《漢學研究》第 17 卷 1 期（1999）頁 105-125。
15. 尚智叢。「1886-1894 年間近代科學在晚清知識分子中的影響-上海格致書院格致類課藝分析」。《清史研究》第 3 期（2001）頁 72-82。
16. 侯昂好、文學鋒。「論近代西學在中國傳播的兩種範式—從《名學淺說》到《辨學》」。《江海學刊》2 期（2006）：頁 177-183。
17. 郭廷以。「近代西洋文化的輸入及其認識」。《大陸雜誌》第 2 卷 7 期（1951）：頁 21-29。
18. 陳耀盛。「論康有為目錄學思想」。《近代史研究》3 期（1995）：頁 179-194。
19. 陳耀盛。「異質文化交流與我國目錄學的變異—魏晉南北朝、明代、近代我國目錄學的嬗變」。《資訊傳播與圖書館學》第 5 卷 2 期（1998）頁 51-56。
20. 袁彤。「西學書目簡介」。《圖書館工作與研究》6 期（1998）：頁 55-56。
21. 孫建國。「清末民初日文中譯與轉販西學問題研究」。《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1 卷 6 期（2001）：頁 59-64。

22. 桑兵。「晚清民國的知識與制度體系轉型」。《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4 卷 6 期（2004）：頁 90-98。
23. 高黎平。「晚清翻譯機構與在華美國傳教士」。《德州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1 卷 1 期（2005）：頁 67-74。
24. 郭劍鳴。「從傳統知識轉型到傳統政治轉型：晚清譯書業發展的邏輯與功能——一種知識政治學的解讀」。《人文雜誌》2 期（2005）：頁 42-48。
25. 袁學良。「論古籍分類法體系構建的政治文化思想基礎」。《四川圖書館學報》2 期（2005）：頁 77-80。
26. 張志偉。「近代東西學書目初探」。《四川圖書館學報》2 期（1989）：頁 33-39。
27. 張增一。「江南製造局的譯書活動」。《近代史研究》3 期（1996）：頁 212-223。
28. 閔定慶。「維新派目錄學的文化內蘊」。《學術研究》3 期（1994）：頁 83-87。
29. 傅榮賢。「西學書目表論」。《山東圖書館季刊》4 期（1996）：頁 56-60。
30. 傅榮賢。「從核心文獻看中國古代書目分類的一般特色」。《四川圖書館學》報 5 期（2002）：頁 60-65。
31. 黃晏好。「四部分類是圖書分類而非學術分類」。《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 期（2000）：頁 104-112。
32. 黃順榮、傅榮賢。「傳統目錄學本質特徵論」。《圖書館理論與實踐》4 期（2001）：頁 41-44。
33. 黃興濤、胡文生。「論戊戌維新時期中國學術現代轉型的整體萌發——兼談清末民初學術轉型的內涵和動力問題」。《清史研究》4 期（2005）：頁 36-50。

34. 楊修蘭。「梁啓超的西學書目表及其在目錄學史上的地位」。《安徽教育學院學報》3期(1997)：頁17-19。
35. 趙中亞。「從九種《皇朝經世文編》看晚清自然科學認知的變遷」。《安徽史學》6期(2005)：頁14-18。
36. 潘猛補。「黃慶澄與中西普通書目表」。《圖書館研究與工作》3期(1993)：頁40-42。
37. 劉靜。「略論梁啓超的西學書目表」。《山東圖書館學季刊》1期(1994)：頁63-67。
38. 劉明鑑。「從西學書目表看梁啓超早期目錄學思想」。《圖書館學研究》1期(1997)：86-91。
39. 魯軍。「第二次外來知識大輸入的歷史記錄—論清末譯書目錄」。《資料工作通訊》2期(1982)：頁34-40。
40. 魯勇、魯海。「早期的譯書和譯書書目」。《圖書館研究與工作》1期(1989)頁43-45。
41. 羅志田。「西學衝擊下近代中國學術分科的演變」。《社會科學研究》1期(2003)：頁107-114。
42. 寶成關。「論西學在康有為思想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維新派理論本源探析」。《長白學刊》5期(1994)：頁90-94。
43. Tsuen-hsuei Tsien, "Western Impact on China through Translation," *Far Eastern Quarterly*, 8: 3(May 1954), 305-327.